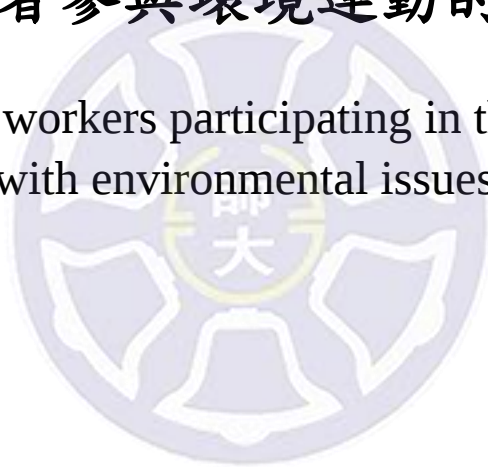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潘淑滿 博士

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

The praxis of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mov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研究生：黃念謹 撰

中華民國 一〇六 年 二 月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提交資訊

提交物件代碼	754418376
提交日期	2017年02月25日 05:36PM
提交物件總數	5
文檔名稱	.pdf
文檔大小	8.84M
字符總數	126916
字數	59423
頁面總數	178
原創性	
總覽	5%
網際網路	4%
出版物	0%
學生文稿	1%

謝誌

「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

（聖經以賽亞書 42 章 16 節）

開始這份研究，就如同我在專業跑道上的轉換，再度走上一條未曾走過的道路。若將當時的主觀感受具象化來看，這條不認識的「道」——既是研究主題，也是研究方法——真是一條荒煙漫草的羊腸小徑啊？！

走在其中，徬徨有時，無力有時，迷路有時，孤獨有時，膽怯有時，拆毀有時，失望有時，跌倒也有時...；雖然不熟悉路況，步調也很慢，然而，得力有時，釐清有時，興奮有時，充足有時，建造有時，鼓勵有時，幫助有時...。感謝上主，祂「始終」牽引著如瞎子般的我走這一條「不認識的道」，祂造就也介入了這許多的「有時」，使這條未曾走過的路，有著耳朵未曾聽見、眼睛未曾看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預備與鋪陳...

謝謝我的指導老師、口委老師，以及研究參與者，在或長或短的「有時」中有您們，以至於讓這段以論文作為揉合社工價值與環境價值之認同的實踐道路得以拓展。謝謝我所愛的家人們、教會牧長與主內肢體們、同儕和學長姊弟妹，因著那鼓勵與幫助的「有時」，使正值冬日般窒礙難行的論文進度，經歷著心裏與實質的加溫。這當中，我要格外感謝我的先生——恩賜（他真是人如其名，是上主賜我的禮物），他在每時每刻的「有時」，連結一道有形的物質與心靈階梯，幫助我走進社工道路，並順利走過論文爬坡的每個路段。

回頭望向那留在後方的足跡，我內裡的雙眼逐漸清晰——原來上主引導我走的這一條不認識的道、不知道的路，是要成就關乎我在邁向平等、對外發聲的主體回歸之路。最後以網路傳誦的一句話，作為我對自己的期許：

“Jesus died for you in public, so don't only live for Him in private.”

願這條人煙罕至卻實踐著環境公義的環境「道」路，也有我不止息的關懷與不間斷的實踐。

念謹寫於 2017 年春



摘要

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擁有／追求共通的基本價值——環境公義。對社會工作而言，環境運動更得以作為鉅視面實踐的進路之一。然而，從社會工作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環境議題的焦點偏向「人在環境(或情境)中」(person-in environment or situation, PIE or PIS)的「人文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忽略了落在宰制處境的「生態物理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而社會運動在本土的實踐也往往落入專業結構的邊陲。

本研究旨在探索 4 位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藉由敘說研究以呈現他們參與的經驗、意義，以及過程中所展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藉此在學術、教育和實務上，建構出以環境意識為出發的實踐知識與社工角色。

同時，對研究者而言，本論文的完成也成就了一場「回歸主體」與「邁向平等」的發聲練習。

關鍵詞：自我實踐、環境公義、社會運動、環境議題，結構、能動性、充權、社會工作者、敘說研究

The praxis of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mov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Huang, Nien-Chin

Abstract

Environmental social movement and social work pursue common basic values——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social work,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s used as a macro structure of practice. Nevertheless,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ocial work, the focu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is o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erson-in-environment or situation”, disregarding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at is commanded; and the praxis of social movement often falls into the bounds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axis of four social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social mov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narrative research was adopted to presen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perience, meaning, and the process of showing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Through this study,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the roles of social work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were constructed in academic education and practice.

Meanwhile,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aper is als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owards equality” for the researcher.

Keywords: praxis, environmental justice, soci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issue, structure, agency, empowerment, social worker, narrative research

目次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目次.....	v
表次／圖次／附錄.....	vii
第一章 「社工我」在參與運動後的發問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我是誰.....	2
第二節 研究動機：我身在何方.....	5
第三節 研究目的：我想往何處去.....	8
第四節 名詞釋義.....	14
第二章 文獻與意識間的板塊運動	15
第一節 板塊的擴張作用：「環境」在社會工作的定位與意涵移轉.....	15
第二節 造山運動後浮出：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的實務與價值連結.....	18
第三節 向下潛至隱沒帶：在專業結構邊陲的「社會運動」.....	25
第四節 地核的引力牽拉：相關理論視角與實務取向.....	32
第三章 實踐的建構路徑	46
第一節 研究方法.....	46
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	51
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56
第四節 研究嚴謹性.....	58

第五節 研究倫理.....	60
第四章 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故事.....	63
第一節 大海般飄流開放的實踐身影——阿海的故事.....	64
第二節 雲朵般自由變幻的實踐身影——雲子的故事.....	76
第三節 山嶺般踏實屹立的實踐身影——阿山的故事.....	88
第四節 陽光般生機勃勃的實踐身影——陽子的故事.....	104
第五章 共構另一種「可能」——花子的出現.....	117
第一節 故事開始：循著人生路建構實踐路.....	117
第二節 故事轉折：經由「解放」建立「可能」.....	121
第三節 故事尾聲（即再開始）：不變的價值，多元的走向.....	126
後記：一場「回歸主體」與「邁向平等」的發聲練習	131
參考文獻	137

表次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54
表 3.2 敘事分析模式的 4 類型.....	57
表 6.1 分析資料回饋檢核總表.....	134

圖次

圖 3.1 研究過程的「再呈現」層級.....	49
-------------------------	----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47
附錄二 研究邀請函.....	148
附錄三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150
附錄四 研究參與同意書.....	151
附錄五 訪談札記.....	152
附錄六 文本回饋檢核函.....	153
附錄七 分析資料回饋檢核函.....	154
附錄八 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	155
附錄九 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	156

第一章 「社工我」在參與運動後的發問

「要知道你想往何處去，
你必須知道身在何方，以及你是誰。」

(Rogers, 2007) ¹

我的環境意識覺醒，進而環境運動的參與，正是從一個「我是誰」的自我發問所出發。曾是環境運動（physical environment）隱身者的我，從非本科系轉換到社會工作學所的歷程，不斷地裝備著社工教育中的主流論述與實務走向，直到「公民」很忙²的 2014 年，身為社工所學生的我卻在社會共同經驗的體制壓迫中召喚出「改革」的意識，也開始現身在「反核」運動的現場……過程中所展開的是一個主體復歸的旅程，當從「異化的他者³」破繭的那一刻，我逐漸從一位啞的旁觀者成為了發聲的練習者。在這轉折後，重回我的社工角色時，處在知識體系邊緣的「環境意識」也逐漸地扎根在我的實踐土壤中，並生發意義。

胡紹嘉（2008，p.278）提到，「許多理論家們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說故事此一人類表述形對，對於個人之主體構成與社會認同的重要性，而藉由敘說與人們的行為事件及生活遭遇相關的生命故事，使之從「個體」（individual）變成人（a person），並將個人的道德決策和社群的倫理責任結合在一起，彼此相繫、共同存續。」因此，在本章中會以我的環運實踐故事開始，來說明研究緣起與動機，而這故事末後的未完結與發問，便是我研究目之所在。

¹ Rogers, J. (2007). Adults learning . Retrieved from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3FZb60SRMHEC&printsec=frontcover&hl=zh-TW&source=gs_bs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http://www.cswe.org/File.aspx?id=41861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5%85%B7%E7%90%86%E6%80%A7

² 2014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0 日間，發生太陽花運動，即臺灣學生與公民團體因著立法院強行通過服貿協定，而發起佔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事件，又有稱：太陽花學運、318 學運，和佔領國會事件等。乘著這場運動熱潮，陸續又發起反核遊行等行動。

³ 無論是宗教、政治學、哲學或社會學對異化（alienation）的探討和意涵都不一，本處以《不列顛百科全書》所依據的社會科學定義：在社會環境下，人的主體分化出一個客體（他者）來反支配主體，人無力與之抵抗，使失去按照主體意識行動的自由，或與其他事物、環境、工作、產品或自我本身疏遠的狀態；即異己化、陌生化（柯佳伶、李杏津、陳永男，2012）。

第一節 研究緣起：我是誰

「奴隸並非由膚色決定，而是她自卑的、毫無自主的內心來決定。」

(Fanon, 1971, 引自陳芳明, 2005)

一、異化⁴人生的甦醒：公民運動的觸發

「太陽花運動」(Sunflower Movement)後的一年多，我站在學校圖書館前的人行道上等候馬路對面的行人通行燈號轉換。當綠燈亮起，正準備邁開腳步走上斑馬線時，卻發現對面、兩側行人都未起步，「我看錯燈號了嗎？」自我懷疑地再定睛一看，確定沒有看眼花而要行動時，卻發現自己那躊躇不前的身體；直到眼前及身旁的匆匆身影一位位地向著我走來、越過我走去，行人腳步、身影錯落在斑馬線上時，我才一如往常地邁開腳步……「啊，原來我那被『主流』馴化的身體未曾遠去，她仍像受宰制的魁儡木偶，只是那個主宰者不是我。」我驚覺地想，這通往的結局不就像「小王子」⁵動畫電影中那成人後的小王子——在主流價值的洗禮下遺忘了原本的夢想、熱情與創意。這經歷使我小震驚，卻不怎麼意外，因它同時解釋了去年3月底，站在中山南路與青島東路口，有如「他者」⁶般的我——嚴實地在「主流」的包裹中安穩著、噤聲著。

一直以來，公民運動之於我就像空氣般，藉由媒體關注社會的我，當媒體淪為服務於特殊政黨傾向或既得利益團體的工具時，我正是有理由地逃避在「不知」中，繼續安然地在「沉默文化」⁷中生活。自成長以來，我便發展成一個在人際互動「差異」處境下，內外不一致的自己，尤其在主流或權威者的聲音中常為了

⁴ 參註 3。

⁵ 《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這部在 2015 年上映的動畫電影，改編自法國作家聖修伯里(Antoine Marie Jean-Baptiste Roger de Saint-Exupéry)的同名暢銷小說“Le Petit Prince”(維基百科, 2016b)。

⁶ 參註 3。

⁷ Paul Freire 所提出，意指在表面平和的社會下，因著合理化或合法的控制與壓迫而失去主體，成為「失語者」，即無聲音者(方永泉譯, 2013)。

表面平和而「消音」或「同一」(sameness)。直到在研究所時期，發生了近年規模最大的太陽花運動，壓迫事實和著血是那麼地刺眼，我的「異化」人生就在這場「太陽花運動」的照射下甦醒……

一開始藉由社群網站和 ustream⁸關注這場運動的我，幾天後決定騎著摩托車「路過」立法院。但我發現，停在目的地的那身體無所適從，雙腳感到發麻，如附身「局外人」般地以「他者」的角度在審視那不再「秩序」的街景——被圍籬流刺網及拒馬所包圍的立法院、各樣以「反黑箱服貿」為訴求的標語旗幟、日常行人的「匆匆路過」轉換成「席地而坐」，以及那以緝拿犯罪者之態勢而動員的不尋常警察人力。在社群網站為不平而鳴、而「發」⁹的「吶喊」我，為何來到現場竟是這般地「噤聲」？——一場場立法院外舉辦的「全球化」、「公民憲政」等議題的體制外公民課，就算並未與體制內的課程衝堂，我也選擇性地隱藏在雲端補課。

這事實不禁讓我反思／省：如果我生活在網路不發達的 1980 年代中期，雖然當時是社會運動迅速興起的時代，但卻仍遺留著戒嚴威權時代中被污名為「反秩序」的遺毒標籤，若我（作為一名社會工作者）面對以弱勢者權力／權利／權益作為訴求的運動現場，又在只能上馬路無法在網路抵抗的狀況下，要如何參與？是否會在那裏？

同年 3 月 30 日，我有別以往地走上「三三〇反服貿凱道大遊行」¹⁰，坐在中正紀念堂前的中山南路上，站在我前方那曾參與「野百合運動」的前輩們「自由奮力」高喊著標語口號的主體性展現，他們那朝向陽光而映在我眼底的背光身影竟還是如此地奪目，令我生羨……

⁸ Ustream 為網路直播軟體，在佔領立法院期間，乃藉此將院內的狀況對外轉播。

⁹ 在社群網站中主動汲取各社群所發出的相關智識、資訊和進一步訴求後，再轉貼在自己帳號的公開介面，以達宣傳功效的行為。

¹⁰ 2014 年 3 月 30 日臺灣太陽花運動期間最大規模的街頭遊行，又稱黑衫軍運動、330 凱道集結行動。以占領立法院的抗議學生與公民團體發起，號召前往凱達格蘭大道及其周圍區域表達訴求。當時標語為：「捍衛民主、退回服貿、人民站出來！」（維基百科，2015d）。

二、啞者的「發聲」練習：踏上環境運動的反核現場

隔沒幾天，林義雄先生為「無核家園」而發起禁食行動，他的置生死於度外的行徑充斥在我日常生活的思維，讓我再次地參與在 4 月 24 日晚間自由廣場的靜坐與默禱，那一晚，我的耳裡、心理、思維裡迴盪著作家小野（2014）引述某位學者曾說過的一段話：「台灣這幾年的抗爭，其實是跳脫了傳統的藍綠、省籍甚至階級的思維，只剩下『公民』和『臣民』的差別，而所謂的『臣民』往往就是執政者聲稱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可能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或是自掃門前雪的信徒，也可能是一群被威權教育長期洗腦的人，當然，更可能是失敗主義者，認定這些無力的抗爭是無用的。」這段文字照見了我的曾經與現在，但真誠希望，那不是將來的我。

4 月 26 日午後下起雷陣雨，我仍像個「他者」般，但所看的不是現場的他人，而是站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聲援的自己。躲不進帳篷內的身體因著輕便雨衣不斷被掀起而發顫、淋濕，但布滿我眼中那一個個不顧風雨的置身身體，卻在我的心裡凝聚出一股暖流。這是自反核大遊行¹¹推動以來的 23 年後，我第一次以參與在關懷現今及下一代環境正義的運動。隔天，我與近 5 萬名民眾平躺在原本車水馬龍的忠孝西路上模擬著核災狀況，暗暗希望著「躺在床上」入睡——這稀鬆平常的生活日常，不會成為未來人們的奢求，尤其是缺乏資源來回應災變的弱勢群眾。

這是我參與環境運動的開端，但希望它不是結束，所以我無法忽視這段過程中，那流竄在我心中心餘力絀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在呼口號、舉訴求地當下，我那刻意「壓低」的音量在空氣中傳送著……

¹¹ 最早的反核大遊行是 1991 年 5 月 4 日，環保聯盟及社運團體發起的「反核救台灣」遊行，夜宿台電大樓。近年來，反核運動的訴求主要包括：停止興建龍門核能發電廠、核廢料遷離蘭嶼等。因 2011 年 3 月 11 日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激起大量民眾對核能發電的疑慮，這也是 1986 年車諾比核電廠事故以來最嚴重的核子事故。因此，2013 年由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 150 個民間團體共同發起的 309 廢核大遊行，是目前為止台灣反核遊行中最多的一次，參與人數擴大至 10 萬人以上，活動口號為「終結核四，核電歸零」（維基百科，2015a）。

第二節 研究動機：我身在何方

帶著覺察的意識回到我的日常角色——一名社會工作學門的研究生，省察到自身異化的身影、規訓的身體，以及失語的狀態實在是無處不有，充斥在過去，甚或現在的知識學習場域。身為社工學生，以及未來的實務工作者，我似乎不得不面對我的無力，因此，帶著進入過環境運動現場後的「覺察我」，重新回溯過去社工的學習現場。

一、教育與實習現場的現形：知識與權力體系下的規訓與失語

在職場工作十年後，再次以大學非本科系的身分進入社會工作的學術「殿堂」。因著傾向有正確（或最好）答案的規訓身體，讓我在強調課堂表述的教學場域中，成了有嘴巴的啞巴¹²——找不到詞彙表達、缺乏經驗可以分享，失語在結結巴巴，卻找不到合適語詞做我思考的落腳處。原來社會工作專業的學術語言、實務經驗、社會工作相關的求學背景，在當中成為「主流」的指標，然而，在教育現場中，我過往的學習歷程和儲備能力，近乎無用武之地；在「專業」的量尺中，它的刻度近似於零。因此，課室中的我只能愈來愈沉默，自我價值也在這斷裂的低谷中吶喊、懷疑……。

Said 的後殖民論提到，「自我『價值』是一種被知識與權力體系下被評定的相對存在。」（引自王志弘等譯，2003）然而，我卻藉著逐步積累社工專業知識來企求自我價值的累積。然而，這段有如婚姻移民來到臺灣的新移民「失語」歷程，卻也逐漸讓我這個「社工界新移民」反身（reflexivity）覺察自身主體失落的脈絡、結構性因素及權力關係，同時也帶著我去觀注已然成為臺灣第五大族群——新移民。正因如此，實習場域選擇在服務新移民的 NGO 組織。

我的實務走向並沒有太讓我意外，似乎發生在實習現場的每一件事，都脫離不了隱形的舊牢籠——因循主流，對衝撞體制懼怕的規訓身體主導著行動意

¹² 2009 年出版的繪本《我的寶貝》，作者賴佳慧將一名越南新住民的跨文化處境描寫成「就像有眼睛的瞎子，有嘴巴的啞巴。」

向。因此，我所實踐與認同的社工角色，仍是實務上的主流。度過 550 小時的實務工作後，若以社會工作的三個核心使命（3C's）——照顧（caring）、治療（curing），和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Morales, Sheafor, & Scott, 2011）來檢核我的實踐。傳達出真誠與溫暖特質的前兩者，也著實要比發揮對抗意志的後者來得容易。

實際跟隨實習督導進行新移民生活適應的方案訪視時，曾經進入兩名中高齡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勞工的家庭，之後實習專題¹³的進行，更加深入地瞭解她們的處境後發現，就如同多元交織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所反映的，族群、性別、階級歧視所導致的多元壓迫在她們身份上如此明顯地「交織」著（李淑菁，2012）；從族群角度來看，她們還是同有華人血脈的華僑。

從事資源回收工作的她們，無論所居住社區的社會層級（estate）差距大或雷同，皆無獨有偶地受過鄰里間口語與行為上的階級歧視；而在過往所從事的非典型工作中，也曾因職場上的種族歧視，不僅領著低於基本工資的薪資，還無勞保，更面臨在調薪條件上的差別待遇。所處的社交網絡還存有結構性歧視，以至於家庭以外的社會支持網絡薄弱，連帶影響著勞動參與的選擇。繁重工作結束後，更有例行性的家務工作等候著身為妻子、母親的她們，無論丈夫是就業或待業在家。如今她們年歲漸長、體力不再，也似乎無法逃離疾病的造訪；不再有年輕作為勞動本錢的她們，如何面對不曾鬆動的經濟弱勢處境及家務分配不均？若我是主責社工，當如何將新移民女性私下的遭遇困境轉換為公共議題？評估又如何轉為介入行動？看見非典型與非正式就業的勞動權益保障不足，是否為了使政府看重這群填補著臺灣最低層勞動力的新移民族群，而參與推動更合乎人權制度的改革呼籲？還是充權她們有能力來為其權力、權利及權益發聲？

落地生根在臺灣的她們，身份交織著種族、女性、階級、結構性或年齡等壓

¹³ 為筆者於 2013 年進行的專題研究，主題為：「中高齡東南亞新移民婦女勞動參與的變遷歷程——以東南亞籍華僑為例」

迫與歧視；但對我而言，扮演使能者和照顧者的角色，來疏通因經濟困境而造成的封閉家庭系統，同時發展她們的人力資本，使其瞭解臺灣的就業權益法規、退休保障規劃等似乎還要來得「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¹⁴與「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¹⁵。雖經歷過跨文化的洗禮，在實務中已不再一味地促進其對主流社會共識和價值體系的認同與適應，但對於對抗主流與體制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發聲」的窒礙感，以及在操作倡議、運動上的無能，以致在社會性和公共性議題上，我常常讓主體隱匿在視若無睹中，更遑論去實踐「改變社會」的社工使命。這同時也解釋了在環境運動現場內，為何我所認同的想法卻以顫抖的聲音傳達。

二、實務現場的實踐無力感：社工角色認同的解構與再建構

社會工作者需擔負起讓弱勢／受壓／邊緣／少數群體發聲的角色，尤其議題面也牽涉到先天「無法」發聲的物理與生態環境，然而，我卻無力於實踐「發聲」(倡議)者的角色。美國學者 Specht 與 Courtney (1994) 對於淪為如此的社會工作者，曾痛心地指責是「不忠心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s)」；香港社工曾醒祥在雨傘運動時，也提到：「社工，失去了社會性與公共性，只是一個維穩¹⁶的雜工！」¹⁷縱然我可以不是運動現場上的運動組織者，但我卻必須是參與者或監督者。

因此，這一句句的呼籲也著實使我無法置若罔聞，如同投入池子中的石子，在我的思緒中引起一連串自我懷疑的漣漪：困難於對抗主流勢力／觀點的我，會

¹⁴ 工具(合)理性：又稱「功效理性」、「效率理性」，與「價值(合)理性」同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提出，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重要概念。意即以功利為動機地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作為追求最大功效(利)的實踐途徑。價值理性則是不看重結果，而是相信行為的無條件價值——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強調以純正動機及正確手段去實現朝往所欲達成的目標。然而，工具理性是為價值理性服務的，二者不可分割(MBAlib, 2014)。

¹⁵ 實習機構對實習生的期待及所賦予的職責。

¹⁶ 維穩：即維持穩定，該詞始於2005年，乃是中國中央在提出政府工作基調——政治與經濟穩定時所使用。對參與雨傘運動的香港市民而言，當局的政策目的乃是在維持該政權的穩定，加強對國民的控制，避免大規模群眾示威運動(李明真, 2011)。

¹⁷ 香港社工曾醒祥在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期間，香港發生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運動」(Umbrella Movement)時，接受為推動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免受財團、政權或政黨操控而成立之民間社團「獨立媒體(香港)」訪談時有感而發的一段話。

不會因此在權力底層中「消音」或「同一」，甚或成為「主流文化社會工作」¹⁸下的社會控制工具？會不會為了達成虛假的內在平穩，以一種「歸咎受害者」的角度（嚴祥鸞，2007）執著於進行「問題取向」的手法？又或成為「壓迫共謀」（complicity of oppression）¹⁹者，以默認參與在壓迫源對自身的壓迫？在意識覺醒的狀況下，無法再藏躲那「馴化」的身體，但曾被壓迫的我難道要淪為自己的壓迫者，強逼自己達到所謂的目標？覺察後，面臨生發不出突破矛盾的力量時，會不會因此成為「頭累累」²⁰又傷痕累累的社工逃兵？

這一個個對已然未然的「實務我」之問號，以及反身預見自身意識與行動背道而馳的內在斷裂，讓我對於能夠站上環境運動場域力聲疾呼、堅持訴求的社會工作者感到敬佩，卻也好奇——難道沒有掙扎過、退縮過？始終都能如此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在踏入實務界之前，我選擇一個在生態界中全然默默無聲，極度仰賴人類發聲，而在社會工作領域中仍屬邊緣的「環境」作為探討議題；而又以極具能動性²¹，並追求環境公義的「運動」作為實踐場域，藉此盼能透過投身其中的社會工作者，看見前往「邊緣」區域的信念指標，以及隱身到現身的前行動能。

第三節 研究目的：我想往何處去

「臺北下雪了！」2016年1月25日，驚呼聲此起彼落地出現在電視新聞中、我的社會支持網絡間，若有統計，「下雪」這詞語應該可以榮登該日臺灣各大入口網站的熱搜詞。回顧臺灣的下雪紀錄，1890年代末的濁水溪以北也曾靄靄白

¹⁸ 「主流文化社會工作」遭「多元文化社會工作」批評，認為在既有的社會體制和結構下容易忽視非主流文化的價值觀點與需求，而違背了社會公義的價值理念（李明政，2011）。

¹⁹ Yip（2004）所提出之概念，代表工作者在壓迫處境下沉默、壓抑、忍耐，不僅無法鬆動壓迫結構，所形成的默認更成為壓迫自身的一員。

²⁰ 台語發音，形容自卑、受挫以致頭低低的樣子。

²¹ 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是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範疇中涉及人類行動的概念（陳學金，2013）。

雪狀，當時在全台各地頻傳降雪消息，就連嘉義平地都下大雪(自由時報，2016)。相距一百多年後的平地下雪，在臺灣社會因此也堆疊出更強烈的驚喜感，若是「過去」的我，應該也會參與在這如同慶典般的喜悅氣氛，久久不能自己……

然，現實是上揚的嘴角很快地被憂慮給抑制住，那如同鉛塊般的下拉力量是「極端氣候」那無法迴避的事實、遊民的生命安全、農業的災損，以及平地生態等的影響……

一、環境議題從未離社會工作的關懷太遠

在召開「2015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期間²²，英國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²³曾公布一份研究數據顯示，全球正面臨「極端的碳不均」(extreme carbon inequality)，也就是傷害氣候的化石燃料排放，一半由最富裕的 10% 人口所製造，而最貧窮的一半人口，只製造約 10% 的排放量，然而他們(約 35 億人)是最招架不住來自風暴、旱災等極端氣候變遷下的衝擊，所排放的 CO2 需歷時一百年才會消失，更牽涉到下一代發展權的公平議題(自由時報國際新聞中心，2015)。世界衛生組織(WHO)與英國大學針對 103 個國家都市與同村等 3000 個處所進行的空氣污染調查顯示，每年約高達 650 萬人死亡於伴隨經濟成長而來的空氣污染。日常的呼吸中瀰漫著疾病的風險。其中有近 90% 的人生活在亞洲等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國家，而更易受害的族群特別有孩童、老人，以及女性(鄭凱榕，2016)。本土學者王永慈、游進裕、林碧亮(2013)針對西海岸地層下陷區的貧窮家庭，面臨淹水而造成的社會影響做研究，發現貧窮家戶對於改善自身居住處所的環境安全是無能為力的，只能一次次地被迫去面對風災水患的來襲與災後復原。

由以上一篇篇的統計資料和研究可以想見，社會工作者所服務或潛藏的服務

²² 在法國召開的「2015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期程是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1 日，為期 12 天。簡稱「COP 21」或「CMP 11」。會議最大成果是近 200 個締約國一致同意通過的《巴黎協議》(維基百科，2015c)。

²³ 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發展及人道救援機構，以消除貧窮，以及貧窮有關的不公平現象為宗旨。機構網址：<https://www.oxfam.org/>。

個案，不僅面臨陷入貧窮、疾病的風險與循環，生活中還潛伏的氣候風險與結構不均的議題，然而這些評估看見卻寫不進個案紀錄。在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下，往往僅在殘補式（residual）的社會福利層次中尋找出路。然而，生態與物理環境的破壞，及對人類社會的反撲，無論是結構不均的環境公義議題，或承擔氣候風險的能力評估，服務弱勢／受壓／邊緣／少數群體的社會工作者似乎沒有漠視與旁觀的理由。

二、運動現場中零星、分散和少數的社會工作者

專研於本土環境運動研究的學者何明修（2006）指出，環境議題要能在社會各階層揭露、蔓延，達到啟蒙與重視，主要仍是仰賴社會運動的形式。然，臺灣自解除戒嚴以來，雖然各種訴求的運動如雨後春筍般地生發在各地、各領域，但在本土社會工作領域的發展脈絡下，它都並非社會工作實務的主流方法，縱然運動得以創造機會讓弱勢／受壓／邊緣／少數群體發聲，伸張不公的對待，表達對政策制度的意見（王甫昌，2003），同時也能提升社會大眾對公義的關注。

1980年代到現今，公義的追隨者——社會工作者並未集結成「專業集體」，而是偏向零星和分散的現身參與，而參與比例也普遍偏低（宋麗玉，1987；陳婉琪，2014）。這現象同時也解釋了臺灣社會工作發展至今「基進」（radical）思潮的不盛行（宋麗玉，1987；王增勇，2005；鄭國生，2014），但卻未能說明現象背後的原由。他們是不知、不願，還是不能，以至於在運動場域中缺席、隱身？反觀現身在環境運動場上的社會工作者們，他們又是為何能、如何能？

三、參與環境運動的隱形拒馬、蛇籠與圍籬

長期研究臺灣環境運動的學者何明修（2006，p.14）表示，「環境運動是一種利益政治。」環運工作者所主張的訴求，對既得利益的優勢群體往往會帶來威脅與衝擊，此外，國家權力也並非置身度外，它的政策施行與立法內容不是朝著環運工作者訴求方向前進，就是反其道而行。

2016 年國際間發生國家權力強行介入環保運動的推動。曾於 2014 年 11 月編製「土壤和稻穀的重金屬污染調查報告」的湖南長沙「曙光環保」NGO 創辦人劉曙在 2016 年 10 月 11 日失蹤，據報導中國長沙市國家安全局以洩露國家機密為由而將其拘留（中央通訊社，2016）同年年底，該國政府更試圖將霾污染視為自然災害而列入到《北京市氣象災害防治條例》，以減輕政府在處理工業污染的壓力（狄雨霏，2016）。

回到臺灣本土有關環境運動所涉及的政治性角力。1986 年民間發起「鹿港反杜邦運動」，當時政府為了解決閒置的彰濱工業區，並提振低迷的景氣，而主張開放美國杜邦公司在鹿港設置二氧化鈦工廠，然而，鹿港居民有鑑於 1960 年代台灣化學纖維公司彰化廠在政策推動下運作以來，所造成的廢氣與廢水污染，影響在地居民的健康，也造成農作物的經濟損害，因此，鹿港居民誓言反對政府開放杜邦公司設廠，也發動了本土第一場的環境運動。這也是首件因為人民集體力量而成功的環境運動（維基百科，2016a）。

在早期的生態保育事件中，也看見另一股專家知識的權力系統進入到政策面與實務面牽動環境議題的走向。蕭新煌（1987）的研究指出，環境問題的探討最早是從專家學者開始，但在解嚴之前，他們的研究與論述少有發表的機會，然而卻發展出兩種知識權力的施展模式。

1971 年，經濟部核准台灣電力公司的立霧溪水力發電的開發計畫，主張環境保育的專家學者於是結合保育立場的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一同對抗支持開發的公權力，同時也以學理拉攏社會輿論走向，使得開發案於 1984 年 6 月胎死腹中（環境資訊中心，1997）。另一種模式的案例，首現在 1980 年，候鳥保育與當地窮困農民的張力。墾丁國家公園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與當地居民行之久遠的打獵文化發生衝突，因此一場結合官方、學者與居民的愛鳥座談會於焉形成，公權力與知識權力結合「說服」農民放棄打獵，並藉由媒體呼籲社會大眾揚棄「中國人的自私觀念與劣質飲食習慣」（何明修，2006，p.38-39）。雖然這是保育立場的

勝利，但在文化觀點上，也是公權力結合知識權力及輿論壓力來介入當地傳統文化生活的案例。

專家學者不僅成為政策建言者，也成為環境教育的社會啟蒙者。解嚴後的反核議題上，更有一派學者以草根反核運動作為抵抗路徑。由此可知，環境運動是為著特定的社會利益所採取的高度體制外行動，是一種涉及權力施展的抗爭政治（何明修，2006）。舉凡核能爭議、山坡地濫墾、森林盜（濫）伐而、砂石盜採、重金屬污染、農田汙染、違建與過度開發、地層下陷、垃圾焚化爐興建、核廢料存放等問題，深入探究會發現，沒有一項不牽涉到國家權力、地方利益、經濟民生，甚至國家安全等因素，因此，權力的施展、角力或協商都是必然的。

社會工作者雖非弱勢／邊緣／受壓迫／少數群體的一員，但所服務的對象往往是身處弱勢性（vulnerability）、邊緣性（marginality），及受壓迫性（under oppression）處境的群體，站上環境運動現場就等同於須對抗主流觀點、權威勢力、體制政策或既得利益者，如同前進路徑上阻隔的拒馬、蛇籠和圍籬流刺網，需要以肉身抵抗、穿越，冒著可能傷痕累累的風險。在設有路障的路段，前行，從來不是容易的事，當不能迴避、受壓太重，又力不能勝或窒礙難行時，如何能突破重圍（莊文芳，2009；夏民光，2004）？目前在臺灣的社工教育²⁴中，尚找不到以參與環境運動做為行動的方向與能量……

我也曾自問，社會工作者在工作場域中常要面對高案量、高壓力、低薪資、科層組織，甚至服務個案的暴力等壓迫，為何還要主張參與環境運動是必要之軛？難道不會淪為另一股的專業壓迫，加深工作者的無力感？然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卻顯示，社會工作者在經驗充權後，得以在意義、能力、自我決定和影響力的層面上展現權能感，對於工作的執行滿意度及組織承諾感也得以雙雙提升（Lee, Weaver & Hrostowski, 2011；Spreitzer, 1995；沈慶鴻，2015；林彥宏，2009）。

²⁴ 根據盧怡秀（2011）的研究顯示，全臺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大學部課程設計中，僅有 3 所大學開設社會運動相關課程。洪文潔（1996）以倡議觀點分析四本社工概論後發現，書籍偏向中立的立場與價值。

因此，若環境運動對於社會工作不僅是做為「價值理性」²⁵上的公義實踐，對於處在權力結構下的社會工作者身分，從隱身到現身的自我實踐是否也能夠提升面對壓迫來源的權能感，反而開啟面對自身所處的高風險工作性質與低劣勞動條件的另一條「反壓迫」路徑？！

四、鋪陳朝向環境公義的實踐路徑

長期參與勞工運動的資深社會工作者龔允倩（2012）在「反叛：灰頭土臉的行動學習」一文中曾表示，運動所形成的「實踐知識」會是社會工作者最重要的學術與實務資產。致力於消除社會不平等、不公義的前地球公民基金會台北辦公室蔡中岳主任，以社工系畢業而長期投入環境保護議題的他認為：「運用社工溫暖與具敏感度的特質走進社運，可以有更多作為，我們不能屈服於制度，要相信人為的制度是可以改變的。」（公益交流站，2014）

環境運動作為社會工作實踐的積極進路之一，是環境公義的倫理價值實踐，然而，在社會工作存在什麼樣的結構——在教育界、實務界和學術界，使對參與在環境運動的社會工作者感到無力？以改革為訴求的實踐路徑，必然無法逃避與主流觀點、權威勢力、體制政策或既得利益者的權力對峙，而持續投身於環境運動的社會工作者如何逐漸找回實踐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身為社工角色的他們生發出何種的認同與意義？環境運動又如何作為社會工作者在社會能動性的教習與深化？企盼藉由現身並投身在環境運動的社會工作者之主體實踐故事，得以尋找出「非主流」之環境議題與運動參與的實踐路徑。本研究目的整理如下：

- （一）瞭解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主體實踐經驗與意義。
- （二）發掘環境運動場域中，社會工作者所展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
- （三）學術、教育與實務上，發展以環境意識為出發的社工角色與實踐知識。

²⁵ 見註 10。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環境運動 (social mov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環境運動旨在追求「環境公義」的集體行動。運動所涉及的核心關懷，社會學學者何明修 (2006) 提出 4 個層面：環境保護、資源的公平分配、環境決策的共同參與，以及確保弱勢群體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得以維持；因此，在環境公義的部分則涵蓋 3 個面向：

(一) 分配正義：共同享有環境資源，公平承擔環境風險。

(二) 承認正義：尊重相異於主流的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

(三) 參與原則：環境的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 都能參與討論，平等行使環境的決策權。

除了「人際倫理」的公義價值追求外，本文還納入「環境倫理」的價值層面作為第 4 個面向，也就是由社會工作學者 Dominelli (2012) 所呼籲的——重視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共生的整全 (holistic) 關係，並以平等 (egalitarian) 為價值實現的目標。

二、能動性 (agency)

能動性是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範疇中涉及人類行動的概念，意指個體行動在被制約或影響的各種外部環境結構 (structure) 脈絡下，所展現的獨立自主和行動能力 (陳學金，2013)。

第二章 文獻與意識間的板塊運動

在書寫論文主題所涉及的相關文獻覺得就像踩踏在經歷板塊運動的地殼。自社會工作學門發展以來所形成的專業板塊間，隨著回應全球化與現代性的需要，「環境」的關注層面有著擴張學術與實務板塊的時代必要性；環境運動在興起的板塊中如同蘊含著改革動能的造山運動，但卻容易被擠向隱沒帶，沉潛在軟流圈中。地殼上的工作主體如何走進實踐的路徑？社工理論視角與實務取向是否就像地核般有著無形的引力，得以醞釀出實踐的策略與方向？

本章首先便是從社會工作視角再思「環境」的定位與意涵，顯露社會工作偏重「社會人文環境」(social environment)面向的主流發展脈絡，相對反映的是對「生態與物理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議題的排除背景。第二節則進一步梳理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從中又以「環境公義」作為共通的價值意識。繼而在第三節中，藉由耙梳臺灣社會工作的發展走向，深入探究「運動」(movement)在社會工作領域的邊緣位置，勾勒出社會工作者在運動場域中影響主體發聲的結構阻礙與去權(disempowerment)脈絡。最後，提出與環境議題相關的理論視角與實務走向。

第一節 板塊的擴張作用：「環境」在社會工作的定位與意涵移轉

「環境」(environment)是社會工作的主流發展面向，對社會工作者所服務的對象也息息相關。

早在 19 世紀，英國聖公會牧師巴涅特(Samuel A. Barnett)便以環境論出發，在東倫敦區設置湯恩比館(Toynbee Hall)，但所實踐的社會改革僅侷限在鄰里社區層次；雖然也勉勵志工參與社會運動，但僅是為了實踐對貧窮勞工的教育，而非訴請社會結構下權力不均的改革(黃彥宜，2007)。1917 年，Mary Richmond

在所推動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運動」中提出「社會診斷」（Socical Diagnosis）²⁴觀點，將個人與環境的互動過程與結果納入評估與介入（謝秀芬，2010）。1950 年代的心理暨社會派（psychosocial therapy），則進一步確立了「人在環境（或情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 or situation, PIE or PIS）的概念（張英陣等譯，2012）。1960 年代以後，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知識運用，則提供對各層次結構的關照架構結構，包括：微視系統（microsystem）、中介系統（mesosystem）、外部系統（exosystem）、鉅視系統（macrosystem）和時間系統（chronosystem）；進一步提升了對「環境」面向的關注（曾華源、黃俐婷，2006）。

1994 年，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 NASW）甚至正式提出，將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列入問題歸因面向，然而當時所關注的是以「人」為主體的環境觀點，對個體行為（individual behaviors）造成影響的外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仍只侷限在與個案直接互動的環境；縱然到了 1980 年代，批判取向的基變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充權觀點及優勢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開展開來，但仍偏重在探究社會問題背後的社會結構，排除了生態和物理環境（潘淑滿，2002；黃彥宜，2014）。

學者潘淑滿（2002）表示，並非生態觀（the viewpoint of ecology）不符合社工專業價值理念，而是在資本經濟主流意識的框架中，對社會問題的分析無法跳脫，因此助人服務偏向「殘補式」，也就容易淪為政府與既得利益者的「維穩」²⁵工具。此外，社會工作學門所奠基的「自由人文主義價值」（liberal humanistic values），以至於形成重「人文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輕「生態與物理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的走向（Dominelli, 2015）。社會工作者引以為實務準繩的美國及臺灣社會工作學門人員（NASW & TASW）倫理守則，所依據的是人類社會制度結構作為專業行為準則的制定，確實忽視了生態環境與人類社

²⁴ Mary Richmond 著有《社會診斷》（Socical Diagnosis）一書（謝秀芬，2010）。

²⁵ 同註 14。

會的互動關係（潘淑滿，2002）。

社會工作者的環境意識與所關注的環境面向，就在這股主流價值意識²⁶與社工專業價值所建構形成。因此，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今天，社會工作者需要在意識覺醒下「改變思維」。國外學者 Howe 主張，沒有最佳的理論及行動進程，最重要的乃是社會工作者要保持批判性與質疑的思維（引自陳香君等譯，2011）。如此，在評估微視、中介與鉅視環境時，才容易跳脫、轉化傳統視為非責任區的「以人類為中心」（anthropocentric）的典範與實務做法。

如何改變思維，以建構出回應符合環境正義的實務？出版《環境社會工作：從環境危機到環境正義》（Green social work: From environmental crises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一書的作者 Dominelli（2012）提出 4 個轉化面向：

- （一）重新思考人文主義價值及理論。
- （二）廣泛涵蓋理論框架。
- （三）為社會工作者創造鉅視角色。
- （四）洞察政治與經濟的影響。

在教育與實務層面，她則提出 13 種社會工作角色的建議，包括：促進者、協調者、社區動員者、資源動員與協調者、談判者、督導、顧問、倡導者、教育者、訓練者、文化翻譯者、心理社會治療師、科技翻譯員等。

總而言之，在既有對人文社會環境的關注，加上對生態與物理環境的珍視，如此全面性的關懷才不致落入宰制與被宰制、中心與邊陲的不平等關係，進一步實現環境與生態正義。

²⁶ 現存於社會的主流價值意識包括：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人類中心（anthropocentrism）、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消費（consumption）、進步（progress）、人類利益（human interests）及個人成就（individual achievement）等（Dominelli, 2012）。

第二節 造山運動後浮出：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的實務與價值連結

受工業化、現代化，以至全球化背後的主流價值意識影響，而相應被輕忽的「物理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 議題，遇到一個在專業發展中較為邊緣的「運動」(movement)，邏輯上不難理解「環境運動」在社會工作領域中容易被定位為「不相干」。

一、環境運動的萌芽與路線轉向

環境運動的全球興起，並非鑒於對自然的破壞、污染或人民的抗議，而是受到國家對世界的參與程度影響，在科學研究普遍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更是跨國界地帶動了其他國家的跟進。因此，各國視境內「環境保護」為己任的意識蔚為一時的主流常識。環境運動的推動起於政府或公益團體以宣導方式進行，這也是環境運動的萌芽開始與主流路線。

從西方的工業革命時期（19 世紀起），看到臺灣在 1950 年代，因工業化後所引發的環境污染與公害事件層出不窮。當時隨之所制定的環境政策，雖受到科學家、政治人物與資本家的認定，但卻與運動者的觀點有所牴觸，因此路線上開始分裂（蕭新煌，1987；何明修，2006）。環境運動者認為，環境問題不只是貪婪、無知所造成的極大化掠奪下的自然破壞，而有結構性的社會起源，並支配著環境的風險與承擔；此外，自然環境在一波又一波的科技文明與經濟發展而陷入破壞之虞，隨之可以預見的是一群經濟遭剝削、文化受歧視或政治被排除的遭難群體，他們被迫承擔著破壞的代價（何明修，2006）。1980 年代，本土環境運動因而大量發起，所揭竿的便是對於屢見不顯的公害事件，與高污染工廠建設的回應（鄭先祐，2010），同時，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也應運而起，如：學界中反核四人士組成的「新環境雜誌社」（1986 年的創刊號）；「新環境基金會」和「主婦聯盟基金會」的成立（1987 年 9 月）；以及強調「知識的、草根的、行動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1987 年 11 月）；以環境運動幹部為主的「台灣綠色和平

組織」(成立於 1988 年初)等；甚至，中央政府也於 1987 年，為回應這股潮流，於行政院設置了「環境保護署」，隨之在各級地方政府也設置環保部門，並提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的「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維基百科，2016c)。

總的來說，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受到權力和不均所牽動，從中引發的不公平現象便是環境無法永續的主因之一 (Pellow & Brehm, 2013)。晚近，環境運動逐漸所定位的是一項追求「環境公義」的集體行動，訴求資源的公平分配、共同參與環境決策，同時使弱勢群體生活方式與文化得以維持 (何明修，2006)；此外，提出「環境社會工作」(environmental social work) 實務典範的澳洲社會工作學者 Dominelli (2012)，再納入「生態與物理環境體系的尊重與重視」之觀點，所主張的實務取向是政治性的，重視人與自然相互依存和共生的全人 (holistic) 關係，也致力於平等 (egalitarian)，以免除社會區隔而造成的不均，同時也關注結構層面，結合基進與反壓迫觀點來促成父權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 (transformative)，達到公平正義的目標。

然而，當代在西方環境思潮更興起一波超越「人類社會制度的結構觀點」，以作為人類之反省為出發的環境運動。海洋暖化、冰帽融化、天氣系統變異等氣候變遷的結果，雖然反映人類在地球資源的過度開發使用、高耗能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停向大自然爭取生存空間的事實，然而，無論是氣候變遷，水污染、空氣污染、森林縮小、土壤流失、沙漠化或生物多樣性降低，都只是環境問題的「症狀」，真正的問題癥結是人類本身 (趙汝圖，2015；王瑞香譯，1996)。其中最具代表性與革命性的是提出「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強調「非人類中心」(non-anthropocentric) 之「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c ethics)²⁷的「環境倫理」

²⁷ 「非人類中心」(non-anthropocentric) 之「生態中心主義」的意識啟蒙，是由 Aldo Leopold 的「土地倫理」(the land ethic) 學說開始。他在 1949 年的《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是第一篇有系統的生態中心倫理著作。Leopold 在「土地倫理」中把生命所在的社區範圍擴大化，不僅植物和動物，還納入土壤和水，這些統稱為土地。對他而言，道德考量的對象在生命社區，任何在保存生命社區穩定、完整和美麗的行為就被評定為正確，否則就是錯誤 (王從恕，2001)。

(environmental ethics)²⁸學者 Naess。他認為，過去因著環境問題與資源耗竭所發起的環境運動，所針對的便是「人類中心主義」²⁹(anthropocentric ethics)的「淺層」(shallow)生態學——具有階級意識和區域差異，以人類為本位的環境政策和治理考量，人類利益全然成為實踐的量尺，環境價值則僅做為一種「工具性價值」³⁰；同時，該主張也是對「現代性」的反動，無論是現代生活、現代技術與現代性意識形態等都與所面臨的環境危機密不可分(洪如玉，2014；楊冠政，2002)。

二、回應「環境公義」的社會工作實務

社會工作的起源正是回應工業化社會所衍申的問題與需求，至今仍不斷回應著那父權資本主義社會的環境危機，包括以下 7 方面 (Dominelli, 2012)：

- (一) 自然環境耗竭，礦產採集及工業所造成的傷害。
- (二)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 (三) 有毒物質生產及廢棄物處理。
- (四) 空氣、土壤及水污染。
- (五) 物種滅絕。

²⁸ 環境倫理 (environmental ethics) 是依據所選定之哲學思維系統性地羅列出規範、人類所負有責任的對象，以及解釋如何被證成 (justified) 的一種學問 (莊慶信，2002；王從恕，2001)。因此，環境倫理學便是在探究人類與自然環境間的道德關係和倫理責任，是生態界整體和諧的道德基礎 (楊冠政，1996)。依照倫理對象的狹隘或擴散，環境倫理學普遍分成：「人類中心主義倫理」(anthropocentric ethics)、「生命中心主義倫理」(biocentric ethics) 和「生態中心主義倫理」(ecocentric ethics)，以及晚近的「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 (王從恕，2001)。

²⁹ 「人類中心主義」又稱人文主義 (humanism)，或人本主義，顧名思義是指人是世界的價值中心與最終目的；該思想蘊含在西方文明史中已有千年之久，是主流的西方文明社會思想 (楊冠政，2002)。在兩千多年前的希臘哲學家 Protagoras (約 485B.C.-420B.C.) 就已提出「人是尺度」的理論 (homo mensural theory)，以「人作為萬物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的判準，無論是存在或不存在事物，都分別作為存在或不存在尺度 (Angeles, 1992)。

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倫理依歸的生活型態中，人類自認為是世界萬物的主宰與萬物的尺度，不僅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運，同時也是自然的護衛者；人類以外的物質界與生態界被視為滿足人類需求的存在，而大自然被認定的價值就僅在於其工具性和實用性 (王從恕，2001；楊冠政，2002)。雖然生物體是一搜尋、獲取與轉變著工具性價值而壯大的一個單位，但其中的人類則是唯一被認定有內在性價值的存在，這也形成環境問題背後的無形根源 (鄭麗蓉，2012；王瑞香譯，1996)。

³⁰ 工具性價值意指利用他物作為目的達取的手段。內在性價值則是認為事物本身就具備的價值，毋須有附帶條件 (王瑞香譯，1996，p.237)。

(六) 永續發展及糧食安全。

(七) 旱災、水災等天災及重大事件。

在這些危機的風險評估中，社會工作者所服務對象的「脆弱性」是不容忽視的加乘影響，舉凡：健康不佳、欠缺因應能力者、移動困難、劣質住屋、缺乏對氣候變遷影響的認識與瞭解，加上社會對該脆弱群體的剝奪（黃彥宜，2014），再再降低對上述 7 方面的災變風險預防與變遷適應力，這也是「現代性」所形成的附屬產物（林萬億，2015）。由此可見，生態與物理環境的反撲，遭受最大負面衝擊的不會是因果論所指向的始作俑者的利益群體，而是少數族群、偏遠（貧窮）區域、殘障者、老人、孩童或婦女等弱勢／邊緣／少數群體（Haff & Polack, 1993）；在資源分配不均下，他們也是最困難因應、防範環境風險及從傷害中復原的一群。

Bailey 與 Brakey 在其 1975 年所出版的著作《基進社會工作》序言中指出，廿世紀的社會工作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安全網，藉其為受壓者、被剝削者止血、包紮，以達到社會系統的穩定（引自 Payne, 2005）。雖專業的立意不盡如此，然而，社會工作者的挑戰正也是在此，若僅從個人取向的微視環境面介入，而不從鉅視面的社會改革角度著手，將難以脫離殘補式服務的循環。學者 Moth and Morton (2009) 更強調，社會工作者應該致力於環境運動與倡議的投入，前端對脆弱性與風險的減少和預防，將讓實務更具積極性意義。然而，目前本土社會工作在環境議題的實務角色，仍偏向以災難發生後的救援與復原介入。

「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實務便是因應天災頻繁的廿世紀所應運而起。從天然災害的角度來看，遭難群體不僅不公平承擔著破壞後的代價，在國家社會父權式的救災體系中，也經驗著系統間與系統內的不平等。從劉珠利（2005）的研究來看天然災害下的女性族群發現，女性在面對天然災害時會有獨特的需要，但卻因著整體社會在社會化過程所被建構具弱勢性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性別角色——例如：她們在天災後為家庭或社區所做的付出，因著「家務」與「照顧」

性質而在體系中不被看見，甚至標籤自己為「無能者」³¹。不僅如此，女性往往缺乏資源與權力來因應天災所造成的外在環境變動與內在適應力，而性別因素的考量，卻又容易在父權式的救災體系中被忽略，甚至被貼上「被救助」化的單一標籤。然而，近年來的反核運動現場，有一群女性發揮其主體性，為著世代正義與環境正義集結成立「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³²，以監督政府所建構的能源政策與施政，不僅對外發聲、施展其主控權，更有別於其他運動類別，格外展現其社會能動性。

以社會工作的價值信念與宗旨來看，相較於其他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與實務範疇她是更有機會接觸邊緣人口與社區，因此，在處理環境變遷下的環境不公義與經濟剝削議題，該角色提供了近距離瞭解的位置（黃彥宜，2014）；加上社會工作者在有關倡議、社區發展、合作、建立網絡，以及跨學門網絡等實務訓練，更是環境公義推進的助力（Schmitz, Matyok, Sloan, & James, 2012）。

三、同揭以「環境公義」為名的價值實踐

對於社會工作者而言，無論對眼前與手邊的實務工作掌握多深，介入方向與策略都還是須由社會工作者所判斷而形成行動，而 Howe 認為，「判斷」是一個道德議題，除了納入多元理論與辯證外，仍須以倫理價值做為考量來形成判斷（陳香君等譯，2011）。

社會工作是一項助「人」的學門，從發展歷史脈絡來看，社會工作的倫理價值便想當然爾地著重在「人文社會」環境。對照現今社會工作者引以為實務準繩的「美國社會工作學門人員倫理守則」（NASW），以及「臺灣社會工作學門人員倫理守則」（TASW），所依據的是強調人類社會制度的結構觀點，因此所導向的是社會環境的概念，而非生態界與人類社會的互動關係（潘淑滿，2002），

³¹ 意旨自我價值低落的狀態。

³² 2012 年 12 月成立，該團體之主要訴求有：台電公開所有真實狀況與數據，成立與公民之對話平台。凡有危險疑慮之核電廠皆不應運作，核四廠立刻停止興建。檢討並研擬新能源政策（維基百科，2015b）。

對於在環境運動的價值追求也就偏重在人際倫理層面的環境公義追求。

雖然，「人際倫理」與「環境倫理」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但環境倫理學者 Rolston 認為，整全的倫理學仍是要納入兩者，而非厚此薄彼、有所偏頗，以顧及人類以及人類以外的全體福祉（鄭麗蓉，2012）。此外，一個合宜的環境倫理學說，必須著重兩個層面（王從恕，2001，p.27）：

1. 生命個體價值：追求人類和其餘物種生命之間的真正平等。
2. 生態整體價值：維持生態圈整體的穩定和平衡。

近代環境倫理的價值信念已自人類中心擴展至非人類中心；人類的倫理關係也已突破單純對人際關係的著重，而把動、植物及自然環境等整體生態界納入關切重點。社會工作學門在這浪潮下的工作範圍該如何界定？學者 Gray 和 Coates（2012）在“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s responsibility to the non-human world.”一文中提出 8 點的思考方向：

1. 生物多樣性是否是社會工作者該關注的重要焦點，如果是，為什麼？
2. 寵物療法或以寵物作為介入策略是否構成社會工作實踐的一部分？
3. 社會工作者是否關注農業，特別是導致土壤侵蝕與流失的耕作方式？
4. 社會工作者是否應關注對土壤、水和食物所造成的化學污染，如果是，為什麼？
5. 社會工作者是否應參與環境與土地的修補與復原？
6. 社會工作者是否應該關注狩獵，特別是那些瀕臨滅絕的物種（例如：為象牙殺死犀牛），或關於任何目的而被殺害的任何動物？
7. 社會工作者可持續發展、促進以人為中心的工作焦點嗎？如果是，如何進行？
8. 社會工作者是否應該促進對未受破壞的原始土地或景觀之保護？

Berger 與 Kelly (1993) 進一步將生態觀點，融合社會工作助人價值，建構出「社會工作生態倫理信條」(ecological credo for social workers)。條文共 12 條：

1. 不僅關懷人類與環境的互動，同時也應關切地球所有生態系統的相互關聯性。
2. 促進人類個體自主權，也同時尊重環境的自主權。自我尊重和尊重自然是密切相關的。
3. 主張全球性的平等，全人類都應平等共享權利，創造人與環境的和諧關係。
4. 旨在建立促進人類長遠福祉、資源永續發展的社會與經濟政策。
5. 有責任促進尊重生物圈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系統，以扭轉破壞生態與資源枯竭的現行做法。
6. 相信自然資源與環境是有其極限的。
7. 重視多元價值，並將這種價值推論到所有生物。多元性被視為所有系統的復原力。
8. 認定一個全球和普遍的觀點，在於人類與環境很難區分，人類也並無優於其他生物。
9. 推動地球公民對地球資源的妥善管理。
10. 在科技文明造成現今或下一代的環境破壞與人類生活品質惡化時，有責任義務發聲。
11. 相信人類智慧可以創造人與自然環境雙贏的永續關係。
12. 相信人具有善良的本質，自願承擔對生態負責的生活方式。

綜上，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擁有共通的基本價值。對社會工作而言，環境運

動得以作為鉅視面實踐的進路之一，因此，探索本土社會工作者從圈外，到進入環境運動的轉折故事與價值信念，有助於環境社會工作的鉅視實務角色創造與實踐知識的累積。

第三節 向下潛至隱沒帶：在專業結構邊陲的「社會運動」

環境運動的訴求在於為生態與物質環境發聲，想當然爾的，所抗爭和針對的對象是共存在地球的人類；運動（movement）也就必然涉及社會力的凝聚。此外，在本土社會科學的學術發展過程，「環境運動」又隸屬在「社會運動」的運動類別，而社會運動在本土的發展有一定的時日，因此形成相對綿密的發展脈絡，文獻也就相對豐富。因此，本文所使用之「運動」一詞乃是鑲嵌在「社會運動」的意義，意指一群人為著共同目的而主動現身、集結發聲，為達社會變遷與社會改革目標的持續性集體行動（王甫昌，2003；何明修，2005）。

因而，本節將以「社會運動」一詞作為文獻蒐集與分述之關鍵詞。首先會以臺灣社會工作的發展與走向的脈絡下，探討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兩者間的關聯性，以凸顯社會工作者所處養成結構的樣貌，以及社會運動在本土社工專業的排除脈絡，藉此勾勒出以社會運動作為社工實務手法，可能在專業知識體系與政治經濟結構所遭遇的結構阻礙與去權脈絡。

一、社會運動與社會工作在歷史脈絡下的關聯：價值中緊密，實務中疏離

社會運動是什麼？與社會工作有何關聯？兩個詞彙所共有的「社會」是什麼意涵？「工作」與「運動」這兩個相異詞意中又有何共通之處？社會工作是一個奠定在「價值」基礎的專業。社會工作者的實務選擇與行動方向，不僅依據理論觀點，價值倫理也成為指引。由此可知，社會工作實務的每一個面向都受到價值的影響。

社會公義正是社會工作所追求的價值之一，更也是專業發展的基石（NASW,

1996；IFSW, 2014；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CSWE], 2008）。學者林萬億（2015，p.682）如此描述，「社會正義是社會工作者的靈魂。」社會工作者所依循的「價值」取向，也反映出對於人性、改變及內在價值的基本信念，Hunter 與 Saleeby 在 1977 年發表的文獻中提到，「由於社會工作的主要關懷點在於『人』和『人類』的發展，社會工作的價值必須講求人道、人情味，也必須包括公平的原則，顧及社會正義，同時也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資源管道以及自我能力的解放。這些價值需要社會工作者扮演將大眾從緊繃、壓迫的社會環境中解放的角色。」（引自張英陣等譯，2012，p.143）

學者 Thompson（2002）認為，社會運動正是扮演著促進社會公義的角色，對於發展社會工作實務具有解放形式的影響性，社會工作也因此得以藉其擺脫傳統「個人取向」的治療模式——缺乏對更廣泛文化和結構的關注，而參與在改善社會，挑戰不公義、歧視和壓迫的實務。如此看來，兩者共同目的皆是在社會環境脈絡下，以弱勢、邊緣、被壓迫及少數群體的權益／權力／權利做為付諸行動的訴求核心。

然而在臺灣，有關公平正義的議題往往口說多於實作——教科書上的出現頻率，往往大過實際的實踐，「社會運動」往往也就停留在社工專業知識的象牙塔內，難以出走。

在社會運動蓬勃現跡在臺北街頭的 1980 年代，是公部門約聘社工人員不斷擴增的時代，但福利、待遇、地位皆不如公務員，甚至必須承擔許多庶務性工作，因此流動率高，造成經驗也無法傳承（張煜輝，1991）。為了維護社工權益、專業發展，以及解決省市約聘社工的納編問題，部分學者起而訴求社會工作證照制度的研擬，卻歷經立法的一再延宕，因而在 1995 年 10 月 26 日發動請願遊行（林萬億，2012），這是本土社會工作者第一次為自身與整體社群之勞動權益發聲的街頭遊行，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動員了近三千名社會工作師生與實務工作者。1997 年 4 月 2 日在「社會工作師法」公布施行後，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工作師考

試成為執業門檻的設立。以單一方法企求離開勞動條件不足的「邊緣」位置，一步步以「證照化」作為走向「專業化」來奠定專業位置與勞動保障的背景下（王增勇，2012），「個人取向」的治療模式便逐漸發展為主流的專業走向，間接地邊緣化了「社會運動」在知識權力建構的位置與價值；形成未來社會工作者的養成結構——一個讓「社會運動」落在邊陲的結構。

二、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結構阻礙與去權脈絡

（一）專業知識體系

若要更進一步瞭解社會工作者的養成結構，首先須回顧社會工作學門的歷史發展。社會工作的源起是建立在具高度「社會性」（sociality）的關注，19 世紀工業革命後，惡化的生活環境、社會問題的重重，使得以下兩條運動路線的出現（甘炳光，2010）：一條是十九世紀的 Mary Richmond 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運動，另一條則是 Jane Addams 的睦鄰運動（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前者對問題成因偏重在個人特質與道德因素，以個人改變與適應等微視面作為解決策略，進一步帶動了個案工作及治療服務的興起；後者則是歸因於不公義的社會結構，以走進弱勢群體，改革社區及社會中有關貧窮、被剝削、受壓迫等鉅視面問題為目標（潘淑滿，2002）。美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便是由這兩條路線所匯聚，並引領著社會工作的發展走向。直到，美國社會工作在企圖得到社會認同，冀求藉由理論依據的工作方法來奠定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因此朝向個案工作手法，並選擇主流的佛洛伊德分析學派作為理論依據；因此，欠缺理論支持的社區工作就在這專業化過程中式微（王增勇，2012）。近代，美國學者 Shaw（2011）即針對 NASW 的成員進行調查研究，全面性瞭解社會工作者的環保意識。研究發現，縱然工作者具有環境保護的信念，然而在知能上卻與一般社會大眾不相上下，以環境意識為出發的實務與教育也闕如。

臺灣的社會工作隨著美國的發展腳蹤前行，移植了「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式的知識體系，雖然挑戰了傳統社會階級的權力不平衡、社會

制度的歧視，然而社會工作學門的走向卻愈來愈朝向個人輔導與心理治療的醫療模式——一條「治療化」(therapeutisation of social work)的「主流」走向(潘淑滿，2002；甘炳光，2010)，傾向父權主義式的利他模式。助人關係中也就偏向視社會工作者為專家的權威型角色，加上臺灣最早的社會服務部乃是設立在醫院體系——公立醫院，故醫療模式在本土的發展上似乎是如魚得水。然而，「病理觀點」、「問題個人化」的強化，卻容易在評估角度上僅形成「責備受難者」，而欠缺「責難制度」，甘炳光(2007)建議，採「社會建構」的角度來看個人在社會功能上的阻礙、限制與問題，則可以提供一種解套之道。

1980年代的社會工作不盛行「基進」思潮(宋麗玉，1987；王增勇，2005；鄭國生，2014)。宋麗玉(1987)的本土研究顯示，作為社會運動發源地最多的台北市，其社會工作者在實際參與行動上僅有8.5%，遠低於所生發基進意識的比例。社工系學生在某些程度上也呈現「重直接、輕間接；重微視與中介、輕鉅視」的傾向，偏廢政策、法規與管理上的知識追求(賴兩陽，2004；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2008)。雖然早期社會工作教育是附屬於社會學系，然而，在賴兩陽(2007)的研究顯示，全臺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有開設社會運動相關課程的也僅有3間(12%)學校。反觀，在倡議課程的開設則相對高許多，然而在洪文潔(1996)、古允文與洪文潔(1998)的研究顯示，若以倡導觀點作為四本社會工作概論教科書的分析，教材的編寫仍呈現「非變革」的走向。

近年來，劉庭歡(2013)針對新北市社工系學生對社會工作者形象所做的研究發現，社會工作者的「照顧」者形象認同仍是高於「改革」者形象。結果顯示「溫柔婉約型」多於「社會倡議型」，此外，前者的形象還有助於社工系學生在畢業後投入於本業。盧怡秀(2011)的研究則顯示，社工系學生普遍養成為「規訓³³」的身體，欠缺批判意識與挑戰思維，學生的覺察意識也就沉潛在這教育的結構中。進入實務界後，無論是私部門的高案量、高風險、低薪資等勞動條件不

³³ 規訓，為 Michel Foucault 在 1977 年所出版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中所提出之概念，意指作為一種人體細節的政治性干預模式。

佳的工作環境，或是強調服從性、政治中立和一致性思維的公部門，更加容易室礙了參與社會運動的意向與動能。

回觀去年「太陽花運動」期間，在立法院外圍靜坐人數的職業別和科系別上的參與比例，以公平正義為專業價值的社會工作者和社工相關系所學生的人數並未顯多，甚至連一成都不到³⁴（陳婉琪，2014）。在本土社會工作學門中，以「社會運動」作研究主題的期刊論文也甚少³⁵，不僅反映了對「社會運動」議題的關注性極低，這同時也間接顯示，社會工作者在參與運動議題上的「分散」性。所以，學術上探討社會工作者參與運動的文獻，僅出現在個人的敘事研究和現象學的探索等類型，要能夠發展成量化研究則尚有一段路要走。

根據上述，社會工作者參與社會運動並不普遍，然而在這專業知識體系的發展脈絡下，投入參與社會運動的原因為何，盧怡秀（2011）提及，社會工作者的投入參與和社會工作學門無直接關連，而是開放的多元風氣、興趣與特質的影響。此外，研究還發現，縱然社會工作的「主流」走向並未存有社會運動的定位，但藉由主流走向的外化（externalization）³⁶與覺察，因此對於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認同也不致造成影響。該研究也發現，結合社會運動的社會工作，可以在實務上促進一種長期且根源性的改革，也是創造工作者與主流社會、政府的對話與行動位置。

綜合以上，社會工作者的抵抗身影是不易在檯面上³⁷被看見的，往往僅限縮在社群網站及小眾網路媒體³⁸的報導。比如：「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在 2015 年 3 月 22 日於 Facebook 社群網站上的社團版面，發表參與 3 月 14 日的「反核大遊

³⁴ 同註 16

³⁵ 以「社會運動」作為關鍵詞，並在系所欄位中設定為「社會工作」做檢索，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顯示出的結果，僅有 7 篇碩士論文，以社會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的有 4 篇，偏向關注個人的探究與實踐、運動的策略、限制與機會，及政策議題的批判分析；而全球提供最多臺灣期刊電子全文的華藝線上圖書館，則掛零。

³⁶ 為充權實務的技術之一（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2004）

³⁷ 檯面上用以比喻為：大眾媒體、學術文獻、教科書及體制內的正規課程等。

³⁸ 舉凡：NPOst 公益交流站、香港獨立媒體網等小眾媒體，以及在太陽花運動期間，在 Facebook 社群網站組織的「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我是社工，我不服」社團。

行」，版上的內容寫著——「揪社工夥伴們一起參與反核大遊行，一路上遇到許多參與不同議題的社工……」（引自翻轉社工學生聯盟，2015）。在太陽花運動後，「NPOst 公益交流站」也刊載一篇名為「台大社工所林玲安：社工也要勇敢站出來對抗體制與捍衛專業」的文章，呈現一名一路從大學本科系到研究所的社工所學生林玲安在社會運動的抵抗身影。「曾因大埔事件、反核遊行上街，但是卻都是一次性的經驗，從未主動長期的參與社會運動——一直到3月18日學生闖入立法院之後「以往較多是前往機構做直接服務，但這是我第一次深入的投身社會運動。」林玲安給社工系學生的建議寫著：「社工的教育中，常常強調我們是要真誠溫暖的去助人，但卻很少告訴我們要學習對抗體制。但我們不要只學習當一位真誠、溫暖的助人者；我們更可以是帶著堅定意志來對抗體制的助人者。」（引自張傳佳，2014）在這篇報導中，可以看見參與體制外的社會運動，讓她的助人者角色更為多元與擴展。大學與研究所皆接受社工養成的胡哲瑋（2015）則是在接觸到華光社區的開發議題，才開始質疑不曾質疑的政府結構，也逐漸開啟對社會議題的關注，短時間內他的個人經歷寫下一連串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找到實踐助人角色的主體性。

綜觀來看，社會工作學門的走向與社會工作者的養成教育息息相關，且互為因果地發展。自社會工作學門發展以來，社會工作者與社工系學生的「非變革」的偏向，反映了移植美國社會工作後，本土社會工作在內涵與走向的大同小異。對於變革取向的社會運動，參與的關鍵便不在於與社會工作學門本身的關聯性，反而是社會開放的多元風氣、興趣與特質的影響。由此可見，在教學現場與教科書中隱藏的運動知識，便是專業結構下的結果，間接形成對運動參與的窒礙原因之一。

（二）社會政治結構

社會工作對於制度改革鮮少批判的助人者特性，不僅是受到偏廢基進社工思潮的教育體系影響，也與接受政府扶植而依附發展的發展脈絡有關（鄭國生，

2009)。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也就是解嚴前，社會工作是被中國國民黨政府使用來清除日人的「遺毒」、宣揚三民主義的「政治性」工具，以達到統治障礙的鏟除目的。社會工作的黨政化一直延續到 1970 年代（林萬億，2012），無論是約聘社會工作人員的實驗、社會工作的分組教學等，對於「社會工作」的認定與需求，都受到政府政策的推動所牽動。移植性強烈的社會工作，對當時的執政者而言，是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以至於發展上形成「被馴化」的性格（潘淑滿，2002；古允文、洪文潔，1998）。

此外，臺灣社會福利體制造就了政府的權威性角色，因此，對於公、私部門機構及其社會工作者都具有控制的合法性。1980 年代，面臨中東石油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臺灣政府當然也無法置身於這衰退洪流，因此，為了削減社會福利的承擔，跟隨了福利保守主義的步伐，以及管理主義的方針，因運而生的是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公、私部門也走向夥伴關係的工作模式。著重在成本效益的立基之下，以市場化邏輯鼓勵民間非營利組織競標，替代政府提供服務；所執行的「契約外包」與「公設民營」模式，對社會工作者實踐鉅視面價值信念形成了間接地阻礙——政府單位同時扮演監督者角色，以經濟效益作為定期評鑑或評估機構服務的指標。然而，立基雖然美好，卻也不得不承認在實踐上有其限制、困境與兩難，舉例來說：私部門在契約延續的機構生存課題上，便須依附在政府政策與規範下，形成權力不平等的關係（黃培潔，2014；潘淑滿，2002；江亮演、應福國，2005）。因此，社會工作者便不易或不被鼓勵去抵抗不公義制度與政策，而繼續將精力、時間，甚至超負荷、超時地投注在個人、家庭及團體的微視問題，同時也是符合評鑑或評估指標的層面（甘炳光，2010）。

當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逐漸在這結構制度下消磨殆盡時，他／她的主體便容易在勞動過程中異化³⁹——專業關係也就淪為達到評

³⁹ 同註 4。

鑑效能的不得不與手段。然而工作者也容易進入到 Fromm（1969）所說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狀態——「官僚組織阻礙了個人思考和感覺的自由，使得個人無法產生批判性的思考，當個人的思想受到壓抑，他只好轉向非理性、非創造性的方向發展，此時個人藉著『與他人一致』、『符合他人及社會期望』的順從態度，消除自己的不安及焦慮，消除自我與世界的矛盾，但同時也喪失了寶貴的自由。」（引自柯佳伶、李杏津、陳永男，2009）

綜合上述，本土社會工作學門的建制與發展，涉及學術菁英、主流專業組織，以及政府以權力介入的痕跡（黃培潔，2014）。若要以運動路線重回社會公義價值的實踐道路，社會工作者勢必會面對專業知識結構，以及社會政治結構等兩個主要面向。因此，對本土社會工作者或社工相關系所學生而言，以社會改革做為訴求的運動參與，會是一場回歸主體與自由的行動，不僅是針對所服務的對象，更是以身為一名社會工作者。

第四節 地核的引力牽拉：理論視角與實務取向

社會工作如何回應物理與生態環境中的弱勢與風險需求？運動背後的結構阻礙要從何種理論視角切入？可以從哪些實務走向切入我們的關懷，深化我們的工作？以下將分別爬梳。

一、理論視角

從第三節的文獻脈絡來看，社會工作者在參與環境運動所面對的結構面向是：排除「環境」與「運動」的主流專業與社會政治結構。一個結構下的個體，是否能夠在自由意志的運作下展開主體行動的關鍵，正是與「知識解構」與「權力解放」運作息息相關。

充權的發生在於啟發個體在自身問題及所處環境的覺醒（李怡娟，2003）。因此，社工充權是一場回歸主體與重拾專業自主性的行動，同時也會是解決個體

或群體微視層次的重要過程 (Kandrat, 2002; 曾華源、黃俐婷, 2006)。以下要相繼探討充權內涵與發展背景、社工充權的重要性, 以及本土社工充權的相關研究, 以瞭解社會工作者在專業知識結構以及社會政治結構所經驗的無力感與充權歷程, 作為專業主體與社會能動性建構的立基與依據。

(一) 充權內涵與發展背景

充權 (empowerment) 概念的發展要回溯到巴西教育學家 Freire, 因著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而在 1940 年代推動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Freire 藉由教育進行政治性與文化性的解壓迫行動, 不僅喚起農民與工人的受壓迫思維, 也發展其「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1970 年代, 他所提出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便是充權概念的孕育土壤, 所提出的「批判意識的覺醒」(conscientization) 這概念, 強化了充權的理論性基礎 (引自 Adams, 2010)。Freire 認為的充權, 乃是「傾聽-對話-反思-行動」的連續過程, 弱勢/少數/邊緣/受壓迫族群在這往復的傾聽與對話中覺察、反思社會環境的壓迫, 進而展開行動以解除個人或群體掌握生活的阻礙 (引自方永泉譯, 2009)。

當代充權觀點的討論、援引與實踐不僅在教育學門, 也被廣泛使用在社會工作和當代文化的其他領域, 舉凡: 心理、社會、政治、管理及護理等; 但如今仍未有權威性 (authoritative) 定義 (Ackerson & Harrison, 2000; 莊文芳, 2009; 趙雨龍等, 2004)。另一方面, 在批判典範的知識論立場下, 由誰來建構定義——服務使用者、工作者、專家、研究者, 還是機構管理者——也是未形成明確意涵的本質原因。

社會工作領域中最早提出充權概念者為 Barbara Solomon, 出現在 1976 年所出版的著作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y” 一書中。該書的成書背景是美國社會運動蓬勃盛行的 1960 年代末, 黑人權力運動、美國公民權運動, 及反越戰學生示威遊行等相繼推動, 而同時期的西歐國家也是示威活動頻繁。該作品乘著這運動的浪潮而發表, 揭露美國黑人長期在社會網絡

中所受到的歧視與污名，該書作者建議以充權取向來協助該結構中的個人或群體，以排除自我實現與社會參與之直接與間接的權力障礙，達成降低污名化團體無力感的目標；不僅將理論付諸實踐，也藉由社會行動轉化了污名與歧視經驗（引自 Adams, 2010）。對 Soloman 而言，無力感的來源來自三個層面：受壓迫者的心態、與大環境之間的互動，以及鉅視層面的環境結構；充權的目標，便是藉著對抗不公平的社會結構與制度，來消除個人或弱勢社群的無力感。

如今，充權在社會工作領域發展過程中，也已經成為顯學，但其本質與目的都仍未能有所共識（Payne, 2005），無論是微視的專業關係和工作方法，或鉅視的社會權力及資源分配，所形成的是多元面向的意涵。在實踐上，有的視充權為一種過程；一項成果或效應，也就是獲得權力的狀態；或將充權視作一種觀點、社工實務的方法或社工研究的目標（Ackerson & Harrison, 2000）；有的則將它視為一種解放的行動；或是「自我價值」的表現；更有直指社會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充權的專業（DuBois & Miley, 2012）。

依據《社會工作辭典》（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的解釋，它在：「幫助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在個人、人際、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提升，以改善其情況的實務過程。」（NASW, 1996）實務上，不外乎：減少個人行使權力的個人和社會障礙；協助弱勢社群重獲並行使作為個人、組織與／或社區成員所被賦予的權利和權力；強化對權力運用的自信與能力，以參與在改變自身不利的社會位置；取得足夠資源來解決問題，達到生活品質的提升、對生活的控制感。以上所反映的是偏向服務對象角度的定義（Solomon, 1976；Parsons, 1991；Adams, 2008；趙雨龍等，2004）。Simon（1990）、Payne（2005）則進一步解釋：充權，作為一種運用策略來消除、扳轉、降低對弱勢社群的支配（subordination）及壓迫，展現對妨礙平等行使權力的抵抗行動，使個人和群體獲得對自身生活的決定權和行動權。此外，充權也涉及個體的信念價值、民主理念與公民參與，如 Rappaport（1987）所言，其乃是「個人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在社區生活中實踐

民主參與；參與的方式可透過學校、鄰里、教會及各種志願性組織。充權是個人、組織和鄰里等多元面向的概念，著重於人所處的特定脈絡；不僅是個人展現自我掌控與影響力，也同時展現對社會行動、政治權力與法律權利的影響力。」（引自 DuBois & Miley, 2012, p.27-28）

據此，充權可指為一種主觀權能感受的獲得，同時也是社會結構上權力重分配的客觀結果；涉及個人內、外在對事務的掌握，個人及人際權力的施展，也是社會影響力、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DuBois & Miley, 2012）。

（二）充權在社工的實踐面向

自 1990 年來，充權觀點在社工專業的走向仍著重在以服務對象作為訴求目標，例如：青少年、老人、婦女、新移民及經濟弱勢者等；根據文獻顯示，充權對社會工作者本身而言也同為重要且必要（Pinderhughes, 1983；Sherman & Wenour, 1983）。

社會工作者雖然不是社會的弱勢／邊緣／受壓迫／少數群體，但卻身處在機構、文化、社會制度與政策，及全球化等多層次權力交疊，又環環相扣的社會環境脈絡；其中結構下的權力關係會交織出一蘊含驅力的動態位置，間接形成一條隱形的權力繩索牽引或拉扯專業關係的走向。Hasenfeld（1987）認為，這條權力繩索的另一端不僅需要協助服務對象，同時也要平權地行使權力，社會工作才會更具發展性與建設性。這先決條件是社會工作者的權力意識覺察與權能感的提升。

壓迫處境存在於社會經濟結構，包含：主流意識信念、社會標籤與控制、社會權力不均，及社經階級地位落差等情境（鄭麗珍，2002）。在這處境為服務使用者爭取權力、權利（rights）與權益（interest）⁴⁰時，社會工作者有時也會陷入權能阻礙而成為弱勢或受壓，形成無力、挫折、沮喪及效能感低落的狀態，以致

⁴⁰ 學者趙維生（2003）認為，權力、權利（rights）與權益（interest）乃是培力所要排除的政治與文化障礙中，所涉及的三個面向。

行動與策略無法開展來排除結構相關的阻滯事物、制度與關係（莊文芳，2009）。夏民光（2004）直指，「社工充權」便是在排除社工在進行「服務對象充權」時的關係與事物阻礙，目標都是以服務對象為核心，所以兩者乃是一體兩面；這也代表著一名被去權（disempowered），有著無力感（powerlessness）的社會工作者，是很難去充權服務對象，為弱勢者發聲、倡權的（顏祥鶯，2007；沈慶鴻，2009）。內在「小小社工」⁴¹的標籤會牽制著他外在的行動，以至於困難同行在服務對象的受壓處境。

Richan（1989）分析闡明社會工作者經歷無力感與被去權的過程。起初社會工作者在實務過程中會不自覺或身不由己地受制於外在環境、體制與權威者，呈現困難於向他人施展權力的狀況，在欠缺情緒處理能力、技巧、知識，或實質資源來有效執行角色下，逐漸會對自己的能力感到無望，又或落入「壓迫共謀」（complicity of oppression）的處境（Minow, 1985），最後便參與在對自身主體的壓迫。

綜合上述，以社工為脈絡的充權乃是協助覺察到壓迫實存的社會工作者重獲、發展、運用與行使專業身分與社群中所被賦予的權利和權力，來排除阻礙弱勢社群中的個體或集體取得權力（利）的過程；在經驗充權後，得以使個人在意義、能力、自我決定和影響力的層面上展現權能感，對於工作執行的滿意度及組織的承諾感也得以提升（Lee, Weaver & Hrostowski, 2011；Spreitzer, 1995；沈慶鴻，2015；林彥宏，2009）。

有關充權的實務面向，Saleebey（1996）將其分為兩個部分：個人性充權（personal empowerment）及社會性充權（social empowerment）。前者強調的是協助個人取得、使用自我決定權，並為自身負責；後者則是在個體所處社會情境中，增加資源取得的機會與運用。在 Ruth（1998）的研究，則多了人際的面向，共涵蓋 3 個層面：

⁴¹ 沈慶鴻（2009）提出之名詞，乃是去權社工常自稱的詞彙。

1. 個人面向：自尊、自我接納、自我信念、自我意識的提升，以及擁有權能感。
2. 人際面向：自信、人際界線、獲得批判性思考、學習問題解決的更好策略，及懂得向外尋找協助。
3. 社區面向：政治參與等。

徐震、李明政（2004，p.140-148）將充權行動則分成 3 個層次，包括：個人層次、與人際直接互動的人際層次，以及包含各樣直接、間接人際關係結構的社會層次。在充權的實踐原則，Payne（2005）則提出以下 5 點：

1. 充分認識他人的優勢與能力，避免負面標籤。
2. 個體皆擁有被傾聽、自主生活、自主決定、界定問題，以及採取行動的權利。
3. 問題的產生不僅反映了個人的不適當性，也反映出政治與經濟性的壓迫和權力議題。
4. 集體性行動所形成的影響力相對更大，在實務中應以此發展。
5. 實踐理念可能牽涉到促進（facilitating），而非主導或挑戰壓迫。

雖然充權在實務引導上具有啟發性價值，Ackerson 與 Harrison（2000）的研究卻提醒，就算身處同文化、同實務場域的實務工作者，其所認定的充權意義也會因著服務對象所處的情境脈絡及所處的組織環境而有所不同。Yip（2004）也指出，從西方發展而來的充權觀點在華人社群的運用，也需注意到概念化與實踐上的限制與困難。

此外，在助人關係中，社會工作者的助人角色位置及其專業知識，容易因著專業主義的關係高抬工作者的權力與權威性，所以，一位無法覺察並意識權力元素的社會工作者，不僅會傾向看不見缺乏權力者的壓迫處境與社會脈絡，還容易

以壓迫的形式來「促」進服務對象的自主性（autonomy）與能動性（agency），不僅淪為「反充權」，更強化了受助者的弱勢位置（Hasenfeld, 1987）；在實務的評估、介入，也容易不自覺地融入主流社會的價值與觀點，甚而歸咎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或成為施加壓迫的社會控制工具（王增勇、郭孟佳，2007）。

另一方面，覺察助人關係的權力元素，雖不至於責備弱勢者，但對於長期挫敗於在結構環境施展權力行動來面對壓制的社會工作者，卻容易造成「問題內化」⁴²的危機——內在積累出的焦慮與挫折等負面情緒，會使得工作滿意度和自我效能感雙雙滑落，心理內耗而陷入自責或撤離的可能性就會相對提高（Hasenfeld, 1987；林彥宏，2009；謝盛瑛，2013）。

因此，充權實踐有個關鍵性的前提，乃是意識覺醒。Freire 認為，對結構不平等和壓迫所發出的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能夠增強人們的權力感（方永泉譯，2009）。Gutiérrez 早在 1995 年的研究中也提出相同的見解，認為意識的提升能夠促進充權這論點（Payne, 2005）。轉變就在意識覺醒後發生，同時也能夠免除人們在自身問題中自責、退縮，反而能夠加強承擔個人責任，積極投入在改變的創造。

（三）臺灣「社工充權」的相關研究

鄭麗珍（2002，p.415）的研究顯示，弱勢社群的無力感主要來自 3 個層面：1.對自我的負面評價及態度；2.與外在社會系統互動的負面經歷；3.鉅視環境經常加諸他們的障礙，阻礙了他們採取有效的行動。然而服務弱勢社群的社會工作者的無力感來源又是什麼呢？由於充權在臺灣本土文獻的翻譯名稱不一，有稱培力、賦權，也有稱增強權能，以下以 2 篇調查研究，1 篇深度訪談的論文作為初步在深度與廣度上的瞭解。

在沈慶鴻（2014）針對全國 21 個婚暴防治機構做抽樣調查的研究提到，婚

⁴² 台灣文化乃屬於雙元文化，融合了西方文化和華人文化（Yip, 2004）；這兩者皆傾向將事情的失敗做個人歸因，同時也內化個人問題（趙雨龍等，2004）。

暴社工的去權因素來自組織、結構因素的壓迫和限制；所造成的無力感困境包括：專業能力受質疑、對服務對象無能為力、害怕犯錯、懷疑自我能力和服務成效，以及因擔心暴露不足而怯於主動聯繫網絡成員的去權狀態。在這背景下，研究者發現婚暴社工的充權展現在 3 個層次，分別是：

1. 個人層次：自我效能、自主性、意義感。
2. 機構層次：團隊感、重要性。
3. 跨專業的網絡層次：影響力及行動力。

權能展現的媒介，包含：個案、重要他人、同儕、督導、組織及網絡成員。促成因素則有：看見服務成效、建構工作信念、促進再建構、回饋認可、獲得指導、公開鼓勵、理解關照、授予自主、促進連結、言行一致，以及擁有資源等。但在社區、政治和文化等社會政治權能的展現上，就連中高權能的婚暴社都欠缺。面對這個現象，該研究者特別呼籲社會工作者，對於與自身利益相關事務應主動並積極參與，藉此取得實際感受的能力。

謝盛瑛（2013）深度訪談 4 位在公私部門工作的一線資深實務工作者發現，實務工作者在職場所面臨的無力感與去權情境來自於：科層體制對專業的壟斷、剝削與控制；勞動條件缺乏保障；社工師證照制度所形成的專業階層化；福利民營化與服務私有化影響下的社工薪資低價化；以及社工教育與實務需求發展的偏廢等都再再犧牲社工專業的自主性，也窒礙了社會能動性。據此，研究者將充權策略分成 3 個層面：

1. 個人層次：有權力意識、得以自決，在生活的選擇上擁有能力與勝任感。
2. 人際層次：得以與非正式和正式支持網絡互動合作，形成夥伴關係網絡。
3. 集體層次：喚起受壓迫意識，並對於藉由集體意識與集體權力來改變不公義社會結構的集體行動有所認知。

研究發現經充權而展現能動性者有 5 項特點：

1. 在社工所處的困境中主動尋求生存能力：包括助人使命感、自我承擔的能力、專業能力及行動能力。
2. 認知離職之外的可能性：個人與機構的談判、集體與機構協商，及轉換跑道。
3. 個人充權所提升的改變權能：懂得紓解負面工作情緒、積極參與社工切身相關的政策與制度建立，以及開創社工職涯的發展。
4. 人際充權開拓多元人際網絡。
5. 集體充權帶動集體性與行動力。

林彥宏（2009）以全國私部門社會工作者作為抽樣對象，所關注的是私部門機構的組織結構與場域。結果上反映了組織領導者與工作者互動所形成的充權成效。充權元素與媒介包括有：組織內工作者相互分享權力、資訊等相互性過程，得以獲得相互支持；共同參與在組織的願景形成；工作者藉由組織所獲得的自我肯定、對組織的承諾，以及擁有達成組織未來願景的能力等。

綜上，以探索本土社會工作者的充權經驗與策略之 3 篇文獻，與本研究所設定的研究領域有所異同。相同的是鎖定在實務場域——無論是組織結構、社工專業網絡、政策制度或勞動環境的結構性因素，對社會工作者無力處境、充權可能性的探究；在充權策略的實踐上，不僅是協助重獲專業權力與權能感，更同時也找回其個人主體性與獨特性。

與本研究不同的則在於，本研究將研究場域設定在參與環境運動的媒介與實質現場——一個非「職業別／職稱別」或「機構宗旨」的必須，卻是與所服務對象息息相關的鉅視（macro）環境。社會工作者在其中，以所認同的「社工角色」參與實踐，他們在其中所經驗的無力感與去權經驗，與前 3 篇研究有何異同？目前現身並投身在其中的社會工作者如何經歷被充權來繼續在運動場域中發聲？目前的本土文獻無從略見一斑，因此也成了本研究的出發。

二、社工實務取向

社會工作者在環境意識的覺醒與運動的參與，會涉及之結構性壓迫的解除與權力的重分配，因此除了充權觀點以外，往往也與基變（radical）、批判社會學理論，以及女性主義（feminist）觀點有關，在 Payne 針對社會工作理論的分類⁴³中，她們也都同屬社會主義—集體主義（socialist-collectivist）類別，意即社會工作的目的皆為尋求社會合作與集體的相互支持，創造一種學習與合作的機制以提升受壓迫者與弱勢者權力；在社會公義的觀點上，則是展現積極處理階級、性別、族群、年齡與身體條件間的平等（equality）與團結（solidarity）（林萬億，2013；Payne, 2005）。相關的實務取向有「批判社會工作」、「女性主義社會工作」，以及「多元文化社會工作」，以考量充權觀點在跨文化移植後的轉化必須。以下針對所提及的相關實務架構與取向分別摘述：

（一）批判社會工作（critical social work）

這是在 1990 年後，從批判社會學理論所發展出的新基變實務。從建構的特質來檢視社會的統治者與權力團體，如何運用政治議程、辯論話術、教育、語言及媒體來合理化其不公平與不正義。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 Jürgen Habermas 認為，「知識是被社會利益所建構的」（引自陳香君譯，2011，p.148）。因此，要力求自由地探索自己的獨特性，並提供社會論述，形成對話與溝通；但溝通的前提必須是以公平、正義、民主與自主價值作為日常生活的引導。

「批判社會工作」相較於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關注工作，而是將「權力」與「支配」的議題擴及日常生活中的例行關係與事務的每個層次——例如：兒童受成年人、女人受男人、新移民受移入國人民，以及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受異性戀群體等的壓迫；如法國社會學家 Michel Foucault 在其社會理論中所指陳的：權力是在日常生活的人際間流動，而非是種給予的概念。因此，Foucault 著

⁴³ Payne（2005）將社會工作理論分為三個組別，分別是反身—治療（reflexive—therapeutic）、個人主義—改革主義（individualist—reformist），及社會主義—集體主義（socialist—collectivist）。

力在探索、描繪出支配團體與主流論述對社會關係的支配(引自陳香君譯,2011)。

「權力」與「支配」正是批判取向社會工作者的分析及實務焦點，依據的是「女性主義社會工作」所提出的「社會結構分析」。在社會工作領域，支配的一方通常是有權力者、政策制定者、專家學者和社會工作者，他們握有對弱勢者／邊緣者／受壓迫者／少數者的論述 (prevailing discourses)。因此，「批判社會工作」批評個人取向的實務，鼓勵以「批判意識」來檢視自身經驗。因為該個人取向容易歸咎或病理化個案，並忽視了個案所處的不公平的權力分配，與不公義社會結構，此外，個案還會傾向將主流的論述如標籤般黏貼在身上(引自陳香君譯，2011)。

批判取向的社會工作者，便是要時時覺醒權力在個人專業中的角色，並時時省察是否具有潛在的歧視與壓迫 (Spencer, 2008)，因此也才能確實掌握受壓迫者的受壓迫結構與機制。加上透過語言、對話與自身的改變，「批判社會工作」驅動社會工作重返社會公義的價值。

(二) 女性主義社會工作 (feminist social work)

早期女性主義者高舉「個人即政治」，主張女性所經歷的壓迫並非源於個人問題，而是政治與社會的不平等與不正義。因此關鍵介入在於女性的覺察，她們需要意識到自身所理解事情的方式與自我經驗，受到男性所主導，是偏向符合男性利益的觀點(引自陳香君譯，2011)——例如：「男主外，女主內」、女性是理所當然的照顧者，以及具有美德模範的賢妻良母等指標。

該觀點分析社會工作學門也具有性別化本質——工作者有極大比例是女性，所服務的對象也大多是女性，所以被視為「女性的工作」，而男性往往位居管理階層，決定各項影響日後實務及資源分配的政策(趙小瑜譯，2004，p.6)。男性父權主義觀點下的社會工作也就被推向「維穩」的特質，壓制了社會工作者的社會能動性，也造就出噤聲、去權與順從的特性。反觀「女性主義社會工作」，

其主要目的便是使女性重拾生活的主控權，藉由覺知個人經驗如何受社會經濟結構、關係及語言所形塑，從而去經驗被充權，以產生力量來對抗男性父權主義的壓迫，施展主體選擇權，同時也將多元化女性聲音從邊緣帶向中心（陳香君譯，2011）。

從女性主義運動層面來看，「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 raising）可以啟發有意識的集體行動，以改變不平等的結構與關係。對被視為女性工作的社會工作，意識覺醒的社會工作者才得以解開實務上的結構壓迫，重取專業自主權與社會能动性，反省／思「父權主義式的利他模式」作為實務的唯一或主流走向。

此外，1975 年，女性主義的關懷有了在生態視野上的擴展。法國女性主義學者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提出「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的觀點，進一步指出一個支配關係的社會，女性不會獲得解放，生態危機也不見出路（紀駿傑，2003；彭滄雯，2011）。該派學者的基本主張與關懷（引自紀駿傑，2003，p.299）如下：

- 父權價值意識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造成女性受到性別壓迫的主要原因。
- 在壓迫意識與結構下，也形成人類對自然壓迫的事實。
- 在社會邏輯與歷史上，女性與自然有著互相聯屬的關係。
- 解放性別與解放自然是整體的行動目標，不宜分別視之。

（三）多元文化社會工作（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隨著西方女權運動的發展，主流社會對性別的歧視與壓迫也逐漸鬆綁。在這背景下，新移民與原住民族群在爭取認同的運動過程，逐漸開啟「多元文化社會工作」的實務分支，以下簡要提出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內涵（引自李明政，2011，p.1-2）：

「多元文化社會工作」乃是加拿大政府在 1970 年代提出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後而發展起來，以社會公義及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價值理念，因此，對「主流文化社會工作」與「普遍主義社會工作」多有批評。「多元文化社會工作」指責「主流文化社會工作」的實務走向，僅參考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具有支配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群體；對「普遍主義社會工作」的批判則是，該實務認為真理是唯一的，因此所尊崇的西方社工專業模式適合直接移植至世界各國，毋須考慮在地性與本土化。兩者的實務不僅忽視多樣性 (diversity)，還形成壓迫 (oppression)。

以「充權觀點」為例來看，學者 Minow (1985) 的研究指出，該觀點在跨文化移植後，實務上會經歷三個兩難：

1. 差異的兩難 (dilemma of difference)：社會工作者致力於充權個案的同時，可能會間接標籤化了個案。
2. 壓迫的共謀 (complicity of oppression)：意即以忍耐、沉默、抱怨、退縮或犧牲等方式來回應所覺察的壓迫情境，便是一種對壓迫源的認同與助長，自身便參與在對自己的壓迫。
3. 專業關係中的權力不平衡。

Yip (2004, p.483-484) 針對華人文化⁴⁴社群的充權模式使用，則提出具文化敏感度的實務建議：同時充權個人及其重要他人；既要充權個人權利，也要充權個人責任；既和諧且反抗的充權；漸進與基進的充權。

其實，「多元文化社會工作」並非全然駁斥西方主流社會工作，然而卻允諾以質疑、反思與批判的態度來檢視實務。若不如此，服務對象的需求可能會被合理化地撇除在主流價值觀外，或在「主流文化社會工作」中被視而不見。此外，弱勢者具有邊緣性與少數性的特性，在現存的社會結構容易面臨不均的風險與機會結構，因此問題或困境就更容易被視為理所當然或視若無睹了。主流文化社會

⁴⁴ 華人文化主要受到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影響。

工作便淪為「維穩」的工具，遠離了公平正義的價值信念。

為了修正以達到對人權的重視，多元文化社會工作在實務介入中融入充權及反壓迫觀點，並挑戰種族中心主義，關注階級、性別、族群與區域等結構的不公平。此外，在「差異」與「同一」的議題上，格外主張不應歧視與病態化「差異」（Payne, 2005），對差異文化應採取開放、包容與欣賞，對個體差異認同則應秉持尊重。



第三章 實踐的建構路徑

「說故事就是一種對生命的理解，

有了生命的理解，才能帶來生命行動的力量。」¹

在本章中將說明如何擷取、重構，處在社會工作學門之教育與實務結構，以及社會政治結構下的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故事，研究的方法學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方法的選擇與考量；第二節介紹資料蒐集方法；第三節呈現資料整理與分析過程；第四節為研究所遵行的嚴謹性；最後第五節則是研究倫理的相關考量。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方法

研究取向的選擇是基於本研究的發問與目的，「許多理論家們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說故事此一人類表述形對，對於個人之主體構成與社會認同的重要性，而藉由敘說與人們的行為事件及生活遭遇相關的生命故事（life story），使之從『個體』（individual）變成人（a person），並將個人的道德決策和社群的倫理責任結合在一起，彼此相繫、共同存續。」（引自胡紹嘉，2008，p.278）

為了呈現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主體實踐故事，發掘環境運動場域中，社會工作者所展現的能動性，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典範（paradigm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ethodology）的敘說（narrative）研究。

一、質性研究典範

由於本研究之問題意識無法脫離社會工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之具體脈絡與

¹ 引自曾慶台（2002）。面面俱到？處處保留？——一個國小男性教師的自我敘說。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

特定情境，因此強調脈絡化（contextualizing）的質性研究典範更符合本研究之方法。

質性研究典範所主張的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社會現象集合。現象如同有機體般不斷經歷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變動，對於處在其中的個體／群體會產生不同意義與多面向想法，形成動態事實的建構（潘淑滿，2003；簡春安、鄒平儀，1998）；而行動主體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社會行為與現象，也都蘊含著人類的意識與情感，以至於都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活動（陳伯璋，2000）。

Neuman（1997）將質性研究歸納出 6 項特質（引自潘淑滿，2003，p.21-23）：

1. 重視社會脈絡：在生活情境中解讀任何的社會行動。
2. 個別研究的價值：針對特殊性與代表性個案進行深入、多元及廣費的資料蒐集。
3. 研究者的誠實：由於質性研究的不可驗證與不可重複性，以至於真實性常遭社會科學研究社群的質疑；故強調質性研究者的誠實。
4. 以建構理論為目標：運用歸納邏輯，以歸納、比較、對照與分類出概念或理論的建構。
5. 過程和時間順序：重視事件和行為發生的先後次序與關係，以能系統性、組織性地呈現出意義。
6. 意義的詮釋：以研究對象為主體的立場來看待社會世界，詮釋出現象、事件和情境對其之意義。

由於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議題，在社會工作學門上鮮少探知，也鮮為人知，僅有的幾篇也無法瞭解研究對象的內在世界（inner world）及心路歷程；加上，本研究目的與性質並不在於推論，而是需要深入探索研究對象對社會現象與行為的意義詮釋。因此，相較於量化研究典範——運用演繹方式進行邏輯推理，以建立客觀而普遍的知識體系或法則——重視「價值理性」的質性研究典範會更為適切；

相較於「科學的知識」(scientific knowing)，「敘說的知識」(narrative knowing)才得以讓我們明白內在的世界(林美珠，2000)。

二、敘說研究

凡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都被稱作敘說研究(引自吳芝儀譯，2008，p.3-4)。它與質性典範不謀而合，同樣重視社會文化結構，強調主流論述影響，因此為研究提供合理的探究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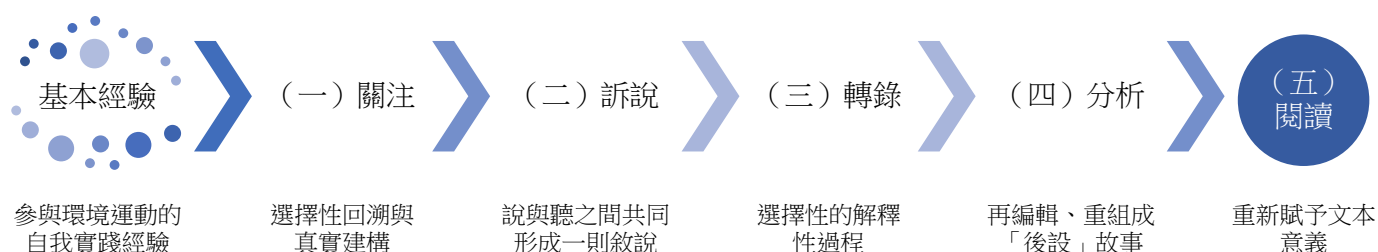
敘說研究在經歷 1980 年代的人文科學典範轉移後，被視為世俗知識(customary knowledge)的形式，能夠體現主體的時間意識與存在感，包括：主體的行動目標、動機、與他者的互動、發生事件的脈絡與情境，以及行動結果所導致的改變(胡紹嘉，2008，p.4)。然而，在本質上，立基於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它未能獲致所謂的實際真實(truths)，但卻是在說的過程中建構真實。

由此可知，說出「故事」本身是一種「選擇性」的經驗重建——把個人在外在世界所觀察、詮釋和理解到的納入形成自己的一部份，再說出主體所認同、所相信、所接受的經驗故事(林美珠，2000)。故事「情節」本身雖揭露了主體所宣稱，同時也排除了未符合該宣稱之相關情節，也說明了非中立、客觀的「經驗的再呈現(representation)」本質(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此外，意義的產生同時也會隨著時間與主體的經歷而變化；因此，社會文化脈絡是無法置外於敘說本身，它所呈現的故事是交雜著文化、制度與權力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本研究將敘說研究作為工具，在資料蒐集過程以一種「說故事」的方式進行，同時也是研究者對蒐集資料的分析與建構。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上，「再呈現」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實踐經驗，乃依據 Riessman 的五種再呈現層級(引自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p.20-36)，分述如下：

圖 3.1

研究過程的「再呈現」層級



資料來源：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原作者：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p.20）。台北市：五南。

（一）關注經驗（attending to experience）

在未經反思的整體參與環境運動的經驗中，做一種選擇性的回溯，並在思考中賦予特定關注到的現象、事物與過程意義，建構出真實。

（二）訴說經驗（telling about experience）

敘說者以所處文化脈絡下所形成的特定觀點，來條理化所關注的現象，並以敘說方式向研究者再呈現所形成的故事與意義。說與聽之間，共同形成一則敘說，然而卻也會受制於語言的能力，而影響理解的程度。此外，說者與聽者的關係、說者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聽者本身的社會背景——同為社工圈一份子，並在以教育著名的大學院校所開設之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就讀，就會左右說者所訴說的故事版本。誠如 Riessman（2003: p.25）所提到的，「在訴說這個經驗時，我在創造一個自我（self）——我想如何被他們認識。」因此，敘說是一種牽涉到說者針

對自我的再呈現 (Goffman, 1959)。

(三) 轉錄經驗 (transcribing experience)

無論是錄音檔或影片檔的言說 (discourse) 轉錄，都是具選擇性的，只能呈現部分，而非完整的對話。口語語言並不具透明性 (transparency)，也就不具所謂的真實再呈現；因此，轉錄言說本身是個解釋性的過程。將語言轉錄成文字文本，往往容易喪失語調、口吻、節奏、抑揚頓挫、所蘊含的情感和言談速度等，然而這些卻會影響讀者對敘說的理解，形成不同意義的建構文本，如同攝影師在拍照時的選擇性構圖——畫面物體的入鏡與裁切，以及色調的調製，都再再會成為對觀者視覺的引導，以及對畫面意義的理解。

「不同的轉錄慣例會引發及支持了不同的解釋與意識形態的立場，創造了不同的世界。」(引自 p.29) 因此，研究者依照所選擇的理論來決定轉錄後的文本呈現——是否要包含：搶話、沉默、重複的語句、語氣用詞和特別強調。

(四) 分析經驗 (analyzing experience)

這階段乃是針對轉錄後的逐字稿進行分析，牽涉到研究者在一連串形式、風格、次序和安插言說等的決策，再將相似性的環節彙總，形成摘要與總結，最後再編輯、重組成一則「後設故事」(metastory)——虛構、混和的故事，以說明所發生的事——交織著理論信念、價值與政治立場的作用。

(五) 閱讀經驗

藉由閱讀分析者的再呈現文本，而重新賦予該文本意義的過程。Rabinow & Sullivan 在 1979 年所出版的“*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一書中，針對文本的閱讀提到，每個文本都具有「多重聲音 (plurivocal)，開放給多種的閱讀方式和不同的建構」(引自 p.32) 因此，對於所建構出的真實意義，也僅是針對特定情境、時空下的特定解釋群體。

第二節 資料蒐集方法

質性研究者通常是以訪談 (interview) 作為蒐集資料方式，然而對於敘事研究者，訪談現場的「話語」代表著言說者的生命，同時有其敘說脈絡與生命脈絡，因此，為了避免淪於侷限或過度引導敘說方向，忽略受訪者已說與未說的內容，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ing) 作為資料蒐集方法，以深入呈現符合研究旨趣的個人經驗性敘說文本，汲取受訪者藉由敘說所「意義化」的經驗 (Chase, 1995)。

國外學者 Crabtree 與 Miller 將「深度訪談」定義為一場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如夥伴般的「對話之旅」，在平等的立場上交流著語言與非語言的情感和溝通，以針對特定情境脈絡，共同建構行動或現象的意義 (潘淑滿，2003，p.136)。由此可知，資料蒐集的豐厚與完整性受到兩者互動的影響，然而，在「互動」過程，研究參與者要能建構出自身所認同的生命故事，是需要奠定在研究者對受訪者在尋求和傳達意義的生命經驗有些廣度 (broad parameter) 的瞭解，再隨著受訪者感興趣的故事前行 (林美珠，2000)。

這如同研究者受邀進入受訪者的私密庭園——每一隅的植物都有著相對於整個庭園的獨特安排與意義，和因著植物特性與季節因應的修剪。研究者需營造輕鬆的互動氛圍，提問、聆聽與跟隨園子的主人，如此便建構出「敘說者的庭園」所專屬的意義路線。換句話說，在訪談過程，研究者必需提醒自己以開放的態度和彈性的原則進行，以讓研究對象充分表達自己的感受、看法、經驗與所持意見 (Patton, 1990；陳向明，2002)。學者 Dobbert (1982) 提醒：「因為研究者的目標是在發現現象或行為模式，而不是為問題尋求答案，所以研究者不能像助人專業的會談一樣，將訪談的內容直接導向問題本身……問題不是如何和受訪者談話，而是如何傾聽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引自潘淑滿，2003，p.137)。

由於敘說者的故事涉及所處的文化脈絡，因此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也格外注

意敘說者在「再呈現」故事中的停頓、中止或矛盾地方所涉及的文化因素，並支持敘說者去面對、繼續或整理所經驗到的矛盾與故事中的斷裂處(林美珠, 2000)。

總結來說，深度訪談法具有以下特質：是一種有目的的對話；也是一段雙向溝通與情感交流的過程；建立在平等基礎的互動關係；訪談前有事前規畫，但卻以彈性原則進行；積極地傾聽；在特定動機與目的下瞭解、獲得及解釋研究對象對社會事實 (social reality) 的認知 (陳向明, 2002; 林淑馨, 2010; 潘淑滿, 2003; Minichiello, Aroni, Timewell & Alexander, 1995)。

在敘說分析的訪談中，研究者格外注意的是，對研究參與者建構意義的方式採取一種尊重的態度，因意義產生的基本結構就在於敘說 (王勇智、鄧明宇譯, 2003)。

此外，國外學者 Lofland 與 Lofland (1995) 建議，可建立對日期、時間、訪談地點及受訪者資料等「事實清單」(fact sheet)，以及對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的互動反應及環境觀察、訪談者個人的感受、後續研究思考等的「訪談者反應清單」(interviewer reaction sheet)；所蒐集之多元資料會是探討研究問題的工具，有助於故事的社會脈絡與情境之描述，以及在資料分析上的限制說明。

因此，本研究預先制定「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見附錄三)，以登錄受訪者的事實清單；進行過程中，也會一併建構「訪談札記」(見附錄五)作為訪談者反應清單，紀錄相關疑問、反思／省、聯想到的議題、與研究相關的決定，以及在分析與詮釋時，同時也紀錄與資料互動的過程；以供他人未來在判斷研究資料時，有所依據和瞭解 (顏寧譯, 2011)。

一、研究參與者的選取與人數

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本研究設定為畢業於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曾)任職於社會工作相關本業，並持續參與關心環境運動的工作者。

因考量符合所設定之樣本不多，初始採滾雪球 (snowball sampling) 策略，

請同儕朋友媒合符合研究目的之合適受訪者，同時也投遞訪談邀請至各環境相關機構；之後再結合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委由知情人士或研究對象進一步推薦可提供符合研究旨趣且豐富資訊的人。選定研究參與者的條件說明如下：

（一）研究參與者必須是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所畢業

為了能夠檢視社會工作者的教育養成體制，對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影響與實踐，因此，社會工作相關學系設定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科、系、組、所畢業者。

（二）研究參與者曾或現就職於社會工作相關本業

由於工作環境及屬性涉及權力動力的差異，因此研究者所設定的社會工作相關本業包括：公部門、私部門，及社區或社會團體之招聘職稱或條件設定為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所者；由於間接服務與直接服務的職責要求與工作條件也不盡相同，因此，受訪者的條件會涵蓋以上類型。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之定義，請參上列條件（一）。

（三）現今仍主動持續參與運動，或雖然結束但有參與至運動落幕

雖然研究者所設定的研究條件之一是必須參與環境運動——涉及具體場域或議題的指稱。然，國外學者 Padgett 認為，研究場域（field）指的是質性研究過程的一段歷程，偏向對心理狀態的指涉，而非特定的場所（梁慧雯譯，2000）。

為了探知研究對象在參與前至參與的轉折（或參與至運動結束）歷程，以取得豐富且深入的訪談資料，故設定的研究參與者乃是立志持續參與，或雖然結束但有參與至運動落幕者。

依據以上條件，研究者共邀請了 4 位研究參與者，其基本資料如下：（見表 3.1）

表 3.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項目 \ 化名	阿海	雲子	阿山	陽子
社工角色的自我命名	分解者或任何東西	變形蟲	細菌	介質
性 別	男	女	男	女
大學入學	2011	2006	2006	1996
婚姻狀況	未婚	未婚	未婚	已婚
子 女	—	—	—	1
學 歷	學士畢	研究所 就讀中	學士畢	研究所畢
現 職	服役中	公部門 高級社工員	私部門 實務工作者	私部門 專案主任
社工年資	—	6	6	20
曾服務領域	倡議社團	兒少	倡議組織 青少年	青少年
曾參與的環境運動 ²	- 反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 - 反「中科四期搶水事件」	反核運動	- 反「蘇花高速公路興建計畫」 - 反核運動	反核運動
訪談時數	2 小時	1 小時 32 分	1 小時 31 分	2 小時 15 分

² 僅列出針對研究參與者所參與的代表性環境運動。

二、發展訪談大綱

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d)訪談大綱，相較於結構式(structured)，得以確保研究者蒐集到符合研究目的之資訊，且又保有敘說空間讓受訪者積極參與，讓訪談得以彈性、流暢地進行。雖然，自由度不如無結構式(unstructured)訪談，然在特定議題上，所採取的仍是一個開放的態度，以降低訪談過程的限制，同時也增加研究者的反思深度(陳向明，2002；潘淑滿，2003；林淑馨，2010)。大綱內容是研究者依據研究本質與目的，並在閱讀相關文獻後擬出(見附錄一：訪談大綱)。

由於敘事研究本就沒有預先的假設，假設的存在乃是從閱讀所蒐集到的文本中浮現，甚至形成研究的明確方向(吳芝儀，2008，p.12-13)，因此，實際進行訪談時，雖以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參考架構與過程的指引，但研究者保持著不受到問題之先後順序或題目所限制，會視實際情況適時調整問題內涵，並適度地利用開放式語句作詢問(潘淑滿，2003)。

三、研究參與同意書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因此，基於研究參與者的自願性原則及保密原則，在訪談進行前，會提供訪談同意書給研究參與者，使充分得知研究相關資訊後，表達同意或拒絕參與研究之權利(陳向明，2002)。

進行研究參與者之初步面談後，分別向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協調正式訪談時間。在訪談進行前，預留充分時間供研究參與者詳讀同意書內容，並口頭再次提醒研究參與者所擁有之權利，保證不探知所不願揭露的隱私內容，並提醒訪談結束後，對於所分享資料仍保有最終撤出的權利。所分享容有任何疑慮，可隨時聯繫研究者。研究參與同意書(見附錄四)1式2份，由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簽訂後各持1份。

四、訪談時間、進行方式及研究地點

每位研究參與者約進行 1.5 至 2 小時的訪談，訪談次數依資料蒐集情形約 1 至 3 次。過程中以訪談大綱內容提問，並依據受訪對象的回答彈性調整或追問。由於深度訪談的對話內容，會談到特定情境脈絡下所涉及的相關人、事、時、地和物，故在訪談地點的選擇與安排上，盡可能排除外界干擾因素的場所為宜，並優先選擇抒發與聆聽都無所礙，以及研究參與者方便前往；若該研究主題有對受訪者特殊意義之空間，則會納入思考以作安排，讓研究參與者可以盡情分享與研究旨趣相關之有價值的資訊，且能夠自在地與研究者互動。

五、資料蒐集與處理方式

為使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更加專注傾聽受訪者的談話內容，並確保蒐集資料的完整與正確性，每次訪談均會徵得受訪者同意而進行全程錄音。訪談結束後，按研究參與者接受訪談的順序，將可辨識資料進行編號、標示日期與地點，並以對受訪者的印象作命名，以維護隱私權。之後由研究者本人將錄音檔轉譯為逐字稿，進行閱讀與分析。

第三節 資料分析方法

研究者在得到豐富的訪談資料後，首先會進行文本故事的轉譯，以得到可分析資料。由於敘事典範強調主體性、多元性和相對性，因此也就不存在單一或標準的資料閱讀與分析方式（林美珠，2000）。

在本研究中，所採的分類和組織敘事分析模式是由 Lieblich, TuvalMashiach 與 Zilber，在 1998 年所出版的書籍中提出的，包含：「整體」(holistic) 對「類別」(categorical)；「內容」(content) 對「形式」(form) 的兩組組織向度，如下表所示：

表 3.2

敘事分析模式的 4 類型

	內容	形式
整體	整體—內容	整體—形式
類別	類別—內容	類別—形式

資料來源：吳芝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原作者：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 Tamar Zilber）（p.16）。嘉義：濤石。

為了將訪談所蒐集到文本資料，以故事方式組織、詮釋出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實踐，建構出有意義的整體，因此所採取的分析模式是：「整體—內容」；此外，為了瞭解社會工作者在參與環境運動所遭逢的共有難題與現象，連帶輔以「類別—內容」之分析模式。以下分述所採取的分析模式：

一、「整體—內容」的分析模式

以個人之整體生命故事內容作為分析焦點，並以脈絡化方式閱讀與分析，甚至是敘事中的部分段落，其意義也要放至在整體的脈絡中去判斷與思考。雷同於臨床上的「個案研究」（case studies）。

二、「類別—內容」的分析模式

該模式類似於「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乃是從整體文本中分別摘錄符合研究主題之明確類別的文本，形成類屬。然而，學者林美珠（2000）提醒，「沒有一個故事的聲音是單一向度（unidimensional）的，而是由各式各樣的內容與形式交織而成。」分析類別的應用須抱持謹慎且開放的態度，以避免形成另一種形式的偏頗。

綜合上述，研究者採取開放的態度進入研究參與者的敘述脈絡，再從轉譯後的逐字稿找出訊息意義，在閱讀與分析敘事資料時，不斷反省與思考，以進一步形成結論詮釋；這一連串過程牽涉到三個基本層面的相互與反覆對話：敘說文本、理論架構，以及在閱讀與詮釋行動時的自我覺察與反思（吳芝儀譯，2008，p.13）。

第四節 研究嚴謹度

量化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找出社會現象或行為的共通性，因此強調測量工具的可信性與客觀性；因此，若從量化研究的視角來看，質性研究相對不客觀（objective），也不嚴謹（rigor）——認為質性研究的發現結果，缺乏可信性與真實性。然而，Smith 在 1990 年針對批評，提出一段哲學議題的反思：「一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到底要做與做什麼，才能確保研究的結果是精確的（accurate），研究的結果不會扭曲對社會事實的描述？」（引自潘淑滿，2003，p.80）。然而，研究的有效（valid）或無效（invalid）又是依據何種評估指標（goodness criteria）？真的會有最適當的指標嗎？

敘說分析與實證典範的最大差異在於其基本假定，前者認為不存有單一與絕對的真實，因此在評估「資料分析」的有效性（validation）上，非以反映外在世界和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為目的；也就是文本不具有穩定不變的意義，在解讀或詮釋上所強調的是多元、相對與主體，而非正確性（吳芝儀譯，2008；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這也反映了敘說分析的有效性，未能／也不接受由一套制式標準程序來評定，它所仰賴的並非實在論者（realist）對客觀「真實」（truth）的假設，而是指在社會世界下的文本解釋是否具信賴度（trustworthiness）。學者 Riessman 認為，解釋性研究的有效性認定仍是一個發展中的艱鉅議題，然而她也提出四種建立有效性的方式，以下分別引述之（引自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p.146-154）：

一、說服力 (persuasiveness)

係指資料分析的解釋是否具合理性(plausibility)或讓人得以信服。「說服力」的提升在於讀者的反應與分析者的寫作修辭。前者仰賴報導者陳述須相應於所提出的理論，以及針對局外人提出質疑的解釋性陳述；後者則倚靠分析者的文學修辭，以感動、刺激讀者。

二、符合度 (correspondence)

敘事取向的「事實」認定，為一個解釋過程。因此，「符合度」意指分析結果被研究對象所認同的程度。學者 Lincoln 與 Cuba 於 1985 年提出「成員檢核」(member checks) 的程序，以針對錄音檔轉譯文本、資料分析結果等進行審核。本研究在完成逐字稿謄寫籍資料分析後，乃逕行提供給受訪者本人檢核(參附錄六：文本回饋檢核函；附錄七：分析資料回饋檢核函)，以減低對引用文句和解釋的誤解，增加對「再呈現」的適切性。

然而，「檢核」結果會隨著環境或事件而產生意識變遷，使受訪者經驗意義上的改變，因此，無法確保研究者在解釋上的效度。

三、連貫性 (coherence)

Agar 和 Hobbs 將連貫性標準區分為三類：總體的(global)、局部的(local)和主題的(themal)。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可用以涵蓋這三類標準：前者乃藉由訴說所達到的整體之目的；第二，在敘說裡影響敘說本身；最後，牽涉到內容之特定主題訪談的重要性，且會重複出現。因此，連貫性指的便是達非單一與特定的解釋目的；然而，這架構的假定是受訪者具一定理性程度，否則便不適用。

三種連貫性可以互相補強，也可加強應證。由於總體的連貫性影響著局部特定敘說結構的啟發，以及反覆性主題的領會，因此研究者需要對受訪者在起初假設中所提之目的與信念保持修改的彈性。

Marshall 指出，雖然深厚描述的技術運用可提升研究的嚴謹性，但仍須注意莫落入過度描述的倫理議題中（引自簡憶鈴譯，2000，p.160）。研究者除了深入理解研究參與者的感受與想法外，本身的意識型態與觀點也會避免強行加諸分析與詮釋的過程（潘淑滿，2003，p.98）。

四、實用性（pragmatic use）

敘事分析的「有效性」標準納入「實用性」的評定，此也是唯一具有未來導向、社會建構和集體性的標準，提供以下之相關訊息，作為他人對該研究之成果信賴度與實用度的評定：

1. 解釋如何形成的描述；
2. 展露研究進行的過程；
3. 詳細說明如何成功轉換（參閱圖 3.1）；
4. 可提供經隱匿過的資本資料給其他研究者。

第五節 研究倫理

相對於自然科學研究，關注以人為主體之行為、關係或與環境關係的社會科學研究，應對倫理議題更加嚴格與重視（顏寧譯，2011；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者又是以局內人觀點，涉入研究參與者的生活經驗與內在世界，因此會產生一種緊密的互動，於是，研究進行時，必須有意識地藉由研究倫理，去敏感察覺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間的互動，是否基於一種互惠、權力平等的關係（潘淑滿，2003）。

此外，研究者的倫理道德與行為規範影響的不僅是研究雙方，同時還涉及被研究者群體、研究者的職業群體、一般公眾，以及資助研究的人、財團或政府機構等（陳向明，2002）；但在本研究中，因未有資助單位，故免除該項的顧忌。本研究的研究倫理考量如下（潘淑滿，2003；陳杏容譯，2000）：

一、告知後同意 (informed consent)

以人為主體的研究都必須遵守「告知後同意」原則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意旨研究者必須準確地將參與研究的意義，以及與研究相關的訊息傳達給研究對象，並確認充分瞭解的前提下才進行書面同意書的簽署；而這也是研究得以進行的必要且基礎的先行條件。然而，在研究過程當中，研究參與者仍保有無條件退出研究，終止研究關係的權利。

知情同意書中所載明的告知內容，涵蓋：研究目的與內容、研究參與者所需投入的項目、潛在的收穫與風險、所收集資料的處理及保密措施、無條件終止研究的權利、研究者身分及聯繫方式等說明。

二、公平合理與互惠原則

公平合理原則係指研究者在以下三方面合乎道德要求：資料蒐集過程、與研究參與者關係的合理處理，以及研究結果 (王向明，2002)。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會敏感覺察、反思自己對於研究參與者是否過度干預，或以主觀價值做引導；同時，研究參與者得審視訪談逐字稿的要求；在結果發表前，也讓研究參與者充分獲知研究所呈現的內容。

基於互惠原則，除了提供超商禮券五百元作為研究參與者在時間、精力和經驗分享上直接的回饋。此外，Sieber 認為，研究所得的科學知識是提供研究參與者最適當的間接回饋，加上研究者在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聆聽者，也得以讓研究對象因著參與而提高自尊與成就感 (引自畢恆達，2005，p.101)。

三、隱私與保密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質性研究者往往具有特權進入研究對象的內心世界，探知想法、信念或價值觀，因此當受訪者同意參與研究的同時，便是向研究者揭露的時候。隱私與保密便是格外重要的研究倫理議題，研究者需要格外敏感、注意權力的運用，以免誤用後造成有形或無形的傷害與潛在風險 (潘淑滿，2003)。

「隱私」意謂著私人領域中不被公開的個人資訊（王向明，2002）。在質性研究中，表明個人擁有如何與何時傳遞他人訊息，及訊息傳遞程度的決定權（潘淑滿，2003）。為保障研究參與者的隱私權，並避免因研究而造成傷害或潛在風險的情況下，往往會以匿名——無法從資料中辨識資料提供者身分的方式處理所有相關資料，並遵行「保密」原則——知道研究參與者身分，但不予公開。

在本研究中，任何與受訪者相關的資料，包含：個人姓名、基本資料、就職機構及畢業於大專院校之名稱等足以辨識個人資訊時，一律以假名或編碼替代處理。在文本的呈現上，刪除可辨識研究參與者的各項線索，對於可能對研究參與者造成傷害的訊息，都予以刪去；與研究同儕和其他人員討論時也格外謹慎留意。所有研究相關的文字稿、同意書及錄音檔，亦僅供本研究使用，不另做他用，並嚴加保管，避免外流。針對協助研究者轉譯錄音等之謄寫員，也要求簽署保密協定（見附錄八：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以維護研究對象的權益。



第四章 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故事

「生命終究是生命，即使被擠壓在巨大的石層之中，
總有幾棵種子，在石縫中，發出了芽，長出了枝葉，甚至開花結果。
生命的敘說與書寫，紛紛在關心生命不同領域冒芽，生命終於又有了機
會，呈現其空間性與時間性的豐富、細緻、深刻與完整性。
更有機會，藉著敘說與書寫展現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實踐與智慧開顯。」

（引自翁開誠，2005，p.27）

本章主要在展現 4 位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故事，按著四位敘說者所生長的年代，由近而遠的排列呈現。

每一節是一則單獨獨立的生命故事，分成兩個部分撰寫。第一部分會簡要描述選擇該位敘說者的理由或過程；接著，是為了讓敘說者重拾在社工專業的話語權所設計的題目，呈現他們以生態界為選項來為社工角色的象徵作命名（to name）；之後是研究者對其整體印象的描述，也以此作為對敘說者之化名的命名由來；若有特殊的事件或互動方式，也會撰入其中。第二部分則是以「整體—內容」的敘事分析方式，根據時間的移動來重構訪談引述，再呈現出敘說者的生命故事。

每一則故事都朝向「整體而有意義」的目標作呈現。在故事的呈現方式上，研究者在建構敘說者所開展的故事情節時，會從訪談資料中引述，作為對情節轉變或與傳統故事不同，而作的解釋或證據提供。研究者從訪談蒐集資料後，反覆閱讀文本，探究因果次序，找出轉折點，顯出文化腳本、理想與現實，以及相反敘說間的斷裂部分，以此寫成連貫性的故事初稿。

第一節 大海般飄流開放的實踐身影——阿海的故事

「你看到一隻紅毛猩猩被關著，你會覺得被關著；
可是你接觸過後，你會覺得那是一個生命被關著。」

(by 阿海)

一、寫在故事開始之前

訪談阿海的當下，他正在等候入伍，他是訪談對象中年紀最輕的一位，然而他的經歷卻不比他人來得淺薄。除了社會工作的正規教育之外，他常出現在許多非主流或社工領域之外的研習場域，在敘說中也會出現他積極參與後的覺察分享。之所以將他化名為阿海，正是他那多元且不受體制限制的學習態度，如海洋文化般，流動且具開放性。

阿海的環境意識覺察的很早，在未進入社工系就讀以前即深印在他的腦海，而環境運動的參與也早在大一即開始接觸，因此，他不斷地以此與走過的教育經驗，以及他的社工認同對話。因此，無論是否現身在環境運動現場或涉及環境議題的討論，阿海在大學期間所經歷的生活各樣層面，都可以與他已建立的環境意識作對話。他的實踐故事與其他受訪者比較起來也顯得較為與眾不同。

訪談末後，在請他試著以生態界物種／物質來比擬社工角色時，他停頓了5秒後，以「無法回答」做為回應；其實在那暫停的對話中有著他一連串的思考。

「我覺得是分解者的那種感覺…」我們社工就是在作為一個中介的橋樑…「我剛其實第一個想到的是各種東西。…，他不是一個單一的樣子。就是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需求，什麼樣的問題，社工就會有什麼樣的樣子。」「我沒有一個定論。另一個東西有點像微生物吧，後來又想到分解者的那種感覺，像細菌。所以，我覺得感覺比較像任何東西…」

在與阿海的這段對話中，常出現「不確定」的語句，「是吧，隨便…」「或許吧…」「或許可能…」一段時間後，他下了一個結論，「我覺得應該，我後來想想這樣講比較好就是，我不會隨時都變，我有我的中心思想…只是，那種身段啊、作為啊、型態，會有不同的展現方式。」一些訪談片段，也如同這個模式，用語包裹著不確定性，呈顯著後現代的解構風格，其實這不也是可能性的另一種展現，顯出他對於知識的追求，如同海洋般地開放與流動。

二、生命故事敘說文本

大自然是阿海從小的遊樂場，住在臺灣西濱城鎮的他，無論是海邊的踏浪，或是每週父母安排的山林的踏青，都充滿著他的足跡。「我們家週末去爬山啊，不一定要去山裡面幹嘛…就是把煮飯的東西都帶著…到山裡面之後，坐在一個涼亭或是大石頭，就起火煮東西，然後就坐在樹下聊天…大人在聊天，我們小朋友就…在山裡面亂跑這樣子。」甚至在阿公田裡的勞動，他也感到農作與親近土地的趣味性。「真的是在玩…搥土（臺語，鬆土的意思）啊，然後採那個番薯啊；阿公有種田的時候會去幫忙採，還滿有趣的。」在鄉下的生活體驗，對阿海而言，勝過城市的娛樂設施與生活便利。「鄉下的那種感覺，就很舒服！」「我對於都市生活就沒有什麼嚮往…」他停頓一下補充著說：「我就是一個野孩子！對，滿野的。」

在這脈絡下，加上父母的開明，阿海自主選擇的大學學測科系選項只有兩個，其中其一便是環境教育學系。阿海又說到，由於母親常朗朗上口的一句話就是，「心有餘力就要幫人！」這樣的信念深深牽動著阿海對於助人工作的興趣，正好學校老師的太太是一名社工，雖然談話過後對社工概念仍是模糊，因著憑著直覺的認知——社會系偏理論，社工系偏實踐——比起理論，相對喜歡實踐的阿海因而將社工系納入了另一選項。但無論是環境教育學系或是社會工作學系，其實都與阿海的「家庭養成」有關。

社工路上的環運實踐：在平行路上力求靠攏

阿海於 2011 年進入社工系就讀，這時的他僅知道那是一門助人工作的專業，實質內涵是什麼就一無所知。在第一學年結束後，阿海即選擇休學，但那關鍵點正是他對於環境意識的自主實踐。因此，要提到阿海的社工路，就不得不先看到他的環境意識啟蒙路。

踏青、踏浪、踏土的童年是阿海關愛環境的源頭，深刻、愉悅的大自然經驗一直存放在記憶中，等待著時機來初步形成進一步接觸環境議題的行動動力。在阿海高中時期，由於所就讀的高中是一所實驗中學——行政體制、課程教學偏向美式作法的開放，學習風氣因而也自主與自由。他是第一屆的學生，無論是學生會、糾察隊等有關學生的事務，都是與學校老師一起討論而定，養成了阿海獨立自主的學習態度，以及獨立完成事務的能力；這些學習經驗成為他在之後參與環境運動，進行組織籌組與運作的養分。「我們那時候，其實因為都沒有過往的案例可以參考，基本上就是你做什麼，校方都會鼓勵你去做。對。所以不會有那種：『我會怕——我做的東西會不會被罵的那種感覺。』」所以也導致了我剛上大學之後會去參加很多活動、運動…，創立社團法人。我們要做什麼東西，其實也沒有前面的，所以我們基本上要怎麼經營這個學生團體，就是我們自己做…」

高三升大學的那個暑假是環境意識覺察的關鍵時機點，因著曾三次參加過聯合國 COP¹ 會議的外校學生到校分享，在聊天過程中接受她的推薦，去參加了一個以氣候變遷作為關注議題的青年團體所舉辦之活動。活動中恰巧在招募前往聯合國參與 COP 會議的青年大使，他的自告奮勇在未設定人選門檻的條件下，成了他確定成行的關鍵。「我覺得那個時候對於國際就有一種憧憬...」覺得參加國

¹ COP 會議即指 UNFCCC 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的簡稱。自 1994 年，由 150 個國家於紐約聯合國總部，成功說服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後，每一年召開一次，作為相關氣候議題討論的溝通平台。

際會議，又是聯合國，就覺得很 cool 啊。而且對於氣候變遷等環境議題又有興趣。」大學入學後的兩個月，他即前往南非參加。「那個東西其實很衝擊啊，去國際的場合，看到很多年輕人，都會一起關注這個氣候變遷議題。可是就回來學校之後，就發現怎麼身邊的人都不關心…」

回國後的那個寒假，是阿海參與環境運動的另一關鍵點。因著就讀政治系並投入在社運圈的高中同學一聲吆喝，縱然因著大學選讀不同而散居四方，卻在對共同議題的價值認同卻將他們再度集結在一起。2012 年的美麗灣²畔出現一座以漂流木製成的海龜，便是他們與當地部落社區一同完成的裝置藝術，在當時表達了阿海一行人對於渡假村開發案的反對立場。在他大一下學期時，也正值彰化溪州「反中科四期搶水事件」³沸沸揚揚之時，當時的阿海也翹課跟著高中同學一行人去夜宿彰化，表達抗議。

阿海在社工路的開啟階段，從環境的議題關注，到轉為在運動現場的現身實踐，縱然「社會工作」與「環境運動」課程，始終沒有在教學現場有所交集，但卻在這認同與期待的落差之下，醞釀出對主流社工角色的反思與對話。

環運後的認同斷裂：我不是社工？！

從在聯合國接觸到一群年輕人對氣候變遷議題關注的衝擊感，到返國後兩起環境運動的熱血參與，帶著澎湃激昂的感受回到系上，卻面對同學們對議題的漠不關心，加上當學年的社工課程偏向理論而少實務，理論又未與社會現實有所串聯，這些累積的體會，與當時自己對於社工系的認定差距太大，而引發認同的斷

² 美麗灣渡假村爭議，是一件在台灣台東縣爆發的土地開發案爭議，涉及生態破壞與經濟開發的環境議題。2003 年開始，台東縣政府以 BOT 方式將位於卑南鄉共計 6 公頃的杉原海岸出租予美麗灣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由美麗灣公司負責投資興建並經營美麗灣渡假村飯店，但開發之初即刻意迴避環境影響評估程序，遭到法院多次判決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與建照發放皆屬違法。然台東縣政府堅持繼續開發，因此屢次引發各界爭議。2016 年 4 月，最高行政法院連續判決台東縣政府敗訴定讞。

³ 反中科四期搶水事件發生在 2011-2012 年之間，起因於為因應中科四期、國光石化未來營運需水，經濟部中科管理局向彰化農田水利會調度農業用水，而大大影響農民的耕作與生計，也會造成缺少地面水的彰化地區地層下陷更加嚴重。此外，在農業區設置工業區的環境評估不足，勢將面臨廢水排放之污染議題。

裂，遂進一步形成了阿海休學的決定。「我那時候對於社工的理解是，社工要有很多實踐的…可是老師都在講一些理論，然後那些理論跟社會現實基本上沒有連接起來。一些攸關社會議題的討論，老師只是覺得，『喔，你們先讀好書再去談那些東西。』…「我自己還滿斷裂的，我一開始覺得這些也是社工，所以我去參加環境運動，跟我的社會關懷其實是連在一起的…土地的關懷、對環境的關懷、對社會的關懷都是同一個概念…我不會去切割…我是以一個根本人的身分，還有社工也是我一個身分…可是到了教育裡面，那個身分又被箝制住了…讓我覺得，我好像不是社工在關心這些東西，因為社工不關心這些東西。所以我才會去休學…」

這是阿海在大一時所面對的學習課題。此外，對於同儕在課餘的嗜好，他既提不起興趣，也無法認同——「同儕他們怎麼都在夜衝啊、夜唱啊…」而大學體制內的學習經驗又讓他感到「無聊」、「無趣」——「學校裡面得不到我想像中的社工。所以我就離開了學校。「除了是學校找不到我想要的…另一個就是我想要…去找一個答案——到底生態跟社工有沒有辦法得到一種共同存在的平衡。」阿海思考著回答，也盼望藉此能夠找到動力來就學。

體制外重建社工認同：我是社工且做社工！

休學後，阿海在部落社區以打工換宿方式作老人送餐、兒童課輔工作，之後所申請的「青年圓夢計畫」內容被該基金會接受，而開始了深入生態環境工作的學習與體察之旅。

計畫施行之前，他先前往某大學附設野生收留中心學習照顧紅毛猩猩，先行課程結束後再行前往計畫目的地——以搶救紅毛猩猩與雨林復育為目標的紅毛猩猩資訊中心(Orangutans Information Center)。「我覺得去那邊還滿有價值的！」阿海肯定地說。他實際進入到雨林部落，在以熱帶栽培業維生的部分地區，見識到人地衝突的嚴重。當人民面臨到最基本的生存危機時，縱然瞭解所賴以維生的產業會對環境與生態造成破壞，但也有著不得不去從事的現實逼迫。「他們在做

雨林復育，基本上他們要去復育的不只是森林…更是在生態裡面的人，有沒有辦法讓生態裡面的人融入在這個生態當中，去共生共存。…我覺得那個部分對我來說還滿有趣的…」對阿海而言，這段「現實」的看見有著超越文字的震撼，以及超越教科書的深刻。那衝擊深刻到一直延續著，當未來的他對社區工作有了更多實地觀察後，再度回顧起來才發現，「事後回來看…他們不是社工背景的，可是基本上他們在跟社區、還有跟部落的人溝通，都是在做社工相關的東西…」

計畫結束後回到臺灣，復學或增加實務經驗成了阿海的兩難議題，又不想提前服兵役之下，他還是選擇了復學之路。但在繼續完成大學教育的過程，他投入在以氣候作為關注議題的學生團體。經手社團法人的立案、組織行政事務，雖然所擔任位置並未處理太多環境議題面的文章產出，然而卻是他以學生身分所參與的第一個倡議組織工作。「學生在營運的社團法人啊…你可能真的會參加社團就是大二、大三嘛…我們的幹部群都是一年一任，所以每一年的目標會落差很大…路線上的分歧…成員間的流動…」後來就想說，跟我同屆的人很多都退了…接下來進來的都是比我小…也就沒有意願繼續做下去了。」

大三時，阿海離開了該社團。同年發生太陽花學運，他認識了一群作運動的社工，這也觸發他對於社工認同的積極尋找。「…我那時候一直都沒有社工認同。我覺得社工對我來說，那個專業身分或學生身分一點都不重要，因為我覺得社運那一塊，或是一般的社區工作、文史工作，基本上都在做社工可以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被框架住，反而是，到了學校以後才被框架。我後來接觸很多東西，就覺得我應該回頭來想到底社工是什麼？」在一場進步社工論壇中，他則進一步地看到了他所認同的社工樣貌——「…不論是土地的…-都市設計的…精障…性別的…政治的…在那邊看到了很多社工在做很不一樣的事情，我那個時候才發現，原來這些人也是社工。過往的養成，以及大一、大二…的那些人都不被叫社工，然後我回去學校裡面講，老師也說那些人不叫社工。」

阿海的社工認同並不在教育體制內被建立，而是在與非典型社工的互動、對談中找著。「漸漸的我也會覺得，我也可以把自己叫社工了！」「我的社工認同不像那種專業證照的認同。…我以前是覺得我這些就是在做社工啊。可是我不會特別講說，我是社工，因為我覺得，社工是你們那種專業底下的那種社工，雖然我覺得我在做的都是一樣…我現在，比較有一個社工認同是說，我也會講說我是一個社工，然後我會講說，這個議題也是社工要關注的…。」

社工視角的實踐再構：社工與環境結合之未解思辨

在認同建立之後，阿海對於學生團體的組織運作，與社工概念有了連結的建立。此外，與社團學生的互動，由原先的排斥，多了一份鉅視層面的接納與理解。

「我以前會覺得社工系的學生怎麼都不關心那些，會覺得都是他們的錯，可是後來，我會慢慢去梳理，不一定是他們的問題，而是整個教育層面。…然後也不要那麼地標籤正規教育裡面的那些社工。」然後我就會去把自己的社工概念跟他們作對話，去互相影響。」這樣的改變，也與當時有運動經驗的系上助教有所關聯，雖然他是處理行政事務，卻在他工作之外的分享上，對阿海也產生影響性。

「他對於社工的理解其實是不像一些老師是那種限縮的…他就會跟我講，像是一些組織工作，或是運動的概念。」

此外，社工視角的開展，對於阿海在生態環境被破壞的事件理解上，也能夠更加細膩地評估。「你會去看到…環境被破壞之下的社會脈絡，還有人在那個脈絡底下的生活。」他舉了有關原住民盜獵的議題探討，因此，也才不會停留在盜獵的道德議題討論，而遺漏了政治脈絡與漢人本位的視野觀點。

如今的阿海還是很喜歡山林鄉野，「…我可以在山裡面…一、兩個小時，或是一天都沒問題。我只要在…海邊啊，或是草原啊，或是山裡面，我就可以坐在那邊都不講話，就開始坐在那邊，然後放空，就感覺自己跟生態有那種溝通，我不知道那個溝通是什麼，其實就是很舒服，就是很平靜的那種感覺…」「我算是那種無神論者，可是我還滿相信…就是萬物有靈論的…」對阿海來說，雖然同樣坐

在大自然的鄉林野地，對身處在其中的感受仍一如往昔，然而，在社工與環境的關聯與結合之思辨卻一直存在阿海的內在意識。

「社工在想的一直都是…這個社會的人，但這個社會其實是超脫於整個物質界的…是人際網絡的一種社會，可是我覺得…是包含了自然社會的概念存在，所以我覺得，社工在談的那個結構…是以人為本的…沒有去思考如果人生活在那個物質社會裡面的話，那人跟物質的關係是什麼、人跟土地的關係是什麼。我覺得…那個關係絕對不會停留在人跟人類社會，或是人跟結構，一定會探討到人跟物質層面的，包含了人跟土地、人跟自然…」

「其實社工在做的是以人為本位的，…與我的生態概念又有一點衝突…我覺得人只是自然萬物裡面對等的，不會特別突出。所以，我自己還沒有梳理清楚這個東西的衝突應該怎麼解決。」我之前好像有一個答案，可是最近好像又沒有了，所以，還在迷惘當中啦。」表示仍在思考的阿海，在許多有關環境議題的方法切入與實踐上，也仍是語帶保留地說：「我自己還不確定，因為也沒有真的回歸到環境…去真的倡議一些東西，我覺得如果有的話，就會更清楚的想說怎麼用…。」

環境「道」路的社工實踐：鋪設環境運動平台，傳遞環境價值

雖然社工與環境間的思辨一直未明朗，然而阿海在兩者的探知與實踐都未曾停止。參與太陽花學運時，阿海發現運動現場的學生們欠缺扎根的組織，又經驗到學校社工教育現場對於社工想像的過於單一，因此，他聯合學校社工系同學成立一個以關注社工教育的學生團體——一個非科層的扁平化組織。透過這個組織彼此互助學習，也去探索多元的、基進的，或運動性的社會工作樣貌，進而反思整個社工的教育體制。在這組織中，雖然阿海是發起人，然而在實質的團體運作中，他常接受提醒地要避免過度發言，以讓他人的聲音可以傳達出來。

創始成員的背景經歷、參與目的都很多元，也因此可以帶來許多元觀點的刺激與討論。「裡面的同學很多是沒有運動經驗，有一些是有運動經驗；有一些

是原本乖乖牌的；有一些是進社工教育，有一些疑惑，但是沒有辦法得到答案的，會來我們這邊找答案；有一些是對社工教育有一些反感的人也一起過來。」阿海表示，他再度復學的這一屆，轉學生相對往年來得多，對於系上的學習，也同樣面臨與期待的有所落差、不太適應的，這些人都進入到這個團體裡，試圖藉由與他人的對話來梳理自己的經驗。「我們也承接了很多在社工教育裡面斷裂的人，覺得社工教育好像不是這樣。我覺得這個東西在很多社工學生都看得到，可是大多數都沒有被處理到…那些失落…那些質疑，基本上在老師身上找不到答案。」有時候你想跟老師對話，老師不一定願意跟你對話。因為，他們對於社工的理解就是那種證照式的理解，很 SOP 式的那種。此外，很多老師也欠缺實務經驗，所以你跟他們談…基本上談不出來。」

團體內雖然主要梳理的是社工學生在社工教育的斷裂經驗，但對阿海來說，也唯有學生們對於社會工作能夠立基於想像的多元，那麼回歸到每個人的生活樣貌去連接各種議題時，在氣候變遷的全球環境脈絡下，環境意識的啟蒙與實踐就必然會討論到。因此，這個學生團體的組織運作，是環境運動現身與投身前的一個基礎工作，也是一個實踐的平台，然而藉由社會工作所學——「你要陪伴學弟妹，那就是個案嘛…帶社團就是團體工作嘛。然後，你要去跟學校、系學會、學生…互動，那個對我來說就是社區。」經營組織的過程，對我來說，完完全全是回歸到社工實踐。…在組織中陪伴，關係的經營，然後練習各種組織的方法。」在團體中，他們曾經談論環保議題——如有機農產品的階級性，是否讓弱勢族群無法吃到健康的食材；在一次性的用品的減低使用上，引起大家對於不鏽鋼吸管、竹牙刷的網購。「前期社團成員在環境議題氛圍有形塑出來，有人分享說進組織後因為同儕都會自備環保筷、不拿塑膠袋，或是團購不鏽鋼吸管竹牙刷等，有時自己沒帶也會被同儕調侃，所以自己的生活習慣也會有些轉變…」為了更深入瞭解相關議題，他們也主動邀請社工界對於環境議題長期關注的社工來分享；在生死學與安寧的議題上，因著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會進而去探討「以人為主體」

的生命觀跟「以萬物為主體」的生命觀。當生活切身感受到空氣污染的影響時，他們也起而去六輕⁴作訪問調查，「想了解在環境問題下的人們如何生活，當環境問題引發其他社會問題的時候，社工該如何做…透過實際看到人們的生活，去了解土地跟人的關係…」此外，他們也一起相約參與反核遊行。

阿海表示，「那個組織就是在陪伴，所以回到每個人的生活當中，那生活當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就必然會包含著環境這個面向…」他進一步提到，「過往他們不一定會去碰觸環境議題，所以我覺得在那個互動過程…我就會把我的一些環境概念跟他們講，包含氣候變遷…巴黎協議…」近期，他也曾經去核對成員在團體中的獲得，成員們表示，「到現在對環境議題的理解、認識沒有很深入，但因為看到有人以身作則，所以生活面有慢慢轉變，在議題面也從以前的沒興趣、不想關心等，到現在會時不時的自己看，或是看到夥伴的文章分享也會看，慢慢建構自己的環境議題的認識。」一個關係活絡的團體提供了成員間彼此的對話基礎，這基礎就可以創造出主體在生態環境保護的實踐動力。

投身生態環境工作的關卡：「跨專業」門檻

一面接受著正規的社工教育，一面又遊走在各類議題的阿海，會因著缺乏對勞工的理解而選擇關注移工權利的實習單位，對性別感興趣而投身其中去參與、去理解，然而，走了一遭，生態環境保護仍是他一直以來不變的關懷與興趣。雖然，如今的他在環境意識的價值認同，得以藉由組織運作去發聲與傳遞，然而，對於退伍後在以生態環境作為投身場域的可能性，阿海提出了一個在知識論述層面上「跨專業」門檻的困難——「環境的一些基本知識…是在碰觸環境議題時的最大困難…。」

曾經認為能源議題有其重要性而想探究，但能源轉換率等專業知識門檻對他來講過高；曾經雨林復育見習經驗告訴他，需要去判斷森林的形成、林相的生物

⁴ 位於雲林的六輕石化工業區域。

多樣性，以決定是否合適砍伐，然而評估對他也非易事；針對紅毛猩猩的救援，需要基本的動物學、動物生態等基本知識作為基礎，對他而言仍有著現實的距離。曾經阿海參加一場生態性學會所舉辦的林相認識活動，「去森林裡面…，我看每片葉子…對我來說都一樣，可是他們就會說，這是什麼科、那是什麼科…我覺得那個是我最大的門檻。」

在關注氣候變遷議題之社團法人工作的他，也曾意識到若要進一步投入其中，自己會面對到的能力限制，「英文的門檻…UNFCCC⁵在討論的時候，全部都是英文。然後…國際協商的一些基本內容，國際政治的角力，還有國際條款，其實都是法律條文，因此，法律基本知識也要有，然後，法律條文裡面又很多生態相關的基礎知識，像…UNFCCC 有在談土地使用…又有更多專有名詞，所以那個門檻是一層一層上去的…」阿海對於所踏過與生態環境相關的腳蹤，一步一步都留下他思考過的評估，有著門檻難以跨越的判斷。

個人意義與展望：因為我知道我會改變一些人

縱然如此，阿海對於生態環境的熱情不曾消退。「對我來說那是很直覺式的，我的生命經驗裡面對於自然的喜愛，然後我覺得這些東西不可以被破壞。「過程當中必然有利己，可是，若以我對於社會關懷的東西存在的話，那必然也就存在著利他…」因此，阿海的關懷，不只是純然地針對自然，也包含自然底下的人；利他，也就不僅是追求一種永續環境的資源共享，還包含對環境破壞風險下受害者的視野。

在關心生態環境以來，阿海曾經見到社會現實的黑暗與美麗，「…就是有那麼多被破壞的地方，然後我也會看到一些很美麗的東西——人在環境裡面堅毅生活的樣子…」阿海陸續地提到，在反美麗灣開發案時，看到許多人為了這個海岸現身、發聲；反中科搶水的時候，很多阿嬤也為了土地站出來；在收容中心、在

⁵ 參註一。

雨林裡，直接跟紅毛猩猩的接觸…透過一場場實際現身的生命交會，成為他一件件深印生命的體制外田野教學——「你看到一隻紅毛猩猩被關著，你會覺得被關著；可是你接觸過後，你會覺得那是一個生命被關著。」

這是阿海不止息的腳步背後的動力——黑暗與美麗的驅動。「為什麼我會透過組織工作去談這樣的東西，這是因為我覺得…需要讓更多人知道，然後去讓他們做行為的改變。「因為我知道我會改變一些人…」



第二節 雲朵般自由變幻的實踐身影——雲子的故事

「就算我現在做的十件事，

不到一件事可以真的符合我期待，

但是，起碼還有這一件事。

但一旦我離開了體制，或許，連這一件事都沒有了。」

(by 雲子)

一、寫在故事開始之前

我和雲子素未謀面，僅是朋友口中一位進行該研究的研究生，她卻接受了訪談邀請，更開放她的家讓我便於錄音。雖面對著機構評鑑的忙碌，以及颱風而來的時間不確定性，但她對於參與研究的熱情卻沒有因而消滅，反而顯示在她熱切接受約訪時間的協調。若我的研究是她參與環境運動後的繼續實踐，她給我的印象，就像海邊升起的一片雲朵，在她的社工實踐中有著自由變幻的彈性，以及凝結水氣以滋潤土地的本質。

對雲子而言，社工角色像什麼？若以生態界的一種物質或物種做比擬，她吐了一口氣後說：「社工的角色就像一個變形蟲。」雲子是我為了符合「最大變異策略」(maximum variation) (Patton, 1990) 的選樣基準，以立意選樣的方式所邀請到的公部門社工。在公部門從事兒少工作已 6 年的她，對於訪談軸線的開放式題目，感到最困難回答的就是該題。然而，她卻還是侃侃而談地解釋著她的理由。「因為我覺得大家對於社工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期待。像你在處理環境議題的時候，那些居民會說，你去跟政府說，你去跟你老闆說，不要叫我搬，不要叫我幹嘛。但是，你的老闆會期待你要貫徹他們的理念或政策。」

她的敘說反映著她在公部門的工作內容、所處科層位置與角色的挑戰，以及現階段的工作方法與生存型態。「妳就要像變形蟲一般，就是想辦法可以怎麼樣

對居民傷害最小，但是又可以是他們願意接受的。「它也是代表一種彈性啦，因為，你如果很硬的，你就只是去衝撞上面或去衝撞居民，那，都不是一個最理想的。但是，你如果可以隨著你的環境而作而作一些調整的話，或許比較可以圓融一些。」不會過於壓抑自己，也不會被體制給吸納，這樣子的生存的型態也就是對於在運動的現身、發聲，以及環境意識的覺醒後，所讓她找到的一條留在體制內的新路——蘊含著尚未看見的新可能性。這條新路所須備妥的行囊，是她在訪談過程中不斷提及的「綜融」能力。

訪談過程中，除了有關公部門體制內的實踐故事，雲子相對自然流暢地表達外，對於其他提問總是採一種相對簡要、有問才有答，卻也是有問必答的方式回覆著，因此在回答中有許多因著思考而產生的停頓時間，也有著必要的進一步詰問，總然訪談前已看過訪談大綱。訪談結束後，雲子陪著我走到車站的一段路上，她提到，這樣的回答方式正也是在公部門的工作環境中所模塑出來的！的確，在短暫的互動交流後，雲子給我的印象總是很難符合，如今仍保持聯絡的大學同班同學對她的描述。如今的她，如她所說的少了稜稜角角，但圓融中也保有著她內在的真誠。

隨著她真切的回應，讓聆聽的我也對那科層體制的無形壓迫有著感同身受的窒礙感，但卻也被她那拒做公部門逃兵，而以覺察後所找到實踐環境公義之安身立命方式的努力態度與堅毅身影而激勵著，「我是覺得離開體制之後就真的沒有辦法再做任何事了…」

長遠來看，環境運動對雲子而言是讓體制鬆動的取向之一。對身在公部門體制的她所繼續投身的，是力求在體制中發揮影響力，無論是環境意識的推動，或是服務對象的最大利益，她都試圖在由上而下的科層組織中去找對對外、對內的發聲施力點。就像雲朵幻化成雨水後，對土地有著滋潤，也有著穿透力。

二、生命故事敘說文本

藍天白雲的天空下充斥的蟲鳴聲、歡笑聲，田埂間也閃現著一雙雙追逐的小腳、晃動的小手，而閃耀水花下看不見的是那小小心臟的雀躍跳動——那是雲子年幼時在花蓮外公、外婆家生活的片段，也是讓她如今對環境議題關注的一個久遠卻未曾遺忘的土地召喚。

從小生長在臺北的她，訪談一開口就說她是花蓮人，一連兩次地表達對家鄉是花蓮的認同。小學、國中的整個寒暑假，在山、水與親友的環抱，是讓她將那塊土地深印的因素，就算工作後，路途遙遠也無法隔絕那想念家鄉的腳步，每兩、三個月，雲子都還是會回花蓮一次，「我覺得花蓮太美了。」當遇到挫折，熟悉的田野的風景也會為她帶來安慰，「我還到現在，我就是每一次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我都一定要找田。「當我看到田我就會覺得，喔，好像有就比較回到花蓮的感覺，因為我可能沒有辦法立刻就回去，但是，我就會覺得這裡好像有讓我比較貼近花蓮的那種感覺，就是那個家鄉的感覺會讓我有一種，我覺得那是叫根嗎？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會讓心情比較平靜。」

社工這條路：從一無所知到整合已知

對於進入社工系就讀，雲子說是一個「巧妙的緣分！」當時考試成績並未十分理想的她，選擇甄試資格、條件門檻相對較低的社工系，「有推甄上的話，就試試看。」站在道路起頭的她，對於社會工作學系的實質所學一無所知，「只是覺得好像就是跟人的工作，所以跟我自己的興趣，還有以前的生長背景有一些關係。」

國小、國中時期的雲子，對於班上那些被邊緣化的同學，總會投以注意、加以關心。當時，穿著不整潔、沒有午餐吃的同學如同原罪般，會遭到班上一群功課好、家庭優渥的強勢同學給排擠。有時雲子會因著成績好、被老師喜歡而被吸納進這個主流小團體，但對於他們欺負其他同學的行為——「特意把他的褲子拉

下來啊，或者是刻意，刻意把他的桌子藏起來啊，刻意把他的書包、書本偷偷，反正就是調換之類的，就是惡整他們」——有著強烈的不認同，然而她卻不怕成為被排擠的一員而毅然決然地脫離主流團體，因此也與被邊緣的那群同學更加親近。過去私底下的默默傳遞便當、文具給予，也因此能夠相對容易且自在些。能毫無顧忌地幫助同學的雲子，背後是因為有著同出一轍，對弱勢者關懷的母親。無論家境富裕或中落，她的母親對於有需要的人總有著不能不伸手扶助的心，「不管自己身上可能只剩 20 元，她可能會把 10 元分給別人，然後，自己已經忙得不可開交，看到有需要幫忙的時候，她一定會去幫忙。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有時候小時候不太諒解，因為覺得，怎麼我們永遠都沒有被排在第一位，但是長大之後就覺得，其實有時候就是可能他們比我們更需要。」這樣的理解是在雲子大學畢業後，面臨到一些生離死別，才體會到那個人之急所帶下如及時雨般的重要與珍貴。

這段雲子過往的曾經，就在無形中推動著雲子踏上這條她所未知的社工道路。也因著在入大學以前，社會工作者這工作類別都未曾列進她對於未來職涯的藍圖想像，她曾經的想像非常多元，舉凡新聞工作者、律師等，因此入學後的她同時也雙主修企業管理學系，「因為我覺得社工也不是唯一一條路」但如今出社會的她回頭來看自己當時的狀態與選擇，她認為多元的專業養成可以擴展不同的思維來看待同一件事情，加增對不同族群的理解程度，同時也儲備與其他專業者對話的綜融能力。「就像以這個主題環境運動來講，我覺得社工人的思維，跟不同養成背景的人看待環境運動，其實是不同的，不同的思考頻率。但如果妳要跟人家對話，妳一定要懂為什麼他會這樣想，不然，我覺得就會一直在不同頻道上，其實很難對焦。」對於那時追求興趣與專業多元的評定，如今的雲子多了一分對當時自身主體思想與行動肯定的眼光。

但雲子進一步回想當時，她認為大學的校園環境是很封閉的，學校對於學生參與運動的態度是不支持，也不鼓勵；課堂上僅是輕描淡寫地帶過去；同學間也

不易找到共同親上現場的夥伴，有時也需要特別掩飾，少有對運動的談論。課程安排想當然爾的，不會有社會運動這門課，也少有環境意識的培養。對當時的雲子而言，環境運動理應劃屬於社工領域的關懷，但是否必要參與投入，應由個人自主決定。

但對於當時一位授課老師，時不時分享他投身在原住民居住地遷移的實務案例，以及介入在老舊社區開發案十年的過程，無形中卻催化了雲子的環境意識與看待事情的視野，「但這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她笑笑說。「我覺得在社工養成教育，我們很重醫務，很重那些專門領域的。」「除非你要自己去把老師這個東西去套在解釋裏頭，但是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是跟環境運動是有一些連結的。不管是從大學或研究所都有像社會倡導的課程，然後或者是政策決策的那些歷程，是可能跟這個有一些關係的。」站在現今時間軸的她如此提到。既是工作者也仍是研究生的她，在碩士班所修習的社會倡議課程，便使得她對於表達訴求的多元方式有所理解，也增加了該取向的認同。

關心了家鄉道路的開發議題、踏上反核運動之後，再回過頭來看，雲子也補充著，「確實我覺得社工的養成，會讓我們對於環境議題的一些敏感度和覺察度，相對而言比較高的。」

環境意識的覺醒：同鄉的同儕是關鍵啟蒙者

回顧學生時代對環境議題的參與，雲子幽幽地說：「我根本沒有關心過，沒有特別關心到這個議題。」「我覺得要關心的事情太多了…」因此，雲子的環境意識覺醒是在出社會後，在面臨家鄉環境的可能破壞，以及大學同儕也是同鄉的同學在社交網站轉載、發佈環境議題的文章和資訊才滋養生出。「他就開始在他的臉書常常會發布有關家鄉的一些訊息——有關道路要不要拓寬啊，或者是一些開發，我是從那個時候才開始比較注意到環境議題。」道路拓寬即將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摸著了雲子珍視家鄉的情懷，也促成了她在環境意識的啟蒙。「當我的家鄉發生甚麼事，我都不知道，我都不關心的時候，那是一件還滿可悲的事。」但

因為它的行動地點在花蓮，在上班時間，就是在一個我比較困難的狀態。」雲子以艱困的語態解釋著沒有現身的原由。此外，影響現身或投身還有一個最具挑戰的關卡，「我的工作給我的一些包袱，讓我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不然，我真的有時候真的很希望能夠多做一些。」

非週間舉辦，且有著地利之便的反核運動，是雲子首要現身的運動場合。雖仍肩負在體制內被邊緣化的無形壓力，但雲子珍視這片土地的人民與環境、追求世代正義的理念，以及那位既是同鄉也是同儕同學不止息地在 Facebook 社交網站上的發言與行動，再再地在她心思、意念和情感中發酵，使她不只是私下額外花時間瞭解相關文獻和資訊，或是在 Facebook 對於認同資訊的按讚，雲子她浮出水面，現身反核現場。「他（同鄉／同儕）那個時候有參與幾場比較大型的一些活動，我沒有到每一場都去，但是我去了兩場——兩年不同的核四。「但只要我到現場，我就一定會到活動整個結束。」

「但我覺得踏上運動…跟只是待在網路前面、電腦前面，是不一樣的感覺。然，當妳在滑（以手機瀏覽）新聞的時候，妳總是會自然地會先停留在這個新聞時，踏上運動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接。雖然不是唯一，但是，是一個很重要的歷程。」第一次踏上反核運動的現場，不是刻意前往，而是無意中經過後留在現場的，也因此讓她體驗到參與的感覺。時隔一年多後的再次踏上，「我特地穿越人群，走到舞台正前方，跟他（大學同儕）講說：『你太棒了，加油。』然後，我就再走回來，但是那個過程當中，我覺得令人很感動，就是你好像有機會把你的想法，跟你的意見表達出來。」雲子笑著表達這段，卻哀嘆著說：「在公部門，我意見表達的機會更是少。」

現身環境運動的難：孤獨卻也不孤獨的身影

公部門要改變不僅好難，對於要在公部門中，以個人參與運動也好難。雲子在這段的敘說中沒有停頓，娓娓地道出公部門要改變的難。「它存在有很多的集體迷思。比方說，他就是一個很服從性的組織。就像我覺得，在近年來有看到好

一點點，但是那個服從性，跟上一致性的那個思維，其實很難被打破。」而參與運動的難，不只是「忙碌」這單一理由，「你在公部門做那種很基進的反應的話，你只會有兩種狀況，一個就是你會被體制給邊緣化、貼上黑名單啊，或者是影響考核，或者是覺得妳政治不中立。第二種就是，如果妳夠厲害會被拔升到一個位置，但，這樣的人真的太少了。」雲子進一步提到，「政治中立」也是評核員工能力的很重要的一個指標。相對而言，約聘人員的包袱就沒有正職員工來得多了。因此，進入運動現場的她會格外強調是以個人的身分參與，不主動宣揚運動組織單位的訴求與理念，也不在職場號召參與，而是有意識地在職場中隱身以作為運動現場現身的狀態。在職場，她參與運動的行動往往是孤獨且低調的，雖然並沒有刻意隱瞞，但也沒有人詢問或談論，「但如果他們問的話，我會說…」她思考後如此地說。「其實我必須說，我很羨慕他人，可以想打卡就打卡，或許也是我自己顧慮比較多。「我好羨慕大家可以說：『ㄟ，我在反核現場，大家快來之類的那樣。』但是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做到這樣我可能隔天，我的主管就會問我了，或關心我。「我必須說，在公部門不適合太多的現身，就連我可能太明確地表達我的一些政治立場，其實這個氛圍都是不被允許的。」但同學間對於她的參與都很清楚，這讓雲子在訴說的時候也露出滿足的笑。但在提及這段內容時，她也刻意補充著，她有九成的同學都不是公職社工。

由此看來，公職社工的她要參與環境運動從來就不是一件經線性思考後就可以決定行動方向的事。雲子的現身所要對抗的不僅是運動的訴求對象，同時也是公部門體制的壓抑，她需要瞻前顧後、小心翼翼，考量著如何不被邊緣化的公開尺度與可能性，也需要拿著個人考核作為冒險。因此，現階段的她，選擇不刻意隱瞞，卻也「被動回應」，來作為在職場揭露主體在運動實踐的尺度。

壓抑感最大的一次是家鄉道路拓寬的行動，一條人車流量少的道路，僅為了減少 10~20 分鐘的車程，而要犧牲週邊的自然環境，「我就覺得這個價值我不能夠認同。「雖然大家都會覺得蘇花公路真的很難開，我也覺得很難，但是，我每

次看到那個蘇花改，我都還是覺得很痛心。最美的風景、最原始的生態，一條公路劃過去，其實都已經被破壞了。「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沒有辦法請假，所以我就沒有去了。」對雲子而言，那個可惜、難過的情緒在於無法為自己的家鄉土地發聲、多做一些事。這次的經驗卻也為她帶來一個積極的態度，「下次有機會，不要讓自己再後悔，多去把握機會，有時機會一過就沒了。」

「我覺得政府的思維確實需要有更多調整和再思考的空間…」在公部門這麼多年，我覺得，公部門要改變真的好難、好難、好難。「但是，如果不做（參與環境運動）就真的沒有機會。」對雲子而言，參與運動是個催化政府改變的重要取向。因此，反核運動現場的現身行動，得以促使政府去尋求改變，提出更好的解決對策。縱然她對於行動的正當性與必然性採取高度的認同，然而，雲子也仍需特別切割，「自己是以個人身分去支持與參加。」足以可見參與運動現場，對公部門身分的她所帶來的體制壓力之大。因此，對於容易被辨識立場的網路文章轉貼、發文，相對一般人可能是簡單、容易，但對於處在體制中的她卻是困難，因此也就會選擇性地避免。

運動後的社工角色解構與建構：我不是公家機器人

「我覺得在過程中一直要提醒我，記得要去思考，要覺察…要更接納不同的聲音。」在這段環境運動的參與過程，她不斷提醒著自己，雖然她表示，許多時候會想麻痺自己，以減低自己高漲的情緒，然而，她仍須面對這社會正發生的事件。除了對環境議題的多一些參與與覺察，這參與經驗也幫助雲子重新建構在實務中所要扮演的角色與位置。「以前（就讀研究所之前）我沒有那麼喜歡思考，是因為我覺得思考會帶來更多的掙扎，尤其進公部門之後。當我們愈會思考的時候，其實你的掙扎愈大，因為公部門有的時候很希望你當一個機器人——我發指令 A，你就是做出 A 就好，你不要做出 B，也不要做出 C。」我覺得有段時間真的滿痛苦的。我那時候覺得，唉，念研究所之後反而讓自己更痛苦了。因為，妳覺察之後就會知道有些事情不對勁，但是，妳很多時候妳又不一定能夠立刻就改

變，除非妳選擇離開這個體制。對，所以，我覺得那有一段時間真的還滿痛苦的。」連兩次說明著痛苦曾經的雲子，悠悠地表示，身邊許多同事也是因此而離開了既有的職場。「很多人在那個過程當中受傷了，甚至離開體制的，我周遭非常多人這樣…」相對的，留在體制的她，在當下說出經驗的她，已反映出較高的自尊與權能感。

「我本身不是非常基進的人，我也不是很乖、很順服的人，但是，確實來到公部門會把我的很多稜稜角角都磨掉，也確實讓我很多的想法跟聲音被消音掉…」對雲子而言，痛苦的解套便是在壓迫環境中，找到可以在體制外參與的方式，以及體制內的工作意義。雖然公部門的框架比民間部門來得多，但對於大量承接公辦民營業務的民間部門，所面對的評鑑單位也會是公部門，雲子表示，那是一個集體困境，不見得轉換職場就能獲取較多的發聲可能性，因此也有因為無法承擔體制壓力而完全轉換工作領域的實際例子。但對雲子而言，工作環境或許有著限制與阻礙，然而她在體制內的實踐卻未停止，而有著意識覺醒後的選擇性自由，這也是她內在權能感的展現——「幫助他們（服務對象）在體制當中找尋多一點的呼吸空間…那我覺得就有我出現的價值。」

環境「道」路的社工實踐：發聲空間的爭取與對話平台的創造

從環境意識覺醒，到踏上環境運動現場，既是花蓮人、社工所學生，也是一名實務工作者，這一連串的经验與重疊的角色，無形中使她的思維生發改變。帶著這轉變的思維不僅去關心其他環境議題，「你自然而然的也就會去關心六輕事件¹…以前可能不一定會特別注意到這個事件。」同時也會以此去審視在工作中的權力關係，調整自己的實務內容與目標，之後再從「社工我」的身分提出對社工教育體制的建議。

¹ 2016 年 8 月，國家衛生研究院發表所執行的「六輕石化工業區對附近學童健康影響」的研究結果，發現對於鄰近六輕工業區僅 900 公尺的橋頭國小許厝分所學生，尿液中氯乙烯代謝物硫代二乙酸（TDGA）濃度明顯高於其他學校，顧及對學童健康的疑慮，衛福部國健署因此建議遷校；此決定引發台塑集團、校方與地方政治派系的爭議。

「你會對於很多事情會有更多不同反思，尤其在處理一些環境有關的議題時，比方說像有一原住民部落，它要不要遷？適不適合居住？過去可能會覺得，上面長官要怎麼做，就怎麼做啊，也不用講太多，反正這也不是我能決定的。但是，參與環境運動後，我會再想，用什麼方法可以為他們多做一點。或許我們沒有辦法為他們做到百分之百，但是，我可以起碼讓它從中取得更多的平衡。我覺得這是在公部門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雲子不是一個會衝撞體制的人，但過去消極以對的她，如今轉而有意識地採取柔軟、圓融的具體作法，一種人際面向上的充權便在他的實務中顯出，「我的主管有些可能是社工，有些不是社工，他們在理解同一件事情上，『為什麼他們不搬，都已經蓋這麼好了，有專屬的房間，比他們原本的房間好太多了，為什麼就不搬過去。』但是對於土地的依戀、對他們土生土長的土地感情，你要用一些他們的話來讓他們理解。「你如果只是情緒性的去建議，那對於事情沒有甚麼幫助，你要提出更好的方案…去逐層說服。

與服務對象的專業關係中，也提醒著她要更謹慎使用她在社工角色上所被賦予的一些權力。「社工其實也是有權力的，尤其跟案主的一些權力關係，我更應該要拿捏思考，怎麼樣才會對他們比較好的。」在公部門中，雲子有時候會是政策的規劃者，有時也是方案的擬定者，她說：「我的一個政策出去，可以到千萬或百萬的預算金額，我到底要怎麼更貼近我的服務族群的需要。我覺得這是我一直要提醒自己的，我更應該要傾聽不同的聲音，也要幫助他們願意表達他們的聲音。」

在實務方面，從事兒少領域的她表示，「我覺得上面長官一直忽略了青少年族群的聲音。他們往往會覺得這過程是不重要的：『你就設計完之後，就告訴他們有這東西就好啦。為什麼要去瞭解他們要什麼』。參加環境運動的經驗，會讓我想要知道他們（青少年們）到底想要表達什麼，他們的聲音到底是甚麼。只要我有機會，我也會嘗試讓他們（上級長官）知道。」雲子認為，傾聽他們的聲音，

有更多接觸他們，才會設計出對他們有益、他們感興趣，以及滿足他們現階段需要與困境解決的方案。

社工可以掌握個案所參與的方案課程，而以生態環境作為主題卻不曾是雲子的選擇之一。「我覺得參與環境運動後，會讓我比較想要設計比較多有關環境議題的方案。」體會到土地與環境對自身的意義性與重要性後，才深刻意識到該議題對個案的重要性，尤其是原住民族。從個案最親近的土地開始，認識社區、美化社區、二手物資的再回收利用課程，和油漆牆壁等，她觀察到：「過去，孩子們都是做自己的，跟大人的關係不一定是那麼地緊密。但孩子們跟孩子們一起來完成這件事情，他會獲得大人很多正面肯定時，尤其那些比較自卑、比較弱勢的孩子，他們會因此獲得肯定，社區也不會覺得他們是一群壞孩子。他們對於這塊土地的認同度也會提高。」雲子提到，原本苦悶參與的個案有所轉變的關鍵是，外部師資以遊戲切入切身環境相關的方案設計，加上同儕關係的影響。

說明這段實務經驗時，雲子自然地以在社運組織單位就職作為類比例子，「若我在社運組織工作，我相信我的選擇、我的行為就一定跟現在有很大的不一樣，因為我的團體、同儕都這麼做，因此，我也會覺得這件事是被支持的。「我認識的朋友也在這個場域裏頭，我就會覺得在這個場域對我來講會有熟悉感。對，雖然他不一定要是很靠近的朋友…」這同時顯示出，現階段的雲子在參與環境運動、關心環境議題，內心渴望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有形或無形地彼此支持著，甚至可以毋須結伴同行，只要知道認識的人已經在現場，就足以對自身產生支持的程度。

提到對現今教育體制的期待時，似乎也呼應著她認為同儕在環境議題之社工充權的重要性。「畢竟有一群人一起討論的時候，妳就會覺得，喔，原來這件事情大家是怎麼想的，跟怎麼去理解的。以前這種機會都還滿缺乏的…」以前我們沒有類似的社團，我們有很多是那個服務性的社團…」雲子表示那是一個平台的

概念，無論是社團組織或是選修課程，它能提供對話，也讓她不是一個人孤單著關心這個議題。

個人意義與展望：讓下一代欣賞到我所欣賞的「美景」

對雲子而言，參與環境運動的意義在於「世代公義」的期待——盼望下一代也能跟她一樣欣賞到她所欣賞的美景。「或許說生存權也貼近，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不能那麼自私地對於這塊土地過度的開發，未來這片土地還要留給我們的後代子孫...一旦破壞了，就是不可逆的過程，雖然要下這個破壞的決策是這麼地容易，但是要復原就已經是很難回頭了。」此外，同時也讀到是，她那對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心疼——「有時我回家鄉...雖然大家都會覺得蘇花公路真的很難開，我也覺得很難，但是，我每次看到蘇花改，我都還是覺得很痛心。最美的風景，跟最原始的生態，其實一條公路劃過去，就很多地方都已經被破壞了。」



第三節 山嶺般屹立不移的實踐身影——阿山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具體的挑戰，
就是我們怎麼讓更多人對這個環境『有感』¹。」

(by 阿山)

一、寫在故事開始之前

若沒有輾轉認識阿山的機會，我的論文可能會陷入無限期地停擺。當我在四處請同儕朋友媒合符合研究目的之合適受訪者，同時也投遞訪談邀請至各環境相關機構後，唯一重複介紹率最高的受訪者就是他——在社工領域談論這個主題，就會自動與他的名字連在一起；而我手邊除了他，與另一名研究對象阿海以外，也再無其他名單。談到這邊，也就得以瞭解到，阿山在這一領域的高代表性，他的記憶裡也刻印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儕、朋友，我那另兩名期待條件的研究對象，就是委請他媒合的。

他就像一座蘊含著生態環境與環境運動知能的寶山，坐落在社工領域裡；任何有關的問題，他的腦海似乎都可以隨時調閱出相關內容。因此，在故事中，我以阿山作為他的化名。

訪談中，他一貫的表述承載、交織著社工專業的知識，講述著曾經的故事時，又會聽見他穿插著當下經驗累積後的主體反思；不僅反身訴說著過去的足跡，其表達的內容也已是重新在所接受的知識觀點上分析出的內容。好比家庭教育對環境意識的影響層面，雖然阿山對生態環境的情感是從家庭教育而來，但他也會進一步補述著反例的看見，「我也覺得不一定，因為我弟弟就是一個從來都不會幫別人的個性，可是我們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的。他沒有什麼熱心助人的個性，他是

¹根據敘說者的故事脈絡，「有感」意旨覺察到環境議題的重要與切身。

一個到現在都還不願意作好資源回收的人。所以說家庭，好像也不完全是的樣子…」

阿山的述說風格像是一位編織者——將生態環境、社會工作與個人反思的觀點，一條條地交織在他的生命故事。若以生態界的物質或物種作比擬，阿山覺得與社工角色最為接近的應該是細菌。「…細菌其實就不斷地去分化啊，所有結構的東西，使得大家回到一個一同的狀況，去創造一個新的物質嘛。我覺得社工其實要做的…不見得是一個領導的人，可是他在社會裡面不斷地去把我們所共同的知識去擴充，使得大家盡量回到一個可以共同、可以永續生活的那個結構裡面。其實就是用一個不斷去分解，分解這個社會結構各式各樣不同出問題或是不同大家歧視的問題，然後去分解完之後，然後使得我們社會回到一個共同可以生存的狀態。」

在他的實踐故事中，正如他的比擬，出現許多對於社會事件的結構觀點之分析，及在社工脈絡下的評估，不僅是口說言談，隨後所鋪陳的更是他一連串在所認同之價值意識的實踐行動。正如他在參與環境運動的姿態，有著許多從理性分析與評估後的價值堅持，就像一座山嶺的存在感，不僅在那遠觀的屹立身影，也是近距離接近後的生機展現。

二、生命故事敘說文本

在臺北出生的阿山，從小跑遍外雙溪、仙跡岩等風景區，同時也會去觀賞原住民文物展、參與原住民孩童的募款活動等，這都源於他那身體力行在關懷自然、土地與環境的父親，「當東部小學到台北辦募款活動時，我爸爸就會帶著我們去耶…後來在家裏會發現，怎麼有奇怪木雕甚麼原住民藝品…」同時也因著父親的浪漫情懷，他在十歲時舉家搬遷至花蓮。

環境意識的啟蒙：家庭教育、國中導師、環保志工

從城市搬遷到鄉間，父親口裡的心意——讓你們享受童年，對被迫須要離開熟悉環境與同儕圈的阿山而言，感受不到一絲美好的喜悅與興奮。在花蓮的生活，父母仍然每週為他們兄弟安排大自然之旅，眼底的美麗景致卻沒有因著他對環境的短暫不適應而在他心底一無痕跡，相反的，隨著所踏的土地埋下他在未來對環境的深厚情感。「我們小時候真的喔，每一個週末都是太魯閣啊，去哪裡，就到處去玩啊。所以其實跟這塊土地、跟環境，我認為是滿深厚的那個情感啦！」

然而，對這花蓮這片土地的喜愛與價值的看見，是直等到在外地就學的空間距離拉大了才甦醒過來。「譬如說我們學校就在海邊，隨便就可以去烤肉，這件事情在城市裡是很珍貴的，所以我認為那些價值，在當時的我都不是可以感受到的。「到臺北來念書之後，想要去海邊，覺得心情不是很好，喔，天啊，騎車騎到淡水才有海，而且還是很髒的海，會覺得，天啊怎麼會這個樣子，那時候真的好深刻...回家還比較方便一點點，家裡旁邊就有海，是漂亮的。」

家庭教育給阿山的養分除了對環境珍視的情感扎根外，還包括對參與社會運動之接納意識的建立。「基本上是開放的，沒有太大阻力，這在一般的家庭比較少見...尤其是我爸爸啊...比較基進，他就覺得，就是應該要衝！」「他在看到公共議題的時，本質上是有一個反抗的態度——就是對於事件的質疑程度是高的...有獨立的觀點，對於環境、生態、人文這塊地的關懷是多的。」

國中時期的阿山，遇見了讓他參與環境運動的啟蒙者，也是對生態環境保護之價值建立與滋養的培育者——國中導師。

若要針對青少年選擇戶外教學地點，垃圾掩埋場似乎不會成為選項之一，在那裡進進出出只有垃圾、垃圾車，和工作人員，偶爾還會有各樣的小動物在當中穿梭覓食。反觀海邊，或許是戶外教學的可能選項之一，玩水、觀夕、聽海、戲沙或大地活動等都可以是選擇的理由與焦點。然而在某一天，一群國中生現身在

垃圾掩埋場，為了體會到垃圾分類的重要性；也在某一天，他們出現在海邊，為的卻是那一座座的消波塊。這些體驗的安排，就是阿山的國中導師，她同時也是非營利環境組織的一員，「我的老師是有環境運動經驗的，她是老師的身分，但是她有在做環境運動...這其實也是促使我會去參與環境運動很大的原因。」

在那時候也開始了阿山環保志工的身分，掃垃圾，在資源回收場處理全校的資源回收垃圾，他語調上揚地補充著說：「以前那裡真的很臭ㄟ！」雖然他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學生，但阿山表示，是為了躲避晚自修考試，而自願花時間去處理臭氣沖天的垃圾場。上了高中，對阿山來說念書也同樣不是學生生活的唯一，「在學校裡面...念書之外沒什麼事。」因此，他繼續從事志願服務，除了被老師指派照顧同學以外，最大部分的服務內容仍是資源回收。

志願服務工作便是阿山實踐環境保護價值的開端，同時也是使得他去報考社工系的因素。「我從小看一些那種被欺負的故事就會哭，對於外界的觀感比較強一些吧。所以才會去做志願服務...」可能是有人天生比較具有同理心或同情心——我覺得那時候還沒有辦法到所謂同理。那你就覺得弱的人就應該幫他。我連看棒球，選擇的隊伍都是那個成績最差的...」雖然未曾接觸過正職社工的他，對於該社工的想像只停留在服務弱勢者，當時也產生一個錯誤的假定——就讀社工系可以變成這些志願服務單位的工作成員，因此才下了報考社工系的決定。

在高中階段，阿山的家鄉面臨重大公共建設——「蘇花高速公路興建計畫」²的政策推動議題，對已建立生態環境價值的他而言，加上曾經居住過交通路網相對發達的城市經驗，讓他對這開發案產生了問題意識。「嘖不行，這高速公路來感覺不會有甚麼好事情發生，所以就開始收集一些資料，慢慢地去理解這樣子。可是你知道，高中生能做什麼事情，其實很有限，就是在這些資料的累積這樣子。」

² 蘇花高速公路興建計畫（簡稱蘇花高），2003 年行政院將蘇花高速公路興建計畫納入「新十大建設之第三波高速公路」的子計畫之一來推動。因諸多爭議而先後變更為「蘇花公路替代道路」（「蘇花替」，2008 年）、「蘇花公路改善計畫」（「蘇花改」，2010 年）以及「國道東部公路蘇澳花蓮段」（2011 年），與後來 2011 年動工的蘇花改省道為不同路線。

當時發生了一個進一步行動的契機——阿山獲頒全國青少年志工獎項，獲獎人有機會與當時的行政院長進行青年志工的經驗談，在一群獲獎環保志工的輪流發問與回答中，阿山獨異於人地說：「我是從花蓮來的...環保志工，我們不希望蓋高速公路，希望院長可以審慎地思考。」當下地方志工新聞，轉變成全國政治新聞。這是阿山第一次公開性地為所居住的土地發聲。

社工路上的環運實踐：從家鄉土地開始的現身與投身

大二那年的寒假，蘇花高速公路的議題仍在沸沸揚揚，記者會媒體新聞報導不斷，各方知名人士也表達反對立場。「...那個時候新聞做的都是外地人反對高速公路，但是本地人支持。那我自己就覺得奇怪，我在花蓮明明很多高中同學也都不支持，而且覺得高速公路對我們不是很好...」過年期間，在一場與高中同學聚集閒聊的聚會中，一場連署活動於焉興起，以此公開表達他們反對的立場。這是阿山自主號召集結的第一場與環境議題有關的行動，而且他還擔任發起人。

在花蓮的同齡孩子間，似乎有著不成文的約定，能夠離鄉就學，就不會留在本地。因此雖然九成以上的高中同學都到外地求學，然而這個事件的時機點是在那假期太短，無工可打的過年期間，街頭的連署活動在當時沒有如議題般來得嚴肅，反而間接成了充滿歡樂氛圍的同學會。一連五天的街頭連署，不須刻意排班輪值，「修糾」（台語發音，意思為：相約）一下即可。由於花蓮的生活圈相對小很多，同鄉友人的緊密度很高，因而那次的連署就靠著同學間從小大大所建立的緊密同儕網絡，累積了一、兩千份名單，大部分是來自本地年輕人的簽署。但阿山也補充著他在事件後的反思，「那連署非常的有問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的話，它就是簽一個名字，但是名字重複也不知道。也沒有 18 歲不 18 歲的，那觀光客走過也就簽一下，就是你根本也沒有好的統計啦，就是有名字、電話，跟 e-mail 這樣子之類的。反正就簽得亂七八糟...」

開學之後，阿山也不知道手邊的連署名單的功能與用途，但他沒有擱置一旁，而是詢問國中導師，也藉由網路查閱，在媒體相對發達許多的當時，因而讓他查

詢到自己學校老師曾在一場反對立場的記者會上發言，那位老師辦公室也就在他的系辦的樓上。「我就敲他房間，拿了一、兩千份說，老師我是阿山...這些連署書怎麼辦？」該位老師驚訝之餘，也連結幾個環保團體給他，那對阿山而言，是環境運動實質投身的契機。「那個時間點還滿有趣的...就是『反對的都是外地人，然後贊成的是本地人』對立氣氛很濃。所以...我們的出現給了反對方非常大的一個振奮，因為我們的身分是完全的政治正確——在地長大，而且還是年輕人，然後，跟這些在地的長輩不同的意見，而且還做了這麼多的東西。」在那一年的運動中，阿山進入大三，他在街頭記者會的實戰經驗也快速累積——站在第一線，拿大聲公講話，去地方嗆聲。雖然倡議工作有好幾條路線同時進行——涉及環評相關的專業研究、工作坊、一線倡議等，由於阿山的口才，便讓他成為第一線倡議工作的指標人選。直到 2008 年 4 月，因著環境評估而將此開發案退回交通部有了一個終結。

大學畢業後，阿山的目標是要成為第一線社工，而不是繼續環境倡議的工作。「那這當然有一些脈絡...之前在做蘇花高運動的時候，其實我看到了環境運動工作者的工作現況，...他們不是一整天在處理環境議題，因為非營利組織要處理很多的核銷啊，就多到做不完；而且這種小組組織裡面要面臨的東西更多，我想說天啊，我只想做環境議題，我對環境教育也沒有興趣，所以...我說那我要回去做社工，我閒暇的時候再參加這樣子。」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一個規劃在家鄉著名風景區的度假村 BOT 案，使得阿山的生涯規畫有了非預期的轉變；這也是他投身的第二場環境運動。「我覺得不對，不行這樣做，那先前在花蓮帶著我做運動的一些長輩就說，阿山，你在臺北學那麼多經驗回來，這個東西給你擋。那時候覺得，對，沒錯，要貢獻自己的心力。所以那個時間點又再去開始處理地方的環境議題...最後它也沒有蓋成功...」這次的行動，又將阿山在環境倡議組織的投身推得更近一些。

「念書的時候，想說我畢業的時候就不要再碰；…當兵的時候就想說，…當兵總不能碰吧，我就做到當兵前這樣子，但…當兵前還是繼續做嘛…」在他服替代役期間，立法院三讀通過「花東地區發展條例」³，由於擔心關注觀光，而忽略環境與文化之在地連結，加上國有地也扣連著一個原住民土地的問題，在意識到茲事體大，因而又再次投入。一場接續著一場，「蘇花公路改善計畫」⁴也面臨即將推動的時機點，阿山再度接到組織夥伴的協助請求，「阿山啊，你趕快，你能不能請假出來擋幾場電視的 call-in 節目、去開幾場記者會。因為，我們再也找不到那麼身分正確的人了…」那個時候，他才突然清楚地意識到，環境運動這樣的領域，其實是沒有很多人的。這個意識在阿山的職涯轉向中扮演著關鍵性的因素之一。

投身環境運動的動機與動力：對於永續環境得以實現的期盼

當時，阿山原本下定決心在大學畢業後就不再從事社會運動，「我覺得做社會運動就不是一個可以當飯吃的東西，就還是有一些經濟的壓力…有很多的壓力，就覺得不應該做…但對於環境運動缺乏參與的警悟，卻成為推動阿山職涯轉向的其中一道從意識生發而來的力量。」在做蘇花高議題的時候…大部分的學生…比較多關注的議題是樂生療養院拆遷⁵，就是人權類的東西…環境就真的很少。環境運動要吸引年輕人是很困難的，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除了核四運動之外，其他都非常困難。「坦白說我們在處理每個議題啊，其實關切的都可能是整個國家發展的方向。」這顯示著阿山對於環境運動所涉及的「人在環境中」之處境的視野與關懷。

³ 2011 年 6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花東地區發展條例」，設置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總額 4 百億元，基金執行期程為 10 年。

⁴ 參註 1

⁵ 當時的「樂生院保留運動」。1994 年，在未告知樂生療養院院民的情況下，捷連新莊機廠選址於樂生療養院，在未妥善安排搬遷事宜前即強行拆遷，造成院民身體與心靈的創傷，引發社會大眾的關注與聲援，也是一連串以人權為訴求的運動開展。阿山當時也有現身在運動現場聲援，如今，他仍時刻關注議題的發展，並在社群網站中轉載活動、發表看法。

另一道力量則是他對於在這領域得著諸多機會與養分的覺察。在這部分，阿山所指的並非機會所成就的成功經驗，而是他所下的錯誤判斷與行動。「我自己以前會常做一些很錯誤的判斷，有時候做了反而對這個議題更不好，...使得對於環境...不見得更好...」阿山舉例說明，「蘇花高運動時的地方對立非常嚴重，我認為這當然一方面是...支持方一直在操弄對立——支持的才是花蓮人，不支持的都是外地人。「我對這個東西完全沒有警覺，所以就不斷地被操作：『沒有，我們也是在地人，我們也反對啊。』可是那個東西就變成很對立...」然而，錯誤的經驗對他來講不是接受自我的負面標籤，而是將它已轉化成未來行動的警醒，一點一滴地累積在阿山身上，變成滋養他權能感的養份。「那既然這個環境...犧牲了那麼多，某種程度因此讓我更有養分，那我是不是應該要花更多的心力來作環境運動。」

縱然退役後的工作單位都已敲定，薪資條件也已談妥，且所將從事的是自己一直以來的關懷——青少年工作，然而，因著這兩點的領悟讓他轉而決定繼續投身在以關注臺灣整體環境的倡議組織，作為他貢獻心力與所學的職涯管道。

對於持續投身於環境運動的內在動力，阿山表示，是那對於永續環境得以實現的期盼，而核心的關懷仍是那生活在其中的人類。「有很多的環境運動者的核心關懷可能是地球，可是我還是...在地球裡面的人，...我還是希望人可以生活在一個，人可以永續的生活，並且生活在一個可以共同發展的環境裡面。讓我們的未來發展...更合適人類在這個環境下永續生存。這地球沒有欠我們什麼...讓我們彼此共存。」

環境運動的社工角色：在文獻與對話中辨識與整合

從阿山的故事來看，運動現場提供他助人的實務養分，縱使在社工專業中無法辨識或被承認。因此他帶著養分覺得可以助人，而助人專業的社會工作也應該認同或納入。這也顯出社會工作專業本身既有的建構框架，有可以成為一種知識的霸權，在教育體制內培育出一個個符合主流類型的實務工作者，設限了學生的

專業發展性與實踐可能性。阿山這一路的實踐，有著高度的社工認同，然而，在面對社工角色的認識上，也曾面臨從教育體制而來的曲折。大一、大二的他，對於社工角色的認識，仍處在一個混淆待整合的階段，此時，他在環境運動的實踐也一直因著議題的不間斷出現而延續著。

進入社工系就讀後的他，在環境運動的參與，便多了與社工角色之價值理念的對話機會，然而，在社工教育現場，他卻始終找不到相對應的知識內容與討論，而產生疑問。「剛開始...其實是覺得它是與社工分割的，因為學校裡面教的就不是這個東西嘛！」不僅在專業本身，同時也與同儕之間形成很大的切割感與抽離感。「你在念書的過程當中，你會一直聽到，社工做的事是在協助弱勢的人嘛，或者是我們就是一個助人的專業者嘛，然後我就開始奇怪，為什麼這些同學們都不關心我關心的這些環境議題呢？」

他所感到的矛盾，在一次系上提供學生到國外發表文章的時機中，有了梳理的機會。那時老師建議他書寫的是自主籌組及參與志願服務工作的經驗，但當下他對知識探究的動力，莫過於在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間那未解的矛盾。文章書寫完成的同時，也是阿山將兩者梳理出關係之時。「以前是自己覺得應該是同一件事情，可是後來找到一些資料、書籍，或是一些說法，社工的倡導者、赋能者的角色，其實有太多是可以來做社會運動的...」當我更清楚地辨認社工有扮演這樣子的角色之時，我就非常地認同，到現在我就覺得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社工應該做的事情。」

阿山將大學以前，在志工服務、在環境運動所累積的經驗與觀念，藉由文獻的爬梳、與同儕及社區工作者的對談中去印證、整合，再理解，慢慢地辨識出來。

「剝削啊...階級啊的狀況，其實也不是真的念了社工系才有的這些想法...」在社工系的求學過程中，是將你本來想的東西...透過一些理論和實務去慢慢地接在一起。」他在社工角色的辨識歷程，同時也反映了他對於社工教育在各樣角色培育的輕重觀察。「一個人的長成，往往注重在個體的長成，可是對於結構性的東西，

多半都比較少提…社會政策，縱使課程有在談——譬如說老人啊，少年啊，身心障礙者的政策應該怎麼樣擬定，可以使得他們的社會情境慢慢地翻轉——可是…為什麼老人會成為社會的弱勢，為什麼會有低收、貧窮，其實不太談成因，只談怎麼處理。就是注重在個人，沒有在結構上面，其實我一直就覺得這是整個教育裡頭缺的重要的一環。」這也就是阿山之所以在社工領域找不到他在環境運動中所從事之角色樣板的原因之一。

社工的每一種角色，對阿山來講都有著不同的意義存在，而這些不同的意義都可以讓這個社會更好。「我覺得社工的角色不是只有一線的助人者，本來它的角色上面就有非常多可行的功能。就為什麼社會工作教育裡面還要教你社會政策、立法、組織管理，其實本來社工就不是只有一線的服務。」

對於，近年來臺灣社會工作朝向專業化的發展，他吐了一口氣地說：「…這專業化跟心理師有很大的脈絡⁶——心理師變這麼專業之後，我們要提升自己的專業化程度，希望可以在社會爭到一些角色。…走向專業化之後，在三大方法中，我們不重視社區，也沒有社區在裡面…」其實把自己的路走小了，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既然他們有人把路走得愈專業愈小…我就要當一個野生的人，把它撐大。我要告訴大家社工不是只有這個角色而已，也不應該只有這個角色…」阿山的批判性思維反映在社工價值與實務面向，他提到，「社工其實是可以協助這個社會更弭平貧富差距，或是階級，…而不只是救濟而已。」

投身環境運動的挑戰與關卡：隨著投身之生命階段而有所不同

在大學階段即投身環境運動的阿山，相對的，他的挑戰也來得很早，而且按著他的投入程度，及所處的生命發展階段而有所不同。

在大學的時候，雖然倡議的實務經驗相對於同期同學累積得多很多——「大概沒有什麼大學生從這麼年輕就開始不斷寫新聞稿，自己發採訪通知，開記者會，

⁶ 黃培潔（2014）的研究指出，社會工作專業化，是源於學術界對專業性必要的呼籲而推動，藉由「以納入國家體制以維護並確認社會工作的專業性」的方式建立起。

然後要組織串聯不同的人...」然而，最實際的關卡就是「沒有人共同關心」——「社工為什麼都不參加？同學為什麼都不擔心？」此外，也與他的學生身分、教育體制、以及所處的社會風氣有關。「這個事情同時...跟我當社工系學生的時候...是有些衝突的。那衝突來自於，...我一般都不會告訴人家說我在做社會運動，因為我其實是覺得社會運動是一個滿偏激或基進的東西。那時候若跟社工同學講起來，我都會說沒有，我就是做環境，而且關心環境，關心我家而已，就這麼簡單，我沒有要做運動。」

自高中以來，由媒體對社會運動所建構出的污名連結，讓他對於社會運動是界定在抗爭手法激烈、警民衝突劇烈的狀況；對於他所投身的反蘇花高運動，他的內在解讀是，「我沒有跟警察打架啊，我又沒有跟支持方真的...起過什麼衝突，有啊，口角可能有啊，可是覺得那個不夠激烈。...可是我那時候...開了一整年的記者會，沒有推過任何一次啊。最多就是被警察警告說你違法了，可是又覺得違法...違法又怎麼樣呢，就覺得也還好。」雖然原生家庭對社會運動的態度開放，然而在那相對保守與封閉的校園環境中，卻讓他感到與同儕間存在著無形的斷裂，這斷裂也顯在他所認同的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之間，而引發很深的挫折感與孤獨感。「那個時候滿多時候是滿挫折的。這挫折就來自於，我認為我在做蘇花高議題的時候，我是一個人；可是我回到社工系的時候，我就是當社工。就社工跟運動這件事情是沒有相關的。「我自己把它切割了，可是，後來就覺得它好像不是那麼應該被切割這樣子。」

當時由於阿山還同時擔任社工系學會會長，積極參與著系上的活動。因此參與環境運動的另一關卡是落入蠟燭兩頭燒的分身乏術景況——學會活動要辦，抗議活動要參與，兩邊角色的拿捏衝突，使得他的矛盾更深。2008年，在一次需要號召更多的人參與的運動決戰時刻，那一次讓他經驗到一封論述著社工應有價值的信件寄發，形成系上部分師長同儕，對他所參與的環境運動有所認同與支持，「我那時候曾經寫過一封好長好長的 e-mail 寄給全系的師生們...包含系辦助教

也還滿支持的，他說：『我給你 e-mail 名單，你自己寄，就寄給大一到大四，然後還有老師們，通通都寄，就說為什麼我覺得社工應該要來參與這個事情...』然後...其實自己是還滿敢的，那天我要考期中考，但，期中考是下午，早上就先去記者會，然後就站在上面講話，然後，我就看到...班上很多同學都來現場這樣子，明明大家有課，可是大家都出現在那個地方，我其實是很感動的。」背後更為關鍵的是助教給他的建議，以及接受建議並採取行動的阿山，因此成就了一場的喚醒與覺醒的歷程。

當時阿山所寫的信件論述內容，已顯示出他對於所參與環境運動與社會工作的扣連，「人就生活在環境裡面嘛，這些所謂的環境破壞，它所帶來的後面發展模式，多半都是更強化階級間的剝削。所以，我就是把這些告訴我的社工系的同學，我說，如果你一整天助人，我們不可能永遠待在後面，你低過了貧窮線之後，我們才開始補助你、幫助你；那你明明就看到了接下來的那個發展模式，就是使得愈來愈多的人往線裡面掉，那你為什麼不做一些努力和調整呢？」雖然這些對於社會結構的評估視野，並非當時的社工教育所建立，而是高中所投身的環運倡議團體，然而，卻是以社工的價值與目的去梳理事件與社工的連結性。「這件事情就讓我覺得說，其實社工跟環境運動這件東西，跟社會運動這些東西是應該有結合在一起，不應該是這麼地抽離啊。」

進入到專職人力之後，阿山所面臨的挑戰雖有所不同，但對於沒有更多人共同關心，仍是他一直以來所面對的集體焦慮感。

在環境倡議組織工作的 4 年多來，從員工成為主任，如今要改變一個環境政策的運作、技巧、方式與能力，他都因著經驗與能力的累積而有著一定的把握。他侃侃而談地說，「我們目前的政府政策是菁英決定...透過立法院裡面的遊說、透過跟政府部門的溝通、然後修改政策或法令，然後想辦法利用一些立法的技巧讓它通過。...我們就訓練自己跟哪一些助理熟，跟哪一些行政體系熟，然後知道立法院哪個時間點比較空隙，媒體不會注意，所以也要跟媒體熟...」因此，對阿

山而言，挑戰不在於各類汙染、發展、山林、水文類的專業知識的理解，也不在專業遊說的工作的實質內容或成敗。「以前會覺得說...打不贏財團是一種挑戰，後來發現，一個案子有沒有通過啊，坦白說，我們用十分力氣也沒有辦法決定它過或不過...我們有的是知識，有的是喚起你的良心，可是對手有的是權力跟金錢...」他接著說：「當民意成為一個方向的時候...那個東西比任何的專家遊說都有用，因為你政府根本不敢違背，因為政府就是一個選票的機器，它是被選票選出來的...」但阿山表示：「很多時候只有民粹是很可怕的，可是你...又知道在社會運動沒有一點民粹的話那真的會一事無成，而且沒有辦法跟這個社會溝通...」所以他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你如何不民粹地完成一件事情。「怎麼讓更多的人關心，是我覺得目前最具體的挑戰。」

因此，阿山想要更多跟社會對話與溝通，喚醒大眾對環境議題的關心，以及環境保護的重視。當他意識到自己在原有工作條件下再找不到時間去做這件事，加上在組織網站中可以作為大眾教育管道的專欄文章，愈來愈少人閱讀時，他選擇轉換跑道。雖然離開了工作崗位，現在的他也扮演著顧問的角色，不時會接到電話的諮詢。

環境「道」路的社工實踐：以「共同結構」視野，放大公共利益空間

離開環境倡議組織，對阿山而言，不是挑戰不成的無路口走，而是另一種環境運動的實踐之路。「我還是想要促進大家對環境的關心，所以我會想要換一個方法來做做看。所以我轉到青少年工作的機構，...想辦法...讓沒有感的人有感，這個一直是我在環保團體想要做，但是我卻做不到的。」我現在的處理方式就是，好，那我來換一個工作看看，...如果我有辦法跟一堆我們認為的小屁孩——高中生這個年紀，自己以為很了不起的這個時候——有辦法跟他們溝通環境很重要的話，那我可能可以跟這個社會溝通的機會就更高一些些。這是我認為目前，真的是長期以來，很大的挑戰啊。」

青少年工作原本就是阿山的興趣領域，對於該領域的轉換決定與著手，經過他在各方面的評估——這族群所擁有的資源相對較少，同時青少年階段所處的正是思想建立的過程，加上，自身不嚴肅的個性讓他可以很自然地跟青少年相處，而他也享受在平等關係的互動；涵蓋對自身特質、青少年在生命發展階段的任務、在本土社工的實務現況，以及社會整體環境意識的全面評估。他進一步提到，「在高中之前的教育是封閉的，所以學校給你什麼樣的價值，你基本上是吃下去的。那尤其是這種環境啊、永續啊，這種一聽就不會錯的價值是吃下去的，可是這個價值在碰到進大學之後，...你開始跟真實社會接觸——透過打工或是一些機會，你會開始...沒有這麼樣的確定了。然後到了工作，出社會之後，因為我們畢竟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環境，在高度商業競爭的環境，所以，講求私利這件事情勝於公共利益。」但環境保護運動是一種公共利益大於私利的價值認同與實踐，因此在推動上必然有他無可避免的挑戰。

從事環境運動有十年之久的阿山，跟不同時期的同學們，及同齡朋友互動的過程，也有了縱貫性研究般的發現。「出社會後的關心，跟出社會前的關心，其實背後本質不太一樣。出社會後的關心，你已經進入了那個勞動市場...我為了自己的生活將來要更好，所以我選擇參與公共議題。但在大學前，尤其高中...你根本還沒想到以後的工作長甚麼樣子，就是覺得這是對的價值，我們就應該去捍衛。「...你看這幾年都是學生、年輕人出來，而不是已經工作的人出來。那當然，...年輕的工作者還是會出來，可是他們某種程度還是背負這個時代集體的低薪、高勞動，那個還是自己的基本權被剝削，所以我選擇要站出來，用這樣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基本權。」

他進一步提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個真實小故事，「我的同學們有時候就會開玩笑，叫我不要再擋蘇花高的興建了。以前我們當然沒有車子，根本不會開車，坐火車就很方便了，那你也不懂得開車可能有這麼大的便利性...」進入社會之後，

開始有了自己的私有財，有了私有財產之後，你會想要使得自己的生活更便利一些些。」

在環境「道」路的社工實踐上，若作為教育者，那麼不能再只是侷限在有著政治正確性的環保基本概念的傳遞，阿山認為，要更開展對於共同結構性與社會性問題的分析眼光——「環境問題本身它影響的是整個結構...污染使人生病，生病進入另外一個貧窮的系統。其實病是一個很大的貧窮系統來源啊。一有一、兩個人生病之後，家裏面花多少的資源進去，一種是疏離切割，另一種是大家資源進來，然後集體的貧窮。」「...今天不處理結構...貧窮怎麼救也救不完啊！」同時，也要在無法避免追求私利的事務上，能夠放大公共利益的空間——「你做資源回收不是只是省垃圾袋的費用，而是想到整個環境的時候，其實你做的時候會比較心甘情願。你不會說，啊，好啦，我今天不要省那麼多錢，我來丟一點垃圾好了，當然是回到本質上，我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個人意義與展望：跟現有環境能夠和諧相處到永遠

「我一直覺得環境運動對我個人的意義是，怎麼樣讓我...生活在更好的環境裡面...」阿山的「結構」觀點告訴他，環境是共同惡化的，「那個氣溫熱起來是真的都熱得，我不可能一整天待在冷氣房裡面啊。對吧，我很有錢我也不可能一整天待在冷氣房裡面啊。」

之所以能夠投身環境運動有十年之久，他說到，自己也沒有偉大純粹視「利他」為動機，「其實那還是一個非常利己的過程。」他進一步解釋，「雖然很多時候我們在做 NGO 就在利他，我其實就希望我生活的環境可以不要那麼髒，不要那麼臭，不要生病，我希望我掛的時候不要因為病而死掉，不要因為這些災難而死掉。...我希望我自己的下一代，也可以繼續生活在跟我一樣的美景。...雖然我眼中的美景，不見得比以前的美，可是我也希望...至少我現在有的東西是仍存在的。」

「跟現有的環境能夠和諧相處到永遠」是阿山的期待，「雖然『永續』這個詞被用爛了，可是我自己覺得其實我要的，也就是人可以永永遠遠地生活在這個情境裡面…」雖然他的口裡接著補述：「永遠真的是一件太浪漫的詞了。永遠是一個沒有辦法形容的一件事情。」但阿山仍是把它說了出來…



第四節 陽光般生機勃勃的實踐身影——陽子的故事

「作為一個媽媽，
你當然希望你的孩子可以看到更多的物種，
看到更多的動物、看到更多世界上的多樣性…」
(by 陽子)

一、寫在故事開始之前

我僅是她錯身而過的同事訪客，但卻一口答應接受我的訪談邀請——那乾脆爽快的語調，透著對投入環境運動的高度價值認同。她是陽子，實務工作已近十年，有著洗練般地自信、冷靜、明快的樣態與節奏。她是唯一一位在國外研究所進修的訪談對象，訪談過程中，她的敘說總帶著她特有的「分析性」回應——一種經過反思、咀嚼過的產出。

在生態的物質／種中，陽子用以比擬為社工角色的是「介質」¹，「兩個物種交界或是兩個界、兩個層交界，好像什麼東西都進的出來，也透的過去…」陽子的敘說中也總看見不同界的穿梭與跨越，從臺灣到美國的國界轉換；為了瞭解醫療社福體系，而選擇進入未曾接觸的醫院實習，經歷跨興趣領域的學習；從人到環境的關注跨越；實務現場跨入到運動現場；在專業關係與運動組織內的跨世代溝通；在社工領域進行教育工作的跨角色運用等，這些跨越似乎也成就了陽子口中對於社工角色的介質描述。同時也發現，無論是實務現場或運動場域，她扮演了很好的「介質」角色——在運動組織間的成員溝通、向大眾所作的議題溝通、

¹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介質」指的是「物理量或某些物理現象發生時，作為媒介的物質或空間。如聲波、光波可以藉由空氣傳播，空氣便是聲波、光波的介質。」（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與青少年的跨世代溝通、針對教育體制的跨專業溝通；這溝通的能力正是被陽子列在社會工作者所該具備有的能耐（專業能力）。

訪談後，她在我腦海中所刻畫出的社工實踐身影卻有如冬日下的陽光——光線穿越尚未消融的冰層（環境意識未開），顯露出輕透的清晰度，蓄積著融解的熱能；無論是否有介質的存在，陽光都能夠傳遞。在職場、在運動現場，她的存在如同光線一樣，在本質上希望能去「使看見」、「使回應」對整體生態環境的愛護。如同自然界的陽光，是所處當下大部分物種得以「看見」的充分與必要條件，更蘊含動能或作為動能的轉換。

二、生命故事敘說文本

大二到大四期間，陽子的課後之餘有著她主動的社會參與。在臺北的選舉場子——不分政黨的都會有她流竄的身影，為了知道現場的狀況，選舉人的政見與口號，各邊支持群眾的想法。這讓在外省家庭長大的她，在臺語能力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因為好奇、因為興趣的驅動...

社工這條路：青少年族群是始終如一的關切

1996 年進入社工組²就讀，也是因著興趣。陽子笑笑地表示，因為自己太喜歡青少年族群，「如果他們就像是我那些成績不好或是家裡貧窮的同學們一樣可愛，因此可以一直在一起，很好啊！」在選填志願時，她就填了各所學校的社工系（組）。

這股喜歡，源於在她求學過程中，對於學校體制規範中非典型同儕的正向交往經驗。「跟班上不同族群或是不同成績好壞的同學相處，我覺得非常、非常愉快，反而是從成績不好，可能高中畢業後就要去上班的一些同學身上得到很多的感動。」進入社工系就讀之後的實習單位的選擇，也是青少年相關的機構，綜觀

² 隸屬於社會學系。

陽子的工作生涯，按著她所選擇族群的投入精神與時間，如她所定義的，她就是一名青少年社會工作者。

因此，當時的實習單位選擇，是以可以接觸不同型態的青少年議題作為考量，於是，她選擇了不同類型的單位。第一次實習是在私部門，學習作外展，以及社區型青少年工作，也正巧參與了臺灣第一個替代教育課程——「中輟替代教育」計畫；第二次則是公部門——少年觀護所的實習。原本以為會朝行為矯治或極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工作，但在公部門的實習經歷卻改寫了她對於未來青少年工作的想像。

「在監所的少觀實習，我覺得對我在社會工作的影響是一輩子。你在監所裡看到的，就是很一般的青少年啊、一般的男生啊，或是一般的小女生，他們基本上關心的事情離我沒有太遠，因為就差了 3、4 歲而已，可是，我記得那時候整班都是重刑犯…」當時的她，眼睛看見的不是「矯治標籤」，而是「一群普通人」；這視角的背後有著對體制的覺察與反思。「你很難用個人的狀態、個人的行為去判斷個人，因為撇開那些坎坷的、複雜的、無法掌控的因素，每一個人其實那個存在是很單純的，那個年紀有那樣子的想法、那樣子的認同、那樣子的生命階段的困境…」帶著溫暖的同理理解、制度面的清晰視角，「那是一個很大的提醒，就是『制度』這件事情的存在，就是你真的在這些場域裡頭意識到這些年青人是受害者…即便走到歪曲的人生，即便走到坎坷的、很偏差的行為。」在念社工時，有一個很大的決定就是，我要花比較大的力氣更從制度面去觀看社會工作的處理，更脫離那種個人的、諮商的、輔導的脈絡，盡可能地去從比較寬闊的議題理解人的工作，尋找工作的方法。」

進入職場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務學習的方案，當時也正值學校社工的開始，陽子意識到青少年工作與教育體系的連結薄弱，「被學校丟出去的中輟生，不是在教育體制中工作，而是在處理一些體制外的狀況，努力地想要接軌，可是那整個工作方法其實是很很脫離體制的。」臺灣大部分私立高職，基本上對於教育這件

事情沒有熱情，基本上是一個很商業操作的的狀態，然後學生的權益、學生的學習，那擺在非常、非常的後面。」「體制」的缺失仍然是陽子的看見。

雖然喜歡實務現場的工作，然而她也希望裝備具研究基礎的宏觀想像，休息一年後，2003 年陽子啟程前往美國進修。當時的實習也是從事一項服務學習的計畫，此外，為了讓自己更清楚社工在社會福利系統中的實質工作內涵，另一個單位特意選擇了醫務社工的工作。「自己在美國的時候會收回一些以前在臺灣要跟公部門打交道的抱怨。」陽子笑笑地說。「有時候會覺得行政系統裏要能夠落實人的權益這件事情其實是很辛苦的，除了制度之外，其實很仰賴你(福利體系)對這些投身在與人有關的工作者身上，花多大力氣去做價值的建構，或是熱情的養成。」

除了對於結構的更深刻體會，在兩年的美國學習過程中，歧視、階層、失語、刻板印象、辛苦、無助、無力、反省、挫折、承認、同理的能力等，無論是名詞或是感受詞，這都是她在美國求學時切身相關的詞彙，每一詞彙背後都有著一則深刻的故事，以及因著故事而有的反省與覺察。這些故事——沒有表象的成功痕跡，卻有著生命成長與擴張的真實，是在實務與人生的養分。

陽子的反省中提到，她的人生相對於所服務的對象是順遂的，生於中產階級的家庭，家庭狀況也良好，然而，因著出國進修所經歷的跨文化斷裂與實務衝擊，才讓她「看懂」自身與服務對象在生長背景與所處環境結構的「差異」，也才進一步有了深刻「反省」，以及「承認」的機會——「你就是比你的個案條件好很多，你就是不會懂的，你不可能懂，你不懂這些挫折，你必須對這些東西有一個承認，你幫不了什麼忙，你就是盡力而為。對，那些苦難都不是你可以懂得，不要講你可以懂，就是這一個承認...」這是陽子與出國前的她有著最大的不同與改變。

2010 年回到臺灣的陽子，對於臺灣青少年工作的停滯不前是感到震驚與失望的，而對於青少年族群所處的「無聲」狀態，也感到非常的不滿。她提到，當

時對於偏差行青少年的介入，仍是以行為矯正或問題修復取向為主，欠缺充權觀點的運用，「不會讓他們自己講話，讓他們自己講話的同時通常是在販賣一些同情——他們需要自我介紹說我被家暴、受害，我需要募款；然後我可能曾經是中輟生啊，我現在改邪歸正。現身都是為符合一個很特定的目的，其實在重複一個刻板印象，那，我是非常非常不滿的。」無論是社工實務或社會現況，青少年聲音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都未被接納。她感嘆地說，臺灣整體就是一個集體無聲的社會，對青少年族群充滿標籤，因此在這背景脈絡下，她回臺的第一份工作便在機構中承擔起「青少年發聲」計畫——創造主體性論述的平台，形成更有意義的對話與討論。「可是因為這樣的作法，...我不被社工領域的人認為是社工領域的，我們的機構也不被社工機構、社工系當成是社會工作機構，即便我是做青少年充權方案，那他覺得你們就是辦活動嘛，你們就是做課程，可是我的課程可能都跟議題有關係...大家會覺得你比較像教育，而不像社工...」因此，青少年社會福利相關的討論，不會被邀請加入；社會工作相關的資訊流通是被排除的。這是陽子與所屬機構所面臨的實務處境，不被專業體制認同，「沒有人會來找我對話，教育圈不會來找我對話，社工圈也不會來找我對話...」

另一方面，陽子在這背景脈絡下也投入了環境運動——另一個不被專業體制認同的領域，「我們三個（反核夥伴）有幾次都在開玩笑說：『ㄟ，我們都不被認為是在做社工，我們三個就會常常互相調侃這件事情。』」但她仍帶著社工認同在實踐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理念，「我一直在做很社工的事情，我每天就是跟不同的人不停地工作，然後找到一個共同的目標，訂出一個共同工作的方法，幾乎這個原則是沒有在改變的。」

環境運動的現身：對大環境的體認與覺察、對永續環境的價值選擇

陽子在大學所接受的社工教育是隸屬在社會系，因此，對於當時運動議題都不陌生，但之所以現身乃純屬她個人的興趣與好奇，而非社工學生的身分使然。

「這就是學社會學的某一種怪嘛，就是你很想要，在任何有非常多人的狀態底下

都要觀察是什麼樣的狀態...他們關心什麼、在意什麼...我覺得那是一種興趣吧。」

陽子笑笑地說道。

在參與程度上，遊行、閱讀相關文章，或鎖定特定網站的閱覽，她的言談中，顯露著對特定運動的有限參與，而有著生不逢時的感慨；然而，卻也實質地展現出她當時已存有的政治參與與社會能動性。「我們那個時候沒有 FB、沒有同溫層這種概念，你的生活找不到任何機會接觸...「找不到（進一步投身參與）的身分、委身加入的機會，所以你就是遊行，走一走；以前也沒有轉文章這種事情，所以就自己聽一聽，然後關心。」在環境意識的覺察基本上仍是靠自己，「我是念社會工作的人，這些事情在我的成長經驗裏頭都沒有接觸，都沒有老師要我們去接觸，沒有老師跟我們談論這些事情...」因此，環境運動的隱身在這背景脈絡下似乎成了理所當然。

在美國進修的五年，臺灣曾發生幾起重大的環境運動議題，對身處在遙遠國度的陽子有如土地的吶喊。「蘇花高、蘇花改...，比較大的這些運動議題發生時，我其實是不在臺灣。我記得那時在美國偶爾看到這樣的新聞，心裡頭的難受就是，你幫不上忙，你覺得你自己離得好遠...「就一直哭一直哭，你就會覺得完蛋了，這就是一去不復返了，怎麼辦...「你會不斷地想自己什麼時候幫得上忙，這某種程度是決定回來的原因...」因著對臺灣的認同、對土地的連結，她毅然決然地做了回國的決定。當時的她相信自己有機會成為改變的力量，因此決心返台，她所放棄的是一種相對較好的生活條件，同時她也冒著不被男友諒解，可能須結束一段穩定交往關係的風險。「我當時心一狠，我那時候就是要搬回來，我不管你，你不搬回來我們就分手了...我覺得我離家很遠...」結果，男友決定與她一同搬回了臺灣。回臺後對她而言，其實是一連串的苦——教育圈的撼動不易、投身運動圈的門檻很高，「你覺得你要回來貢獻跟幫忙，那個距離非常、非常遠，我覺得是有很大的焦慮的...你斷了整個家、自己可以過得比較美好或比較單純、簡單的可能，回來你每天就在 worry...然後我先生上班...那個現實條件在他那個

business 的 area 是非常差的。然後小孩子的教育環境...我每天在跟學校打交道，我先生都會說你總要確保你的小孩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教育狀態...你就會發現你的人生跟這些東西脫不了關係。這個國家的好壞、這個世界的好壞，其實很難跟你的人生脫離關係。」她的承擔裡，不僅是看見大環境改變的困境，更有困境下對家人的在乎與心疼。然而，她為自己土地的焦慮、熱心與不放棄，是讓她能夠承接住每一次造成改變的可能機會。

環境意識的覺察與土地情感的生發，增強了陽子對於環境運動的行動力——只要能夠前往，就要現身參與。「我覺得環境運動對我來講其實就是一個『選擇』，我選擇的是一個永續的環境，然後在這個永續的環境裏頭找解決之道。「我是相信我們是有機會成為改變的力量…」回臺後所現身的第一場運動，便是反核運動。對當時的陽子而言，無論是實務工作的選擇，或環境運動的參與，關鍵都在於對「大環境」影響的覺知，也就是鉅視面對整體社會和服務對象的影響。「我覺得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辦法制度化，或是對環境有感知，而還在做個人歸因，這個社會是很難前進的。」在她連續兩年的投身任務之一，是必須站上凱達格蘭大道的發聲舞台，其中一次還是為其中一位夥伴作遊行訴求的翻譯——不是跨語言的翻譯，而是跨專業的翻譯，讓嚴肅的論述可以更加地淺顯易懂；甚至在她所謂「惡搞」³，其實是充滿創意的活動產出後，也確實達到了對社會大眾宣傳的效果。唯有效果達到了，知識才有進一步傳開的機會，在這機會下大眾才可能覺察、反思與行動。

投身環境運動的助力與關卡：與機構立場的一致加深對運動的投入

以機構立場投入環境運動，是陽子口中的「幸運」。前一年即踏進反核現場的她認為，以所屬機構的企業背景是很難直接有身分進場，因此陽子總是在職場本分中，自己能力所及之處，去藉由教育使得青少年對環境意識有所覺察。「我一天到晚試圖想要帶年青人討論，然而在 311 學運之後，反核到了一個高點...機

³ 意旨過於天馬行空的發想。

構老闆也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然後就走進公司說：『ㄟ，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我們要不要一起參與？』那我們當然就很好啊。」陽子在敘說這段經驗時，顯露著興奮和滿足之情。機構主事者的決策，使得從個人立場「參與」運動的她，終於如願地「投身」其中，而這也是其他同仁所認同的決策，因此機構整體動員的程度極高。

但機構的投身在起初面臨許多的考驗，陽子表示她低估了影響力，說到這一段經歷，她仍是伴隨著笑聲地表述著。「那三個月裏頭，我們就是每天都在危機處理，無止境的媒體的關切，無止境的官員關切...你的工作幾乎就是停擺...」我覺得那確實逼迫著我們要練習很快速地搞清楚我們自己的處境、定位與認同，就是大家是不是都對這件事情有一致的態度、一致的想像，大家是不是決定能夠繼續拚下去，然後我們要站在什麼位置...」無論是機構的企業背景所背負之包袱，所引發各界對此舉有關的利益揣測；或是既有運動圈對機構認識不足而導致的接納度不足。此外，陽子也需代表機構去向運動圈的組織平台溝通機構的獨立性立場，及投入的真誠態度，而非有著外界猜疑的利益算計。「我覺得人跟人的工作其實就是一個時間的累積，然後溝通，我覺得這東西就是很社工的。...人的工作就是沒有捷徑，大家就是能不斷地溝通、不斷地溝通、不斷地溝通...」

另一方面，機構決策也對所隸屬的企業帶來牽動與影響，雖然機構另設立協會作為對外參與的身分，雖然切割有其意義——非商業行為，而是價值行動，然而當時的立即效果卻似乎不大，「我們還要給客服一個 Q&A，就是因為他們就會接到比如說擁核者...打電話給客服要求解約。」這對陽子及機構主事者來講，卻都被認定為次要的，他們堅持一貫的目標——是否能夠真的幫忙到這個運動。

「那兩次遊行，我們真的就是很衝，你看我是可以上台主持的...」當要以企業背景的機構員工身分在檯面上現身時，機構主事者仍是一副有無不可狀。陽子表示，事後證明，對企業也未造成負向的影響，反而正向加強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印象。

一直以來著重在以青少年發聲為目標的工作，讓他們也能勝任運動圈所委以的媒體組工作，作好與大眾的對話角色。也正如陽子所看重的，在這些對話的背後是作大眾教育的價值建立與情感召喚。「這三個月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然後也練習...在光環下的參與，然後建立關係。「我覺得這也是以前在社工永遠不可能想像到的事情。」這是陽子為自己，也是為機構，在這段經歷所下的註解。她與機構對反核運動的認同，讓所經驗到的困難都可以解讀為挑戰，同時也轉化為學習的觀點。對企業而言，也展示了，一些政治性社會議題的參與可能性。對於運動圈而言，不同背景、專長和定位的組織進場合作，便會帶來加乘效果的成果與可能性。

除此之外，在為價值奮鬥的一路過程，陽子也為著認識了同是社工背景，卻在環境運動的道路上志同道合、無話不談、彼此信任，及互相支持的兩位夥伴而感到開心不已，所涉及的言談中不時洋溢著她的雀躍。「我會常常跟他們講說，我現在的定位就是你們的後盾…」這「同溫層」的建立，蘊含著參與環境運動的動力催化。

運動後的社工角色建構：如橋樑般的教育者、促進者與運動者

在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尚未分家的那個年代，陽子所受的訓練，讓她對於運動者與社會工作者的認定，並非切割為不同專業領域的兩個角色，反而是一體兩面。「社工其實就是在連結人跟人，連結人跟資源，連結人跟團體，如果你是一個好的社會工作者，基本上這些能力你會很嫻熟，然後很自然地適合作為一個運動者。」在這段運動經驗扮演著橋樑角色的陽子提到，「社會工作所有專業的訓練，就是在成為很多事情的橋樑。有個案的能力，理論上溝通應該要好的，傳遞訊息應該是要好的；有團體的能力，合作裏頭該有的動力有一些敏感度的，並找到一些建立關係的可能性，那社區更不要講...」

作為青少年實務工作者的陽子，每天就是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組織、不同事件、不同作法中溝通，使事情朝往所認定的明確方向。「你要讓孩子思考

土地議題，要怎麼樣讓孩子有感，比如說我把孩子帶到現場，你並不是邀請一個做議題的人進來講話他就會有用，他不會有用的，因為門檻高嘛，他們講話真的很難...那你能夠因為知道青少年的特質，你要運用工作的方法或設計，讓議題跟孩子的經驗變成一個很自然的融合，這就是我們的位置。」轉換到環境運動現場的運動者，「就是把這一組人併到這一組人。比如說我們去找有趣的創意人，然後跟他們講平台這邊的困境，我們宣傳上的一些東西、一些觀察，然後在同個案子工作。然後，這可能跟過去運動這邊會操作的媒體方式是很不一樣的，那我就再去跟他們（平台）解釋，為什麼他們會做這決定，他們不是膚淺，而是覺得這樣子的東西怎麼有效。」

「這是作為社工員或是從社工訓練背景出身的一個能耐。」陽子不僅肯定，也欣賞著社會工作學門的養成，「我自己還滿喜歡社工的這個能耐...」這是專業教育所給她的養分，但卻是在離開大學校門後才逐步領略到，因此這也是她對於社工教育的期待。

環境「道」路的社工實踐：沒有捷徑的「教育」扎根

「未來參與的方式，希望可以透過教育方案作為運動進場的一個工作典範。」由於目前反核平台所進行的專業論述非陽子的擅長與分工，因此暫時從檯面組織退下，但她認為，每一個領域的運動都要面對教育，教育也是一項基本功。因為倡議就是會有瓶頸，而大部分環境運動也往往是群眾參與不足的局面，運動也不應該藉由犧牲所帶下的危機感來達到參與的高潮、機會的高峰或訴求的達陣。因此，陽子的實踐也繼續扣連回她的實務，藉由教育的扎根，作為環境運動的延續。「我喜歡青少年，那我就從青少年做起...四、五十歲的人，你要改變他的價值觀，或是他的思路是很花力氣的，但是孩子不一樣啊，他還有很多的可能，你能不能愈早打開他的想像力，愈給他多樣的刺激、對人的體諒、對別人與土地的關懷，我覺得這是比較有機會的。」大環境的改變，到底哪些事情跟他們是有關

係的，某種程度也在影響他的未來，他應該要所知覺的，其實就會去對這些事情有更敏感的。」

陽子針對青少年所寫的教育方案，首要是作「價值的建立」，再作「議題的認識」，以免流於運動常被污名的「暴民」路徑；而在價值的建立上，又以建構「感受」為首要目標。因此，在討論原住民部落有關文化流失、土地流失，和原漢相處等議題前，她先帶孩子實地走訪部落。「帶孩子去議題現場，跟他們一起生活，而且去還不談議題，其實就一直生活，生活到一個時間點，就開始去跟那些當地的人聊，然後讓孩子看到那些生命、看到那些參與抗爭的經驗、看到那些挫折、看到那些真實的狀態，我覺得對孩子，對於一個人，就會變得很鮮明。「所謂犧牲的體系，當孩子能夠知道，每一件事情有人被犧牲，而那個被犧牲的狀態是活生生的，就是我可以理解他的痛苦，我可以試圖去做一些情感的串聯，這個東西才會真的存在，它才不只是一個知識...」

無論是所投身的青少年工作，或是環境運動，現今都還是站在偏向教育的位置。以她的觀察，臺灣整體的教育養成都欠缺核心價值的建構。「我們在成長過程裏的那個空白、那個無感、那個對於世界沒有想像力，甚至對於自己的生命沒有想像力，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以至於要做環境，你也會很吃力...要做社會工作處遇也會非常吃力，因為，人跟土地、跟社會、跟人與人之間，都沒有核心價值被建構起來，很多東西都會是意氣用事...」對陽子來講，欠缺核心價值，往往缺乏行動的界線和底線。過去的專制時代讓她經驗到，教育總是在以服務特定政治為目的，人民往往是處在規訓無聲的狀態。然而，在缺乏核心價值的前提下，教育面對最大的挑戰也在於運動在臺灣歷史脈絡的過去，無論是校方、老師，還是家長，容易將這類型方案歸類為政治性，加上升學主義影響，因此若沒有在議題上以創意方式跨界包裝，是不容易進入校園的。「我們每天都很像在變魔術，就是把這個東西怎麼樣埋伏，不僅是只是為了招生上的一便，我覺得同時也是讓大家在一個比較沒有刻板印象的狀態進場，是一個比較好的學習。」

在本土社會工作實務的看法上，接受美國研究所訓練後有了「比較性」覺察的陽子表示，狀況並未有太大進步，這與保守的社工養成教育有非常大的關係。

「沒有太多討論議題的時間，沒有太多社會參與的時間，不會把它當成一個你必然該有的學習...」我覺得社工在各種議題現場的缺席是足足證明了臺灣社會工作教育養成的失敗，因為我覺得那就是沒有建立該學門基本的態度跟價值。」在工作中接觸的許多社工實習生告訴她，「很多社工老師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很政治的，最好不用去碰...」因此，陽子在這些實習學生中也扮演著環境意識與運動啟發的促發者，解釋著社會工作與社會運動的關聯，「我們社工應該在學習過程中，每一場社會運動能夠去都要去，因為那裏頭就是一個犧牲的體系。每一個運動都是在產生一個犧牲的體系，有可能這個政策沒有那麼差，他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他就是有人被犧牲，那被犧牲的狀態是什麼，那大部分被犧牲的人就會是你個案的組成——那些沒有聲音的、那些貧窮的，他基本上就會是你未來服務對象很類似的處境，你怎麼會覺得運動跟你無關。」

回臺灣之後，希望做一些基本功，又交雜著一點革命感，但又是很溫和的工作，陽子似乎找到她所站的位置——教育工作。「離開再回來，其實會把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而且很刻骨銘心，然後你會相信，沒有捷徑，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體會，就是沒有捷徑。」

個人意義與展望：生態與人類的共好

「共好」是她的期待，「不大可能把所有東西殺光，你人可以過得好，我們也沒有偉大到要照顧所有的生物，而是當他們存在的時候我們確實得過的、會過得好一點...」

在訪談尾聲，她也初次提到自己是兩歲孩子的母親身分，在她延續環境議題的敘說中，有著她不放棄的行動她提到，「作為一個媽媽你當然希望你的孩子可以看到更多的物種，看到更多的動物、看到更多世界上的多樣性...」我的寶寶，他現在就非常清楚知道，我們再也不會去海洋公園，因為，海豚不是住在房子裡，

我們下次要去看海豚就要去、坐船去到大海、去牠家...他很小就會一直覆述這件事情...「只要一看到海，他就很高興地說：『你看，那才是海豚的家。』」他 2 歲就隨時會講：『你不關燈，北極熊會哭喔。』」藉由孩子所發出的兒語，可以輕易理解到陽子對生態保護的高度意識。在那曾經海洋公園的遊歷所為她遺留下的疼痛，她幽幽地解釋著，「你沒有辦法避免所有你不滿意的狀態安排，因為你的朋友不見得有這個意識，但至少把握每一次的機會教育，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當媽媽最基本的作法。」



第五章 共構另一種「可能」——花子的出現

「解放，不是一種恩賜，也不是自我的成就，

而是一種共同相互的過程。」¹

（Freire，方永泉譯，2013）

穿梭在 4 位研究參與者（本文中以「敘說者」作為統稱）的故事之後，是納入文獻後的交會與對話。這段交會過程，認識了敘說者的背景與經歷後（可參考附錄九：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我這位隨行的研究者，也勢必要簡易交代我的社會文化脈絡與養成背景。

1970 年代出生的我，於 2012 年從非本科系轉換到社工所就讀，不斷地裝備著社工教育中的主流論述與實務走向，直到讓「公民」很忙的 2014 年，身為社工所學生的我在社會共同經驗的體制壓迫中召喚出「改革」的意識，也開始現身在「反核」運動現場。如今，我以論文方式走在這這一條環境「道」路，藉由聆聽、閱讀、分析後所浮現的敘說者身影，形成了社會工作者在實踐路上的另一種「可能」的身影，本章中，將會以「花子」²為命名，那是「我們」所共構的另一位蘊涵著「可能」的敘說者，她在文中的回應，不僅是針對我，也是針對未來的社會工作——無論是教育、實務或實務工作者作可能的實踐描繪。

第一節 故事開始：循著人生路建構實踐路

在參與環境運動的之前，每一主體都有一段啟蒙的故事——那是與土地的連結，也是家庭教育的養成，藉著敘說建構著實踐的意義、方向與目的。此外，教育體制內的關鍵人事物，也能夠成為環境運動參與的關鍵推手。這是在訪談前，

¹ 摘錄自《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之目錄頁。

² 命名為「花子」，象徵另一種形式的開花結果。

毫無料想到的故事情節，因那是我的生命經驗中不曾有過的蹤跡，因此這段實踐養分的認識——環境價值建立的起點，讓我有著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喜感！

一、對土地的情感是「環境意識」孕育的土壤

在每一位敘說者身上，都有一段與土地親近的記憶。無論是發生在家鄉土地，或山林野外；是享受著風光明媚，或震驚著環境的被宰制；是愉悅，或扎心，都播下深刻的情感記憶與土地認同，不一卻也相似地形塑著他們對於環境議題關注的啟蒙意義。Rolston 指出，人類的價值判斷是不停與包圍的環境交流互動下所進行（王瑞香譯，1996）。曾經用心靈在踏過的那片土地、看過的那道風景，如同一片肥沃的土壤，能夠適時地成為價值意識的滋養與慰藉；所扎下的根，便形成成長後對家鄉土地的羈絆。這一來一往間的土地情感，因而造就出環境意識的基底土壤。

然，他們在成長經驗中的土地連結，大部分都脫離不了家庭的養成。因此，孩童時期的環境意識的啟蒙關鍵，在於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是否成為孩童接近大自然的管道。

二、成為他人的重要網絡關鍵人

除了家庭以外，學校是兒童與青少年的主要學習場域，影響著個體在人格的發展，以及世界觀的建立。Erikson 指出，每一生活階段的每一個個體都會形成一個不斷擴展的主要關係網絡，在發展中扮演了形塑的關鍵，影響著在社會領域的參與（張宏哲等譯，2014）。對土地的情感生發、環境意識的生根，除了與所生長家庭的文化和價值觀養成有關，也與「學校教育內之重要網絡」的關鍵人有關。

網絡中的關鍵人如同守門員般，本身對環境意識的覺察與環境運動的參與，不僅影響著學生取得對外資源的可能性連結，也再再影響著資源連結管道的取向。同時，校方（握有行政或教務主導權一方）也是守門員之一，無論是校風整

體的開放或封閉，多元或單一，威權或自主，也會對學生在公共性事務的關心，以及學生性事務的參與造成影響。反觀，教育者若能充分授權的前提下，將能建立出學生的主體性與能動性，在未來攸關社會參與的意願，與整體社會的多元對話風氣將有助於提升。

三、「倫理價值」內化的實踐與動力

追求「環境公義」，對身為社會工作者的敘說者們更是理所當然，而參與以此為訴求的環境運動，便成為他們在實踐的策略與方法之一。反過來看，「倫理價值」與「個人意義」又作為環境運動的實踐動力，推動著行動的腳步與方向，在喚醒大眾參與環境運動的目標上，也有如灘頭堡般的重要。

整體來看，敘說者們在行動背後所依據的倫理原則，偏向「人際倫理」的範疇，著重在「人文」社會環境；敘說觀點仍偏向以「人類社會制度的結構觀點」作為環境運動之重要性的著力點，也是作為認定社會工作者在運動參與之必要性的切入點。

雖然，「環境本位」的思考只是火花一般，未形成火柱，然而卻也是「非人類中心」的環境倫理，在以人際倫理為價值依歸的環境運動者身上曾有的碰撞。回到對於生態環境的價值判斷，也正如 Rolston 所認為的，自我主體與自然客體非對立的關係，相反的，自我是受到環境的包圍，而人類的價值判斷便是不停與包圍的環境交流互動下所進行，如同敘說者們在孩童時期的大自然經驗，讓他們生發出環境保護的意識。這意識所生發出的行動是「價值內化的實踐」，正是 Berger 與 Kelly (1993) 在「社會工作生態倫理信條」³中所揭櫫的，一個「主張全人類都應平等共享權利，創造人與環境的和諧關係」的行動，並盼望藉由環境運動促使破壞生態與資源枯竭的現行做法得以扭轉。

對自然環境的喜愛之情與保護意識，在環境遭破壞時的傷痛情感，這都顯露

³ 信條內容參看 p.46。

出對生態環境存有的「內在性價值」的判斷，一種以「生態環境」為本的思考。主體在「生態與物理環境」中所經驗的價值建構，也會轉化成對「社會人文環境」的關懷。在個人意義層面，「利他」以外仍有「利己」成分的動機，對「共好」之價值信念的追求，因而，對世代公義的追求、對宜居環境的企求，以及大自然之美的珍視之情，便有著一貫為自己，也為他者的行動意義。

花子：「我生長在屏東縣大武山山下，一個客、閩和排灣族族群居住的鄉鎮。大自然之於我的孩童時期是俯拾即是，但卻欠缺情感交流的經驗，只像是背景般的存在，或僅具有工具性價值。縱然我當時的課外活動是爬樹，但那只是為了從事一切人看為勇敢、陽剛的舉動...現在的我，會刻意為大自然駐足、認識『她們』⁴，並讓自己的曾經造訪能不過度地干擾到她們所生存的空間...」

「好羨慕阿山所遇見的國中老師，也不禁感嘆能夠就讀阿海所就讀的那所校風開放的高中就好了！時間的不可逆性，因此，我無法回到過去，也無法為過去的自己安排成長的家庭，就算有選擇也不見得就能就學所期待的學校，關係網絡的成員背景與教學目的也是可遇而不可求。每個人都有所處的微視與中介的環境，也有著屬於該時代的鉅視結構，結構的改變也非一蹴可幾。我們的人生也必然無法複製這 4 位敘說者的生命故事，但他們那蘊含著能動性的實踐路徑，卻得以為當下的我，以及未來的服務使用者，指向一種未來性的實踐參考吧！

「對了，就像是陽子針對青少年族群所使用的環境運動進場策略——『情感召喚』的教育方案。以結合社區的方式，在不危及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與服務使用者實地走訪環境議題的相關現場，在與環境的交流互動經驗中，方案參與者所形成的價值判斷，便會與感受建構出連結。『感

⁴ 由於研究者認同人類以外的生態圈所具有的內在性價值，但在父權社會下容易被剝奪與物化，如同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陳述，因此本章中以「她們」作為統稱。

受的凝聚』與『價值的認同』就在互為因果關係之下建構而成，而每一位執行方案的實務工作者，都有可能成為服務使用者在環境運動參與，或環境價值啟蒙的重要關鍵人呢。真是開了我這未來社工的眼界啊，有朝一日盼也能朝著這方向走走看吧！

「自然資源與環境有其極限性...雖然沒有再一次的孩提時光，但在生命畫下休止符之前，卻不斷有著『意識』選擇的機會——是否與大自然平等的互動、如何回應人類的過度開發，怎麼看待霧霾的問題...等，這些卻都是我可以決定的。在科技文明造成現今或下一代的環境破壞與人類生活品質惡化時，我也同有責任、有義務來發聲。因為，那公平正義的呼聲總是繞樑不絕於耳...」

第二節 故事轉折：經由「解放」建立「可能」

環境運動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也須面對多方的權力拉扯與角逐。社會工作者不僅需要抵抗議題的對立方，也有從學校與職場而來的有形或無形的結構性壓迫；過程可能會經歷斷裂、矛盾、掙扎、馴化或去權。因此，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現身參與，實如同種子的發芽，除了有啟蒙孕育的土壤，也需要其它能量的給予——權力的獲得，才能破土與成長，而社工充權的效用正在如此，使工作者得以重拾生活的主控權，為著所認同的價值發聲，以反抗壓制專業自主性的壓力源。

一、結構性的隱身狀態

社會工作者的養成環境，無論是校園風氣或社工養成教育，對於敘說者在參與環境運動的意識與行動，容易形成一種「結構性的隱身」——直接和間接影響結構中的個人或群體在自我實現與社會參與層面的權力障礙（Adams, 2010）。涉及的結構阻礙主要有兩種——「行動缺席式的隱身結構」與「群體關係間的隱身

結構」，此外，因著主體所處的階段和角色的不同，也有著呈顯上的差異，以下分別說明：

（一）行動缺席式的隱身結構

行動缺席式的隱身，屬於未經歷意識覺醒前的狀態，對於當前的環境運動，找不到參與的理由與必要性。

在學生時期，此類型的隱身結構，主要受到專業知識結構的影響。舉凡：對於核心能力指標的設計握有主導權的知識權威者，以及教學現場中握有知識權力的教學老師，都在在形成學生在社工知能與實務取向的建構來源。黃淑玲（2011）的研究提到，目前本土社會工作的核心能力指標，是建立在該校的專業特色、師生條件，以及與發展趨勢。無論從社會工作學系的文獻主題或開設課程來看，社會運動相關的內容都是屈指可數，課堂中對於物質與生態環境的討論也微乎其微，現況所反映的是現行專業知識體系在環境與運動課程安排上的偏廢，因此，也容易被學生視為無關的領域，既然視為無關，也就難以形成覺察，更困難有下一步的行動。

在工作時期，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的參與與否，以及參與程度，則與就業的機構屬性與所處的社會政治結構有關。工作時期的結構性隱身，牽涉到工作單位在環境運動的參與，存有反對或不支持的立場，會使社會工作者面臨在社區面向、政治參與，以及專業自主性上的去權，選擇以離職作為抵抗體制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二）群體關係間的隱身結構

群體關係間的隱身指的是，雖然已經覺察，且付諸行動，然而卻是以「切割的身分」——也就是切割為個人性的決定，不帶有社工角色認同為出發，在所屬群體間也不會主動積極邀約、不張揚談論，或做進一步的討論。

對學生來講，容易出現在封閉與保守的校園環境，所營造出的是認同、關注

性與支持性低落的氛圍。若參與的學生的比例是占全校比例的少數，在重要關係網絡中也欠缺對該議題或運動的認同，那麼無形中會造成一種低調的參與身影，同時也產生找不到同好的孤獨感。

對於工作者而言，主要受到「工作單位的立場」影響。與機構立場不同，所遭遇的是在社區面向及政治參與的去權與阻礙，因而，參與運動本身就必須承擔被體制發現而遭邊緣化、升遷受阻或影響考核的可能性與壓力。在立場不同下的發聲經驗也往往是孤單的。相反的，若與機構立場一致，而得著的社會能動性將大幅提升。

綜觀來看，兩種型態的隱身，對於主體在社會能動性的發揮，都有著如同一道玻璃的落地窗，看不見卻有著阻隔的作用。盧怡秀(2011)的研究提及，社會工作者對社會運動的投入參與，和社會工作學門無直接關連，而是開放的多元風氣、興趣與特質的影響。本研究似乎回應了這樣的討論面向，然而進一步所呈顯的是社會工作者在行動中對於倫理價值的追求——在這層面上，又與社會工作學門建立起實踐的關聯性。

二、結構下社會能動性的實踐

充權實踐的關鍵性前提是批判意識的覺醒 (conscientization)，當主體外化了自身問題及所處壓迫的結構環境後，充權也就發生 (李怡娟，2003)，可以免除人們在自身問題中自責、退縮，反而進一步地加強了個人責任的承擔。從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實務來看，意識覺醒同時也可以啟發意識的集體行動。

敘說者在參與環境運動前，總會先形成一股餘波，盪漾著對於社工角色的反思。透過團體、體制外的場域或運動夥伴間，所開啟的自由與平等對話，得以使社會工作者再度覺察切身問題，產生問題的批判性意識，並在主流的權威知識結構中採取外化方式，來保有社工的認同，而再重獲、發展及運用其能動性與自主性。因而，在組織的承諾，以及離職之外的可能性也會提升，正如謝盛瑛 (2013)

在充權效能的研究發現；此外積極的投入與承擔也帶來了改變的創造。

但在本研究中，充權所指向的是一項過程和一種效應——也就是獲得權力的過程，以及權能感提升後的效應。

（一）充權的過程

以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為脈絡的充權過程，是經由一連串「傾聽—對話—反思—行動」的連續過程（引自方永泉譯，2009）：在團體或開放場域中進行著平等立場的對話，有敘說者、有傾聽者，在當中與他人或自己再對話，意識中牽動著反思，逐漸重獲、發展、運用與行使主體與社群的權利與權力，也因而生發出現身或投身於環境議題的自主行動；整個的過程，是直接或間接地協助弱勢社群或生態環境重獲被剝奪之權利（力）。

在故事文本中，具有充權實質的團體型態，總是流動著接納與平和的氛圍，此外，在批判鉅視結構時，也會思索個人責任；團體成員彼此激勵著改變與成長。正如 Yip (2004) 在華人文化的充權實務建議，針對華人的充權，必須是既反抗，也和諧；既漸進，也基進；同時充權個人及其重要他人；既要充權個人權力，也要充權個人責任，否則將容易落入 Minow (1985) 研究，對於充權觀點在跨文化移植後的實務兩難。

（二）充權的效應

充權效應的展現在於使得個人在意義、能力、自我決定和影響力層面上獲得權能感的提升，不僅如此，在工作執行的滿意度，以及組織的承諾感也得以提升（Lee, Weaver & Hrostowski, 2011；Spreitzer, 1995）。本研究發現，敘說者的故事文本，各自展現著不一的充權效應，若以 Ruth (1998) 的研究架構，涵蓋了個人面向、人際面向與社區面向的效應。

1. 個人面向：展現在權能感的擁有、自我信念、自我接納、自尊，以及自我意識的提升。因此從自身或社會而來的「標籤」——文本中所出現的

「乖乖牌」、「非基進的人」等對所認同的行動而言，都能夠不讓其牽動與影響，而保有自身的主體性與權能感。

2. 人際面向：則可以看見他們在排除弱勢族群取得權力（利）的障礙，所開展的問題解決策略，或是對於知識建構所展現的批判性思考。
3. 社區面向：是作為政治參與和社會能動性的評估指標，由於本研究的主題領域——環境運動，涉及社區面向的行動，因此每一位受邀的敘說者都有參與的經驗，因此在政治參與與社會能動性的展現都具有一定程度。

花子：「在進入社工所就讀前，我是一名社會人士，當時身上貼滿的是所認同的主流價值標籤，就像一具缺乏主體性的傀儡木偶。就學後，進入本質上具有規範、理想，同時也帶有規訓性格的教育制度（高迪理，2011），我也努力地裝備著主流社會工作所認為『該有』的社工能力，因此，落在社工專業知識結構邊陲的『環境運動』，在我意識未覺醒的狀態下，實在找不到參與的理由與必要性，當時所落入的是『行動缺席式的隱身』狀態。反觀經歷意識覺醒的敘說者，雖然經驗著專業知識體系的『非變革』走向，然而，他們卻以『課室內外的自主性學習』來因應結構上的困境，讓書本上的倡議知識可以更加活化與深化，加增鉅視結構的分析能力；在組織動員的技巧與方法，則在體制外的知識討論或實際的參與經驗中建立起來。

「我成長的文化是一個強調『以和為貴』的華人文化，因此，『反抗』、『叛逆』植入了污名的認定。因此，對於學者 Yip（2004）在華人文化的充權實務建議——必須是既反抗，也和諧——是深感認同的，若缺乏『和諧』，那麼我應該會繼續如往常的行徑，以沉默、退縮或犧牲的姿態來回應所覺察的壓迫情境，自己不自覺地淪為自己的壓迫者，也形成壓迫的共犯結構一員。

「在研究所的第一年，傾向有最佳答案的規訓靈魂，經歷了說不出專業語言的價值危機，以至於在課室中愈來愈加地沉默。我沒有如敘說者們主動地尋求平等對話的體制外團體，因為我已被『自我評價』的標籤打趴在地，已沒有力量來對外走去。我不禁思考，對於受壓甚深的社工系學生，如何藉由結構的改變而翻轉處境？若社會工作教育者在必修的課程中，營造開放與多元的氛圍，建造『差異對話的空間』，或引導一個『關係活絡的扁平化團體』，是否也能夠因而生發出主體的批判性思考？！這過程的同時，不僅使親身經歷被充權的實質，對未來也可能成為社會工作者的隱藏當事人而言，更是一場解放與充權的體驗式教學...想到這，我真不希望自己只是『不得不』地偏重在中介與微視層面的評估與介入，盼望我也有生發出鉅視實踐的權能感。」

第三節 故事尾聲（即再開始）：不變的價值，多元的走向

在本研究中，敘說者對於所參與之環境運動所提出的訴求關注，沒有因著現場集結人潮的散去而停止，不僅持續關注著議題的發展與走向，更在自己所在的社會工作實務場域，找到繼續得以實踐所認同之環境價值的投身層面與多元角色。

一、「平權」價值的不變追求

在敘說者的實踐故事中，為弱勢者爭取更多聲音被聽見是實務工作者的堅持；使大眾的環境意識覺醒，以參與在為他人與自身權利／權力／權益伸張，是倡議工作者的目標；投身在以教育方案作為青少年族群在核心價值的建立，是青少年工作者所採取的溫和革命行動，也盼作為運動進場的一個工作典範。

從所生發出的實務目標來看，可以看見平權價值的意識流竄。學者 Hasenfeld（1987）曾經指出，若能以「平權」的方式協助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才會更具

發展性與建設性；因此，實務上要格外注意行使社工角色所擁有的權力，傾聽服務使用者的聲音，或幫助其發聲以表達內心聲音，這都將是實務上具有建設性的基礎與必要前提。在下一段中，可以看見以環境意識為出發所創造中的實踐知識，蘊含在以下多元的角色中。

二、「多元」社工角色的新可能

敘說者們覺得自己的社工角色分別像是「分解者(或任何東西)」、「變形蟲」、「細菌」，或「介質」，他們那以生態界物質或物種對社工角色的命名與比喻，藉由解說的敘說文本得以理解到，那對角色的認同與期待蘊涵著「解構」、「多元」，以及「橋樑」的意涵。不正反映了身為社會工作者的他們，在以參與環境運動作為社會工作的實踐，所曾經發揮或自我期許的角色與功能，以下分別彙整、歸納如下：

(一) 啟動能動性的「使覺醒者」：「分解者」與「細菌」的功能

在環境運動或以環境價值意識為出發的實踐，雖著重在「人類社會制度的結構觀點」，但所運用的角色及其功能仍有其特殊性與共通性。在資料的歸納整理後發現，除了「運動者」是共有的認同外，「教育者」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還有「方案設計者」、「對話平台」、「顧問」和「意識傳遞平台」。但除了「運動者」，還包含促進當次運動訴求的目標達成外，其他角色共通的主要目的，都是在「使覺醒」——使在壓迫的結構或處境中覺醒，產生抵抗的力量與能動性。

在環境運動場域，要抵抗的縱然是有形的權威勢力、體制政策或既得利益者，然而，最關鍵的仍是那無形的主流論述與價值意識——若能使意識覺醒、價值翻轉，卻將會形成抵抗支配團體的力道。因此，以意識覺醒為目標的教育工作，會是最根本與基礎的工作層面，它能夠如同分解者與細菌一般看清楚壓迫的結構，並找到切入的施力點。

在此同時要注意的是，「使覺醒」要避免淪為一種「促進」的型態——蘊涵

著壓迫力道的改變。Minow（1985）的研究指出，這是一種「差異的兩難」，在充權案主的同時，也間接標籤化了個案。

（二）發揮溝通能力的「搭橋者」：「變形蟲」與「介質」的功能

結構對社會工作者的能動性影響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在環境運動現場或回到實務工作場域，都可能面對由上而下來的專業自主性之挑戰。在這情境下，社會工作者可扮演機構與服務使用者間的搭橋者，以在上位者得以理解或同理的表達去說服，或填補在上位者與服務使用者間在知識、文化與對話上的斷裂，如此才有讓服務使用者聲音被聽見與被接納的機會，因而發展與進行符合他們需要的實務工作才可能成行。

搭橋者如同「介質」一般，可以使窒礙的實務工作，藉由角色的憑藉與施展而推展開來。在角色能力的運用，以「溝通能力」最為核心且普遍，語言能力的展現則如「變形蟲」，可以幻化成各種形式成為溝通本身或溝通媒介，不僅展現在運動的第一線工作，也使用在環境議題相關的實務場域。

在環境運動的第一線工作中，所涉及的溝通對象包括有：相對立場者、社區內的受壓迫者、社會大眾，甚至在運動圈成員間或的對話與溝通。在環境議題相關的實務場域中，則包含有：為爭取讓弱勢者聲音被聽見與接受的機會，而向上級主管所作的體制內溝通；為使更加瞭解議題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而與工作相關的中介管道作體制間的溝通，以順利連結資源。

在溝通能力的技巧運用部分，除了個案工作中的會談技巧外，特別也牽涉到「文化與跨專業知識的轉譯能力」。公部門「父權主義式的利他」態度與作法，得以藉由讓上級長官能夠同理的說法，或提出得以接受的不同說法與作法，來傳達服務使用者的切身需要與關切。在運動現場的舞台，將環境知識的艱深內容轉譯為大眾可以理解的表達能力，試圖以創意方式跨界包裝為閱聽大眾可以理解、有切身感受的議題訴求廣告或文案——要有吸引大眾的廣告或文案，又涉及向媒

體從業人員溝通、轉譯議題內容的能力有關。

由此也間接可知，環境運動的議題實踐背後有較高的知識門檻，雖然議題與生活在環境中的人們和環境本身的息息相關是確實的，學者 Dominelli (2011) 也指出，「跨專業轉譯」是社會工作者所需具備的能力之一，以能將自然生態環境相關知能轉譯成社會大眾可以瞭解的內容，但從社會工作者的養成內涵來看，與環境議題本身相關的「跨領域的專業知識」，卻是社會工作者在實踐道路上難以跨越的一道限制；但與不同專業者協同合作的「跨專業合作」，卻可以在限制的前提下創造另一種可能的實踐。

花子：「從文獻來看，社工系學生對於『照顧者』形象遠遠高於『改革性』的形象；社工系學生喜歡選修直接服務的課程，更勝於間接服務課程。然而，回觀我的學習經驗，也曾隨波逐流地接受這波偏向微視與中介方法的學習『主流』...

「在反核運動後，我要如何更進一步地裝備自己呢？可以藉由什麼樣的管道？翻閱我的社工教育教材發現，雖然『跨專業合作能力』可以藉由體制內的『社區工作』與『直接服務技巧』來建立，『鉅視結構的批判視野』可藉由『倡議理論』來提升，但『動員組織與群眾的能力』、『政策制定者和意見領袖的遊說能力』，以及『生態環境知能』，卻一無所獲。縱然可以像敘說者們一樣，在體制外主動尋找相關的課外講座、相關資訊或外校（系）課程，但除了課程本身會呈現『環境知識』與『社會工作』的整合性相對很低，心裡也仍有著在體制內說不出的孤單感，就像大二時的阿山一樣。因此，期待系所能主動在既有的本土社工教育的養成管道，發展出一個連結他校、他系或他機構之課程資源平台，那麼影響的應該不只我個人的學習權益，同時也避免成為『主流文化社會工作』，而展現出社工學門對環境價值的實質重視。屆時，孤單感也就會隨著『認同』機制的建立而消散吧。

「對了，說到以環境價值意識為出發的社工角色運用，除了『運動者』隨著倡議和充權理論偶一出現在我校內的學習外，『教育者』、『方案設計者』、『對話平台』等，都是常見於傳統社會工作的知識建構文本。但對於在實務現場的運用，我卻缺乏實質的想像。難道真的只能像雲子所說的，那樣的老師是可遇而不可求嗎？！想了想，除了在實習機構的結構上，納入環境倡議組織的選項外，若在課程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加入實質現場的樣態解說，或邀請實際具有參與經驗的社會工作者，作實際的分享與交流，不僅可以打開學生們的視野，也增進對相關實務領域的瞭解與想像。

「專業知識結構的鬆動是一項滴水穿石的工作，涉及知識權力的運作，在課程設計與安排的改革未達之前，真是期待社會工作學門的教育者也有可發揮的抵抗行動，正如敘說者們所致力在環境運動領域，期許自身所扮演的教育者身分上所發揮的功能——『使覺醒』。盼望我的後輩們得以接受這項洗禮；盼望即將畢業的我，在未來的實務道路上，也能朝著這個目標前行...畢竟，唯有經歷過覺醒／被充權的社會工作者，才有能力使他人覺醒／充權他人...」

後記：一場「回歸主體」與「邁向平等」的發聲練習

「從野百合到太陽花世代，『我們都是和自己賽跑的人』，
不必瞻前和顧後，永遠只需要問自己：我們跑贏自己了嗎？」

（引自何榮幸，2014，p.9）

環境運動之於我而言，只有參與過兩次的街頭遊行，而且還是起於公民運動蓬勃的 2014 年，也就是整體社會民眾關注或參與社會運動比例較高的那一年。無論是環境運動的歷史、發展軌跡，或臺灣曾經發生的環境議題、公害事件和開發議題等，又或是社會運動的相關理論與技巧，對我而言有如跨專業般的陌生。在研究所修課的 3 年，未曾在課程列表中看見它的蹤影，也未曾激起我內心對它的探知，但為何我要做這主題的研究？甚至因研究目的的關係，而必須使用生疏的研究方法——敘事研究。

如今走到論文的終點，回過頭來看向那站在起點的自己，原來對於研究主題的選定，反映了我那不想因循主流的內在革命，同時也是一場追求所認同之價值意識的外在革命。

不意外的訪客——「馴化我」的起源與叩門

這場以論文作為價值認同的實踐，迎來了令我不意外的訪客——「馴化我」的有聲同行。她的成形源自於，且固著於 1980 年代父權的家庭文化與知識殿堂，希冀藉由社會所認定或身處體制下的權威者認可，進一步再獲得父母、長輩們的價值肯定。進入兒童期、青少年期，甚至進入成年前期，這個權威者的角色想當然爾的就是「老師」。老師說了算，老師代表真理...

為了證明我這「生」為女性的價值，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化——也是我父母親所認同的價值下，我力求成績和名次上的表現，將之視為自身價值的量尺；對於掌握我成績表現的師長，則展現出一味地聽命與遵從。與填鴨式教

育的交互作用下的結果，就是我逐漸馴化成為一個無法獨立思考的「好」學生，養成有正確（或最好）答案的求學態度，並認同一種向上流動的生存法則。

但當我在升學體制下，答不出正確答案、考不上主流社會所評認的「好」學校時，似乎不用別人的多加責備，我的自我價值馬上跌落谷底，頭低到不能在低地就像拿著正極磁鐵般地沉默接受這些帶有負極的負面標籤，羞於面對父母、師長和同學，逐漸標籤過於沉重地壓制了我的聲音、行動和情緒。

迷失後的兩道關卡——迎來兩次通往目的地的轉彎

在這成長脈絡下，我在研究過程中經歷了兩次的迷失，隨之而來的是兩道關卡的矗立。

第一道關卡出現在研究計畫的撰寫之時，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在畢業年限的緊迫、計畫書考試的時間壓力，也在於支持網絡對畢業時程的關切下，我選擇了曾經使用過，相對較擅長的紮根研究作為我的資料分析方法，對當時的我而言，那是一條相對平坦、易走，又似乎是條捷徑的道路，然而它其實並不符合我的研究旨趣與目的，無法通向我的研究目的。回頭修正「方法」後的再次起行，然而由於對敘說研究的不熟悉，有些路段偶爾會有雲霧飄過，使看不清路標，甚至因而再次地走錯方向。

因此，所迎來的第二道關卡，是「實證」典範在書寫意識的入侵，發生在資料分析階段。面對轉錄資料的龐大，要如何分析敘說者所「再呈現的經驗」，雖然理智上知道敘事研究所立基的建構主義，非以獲致「實際真實」為目標，然而內在卻經驗著長久「實證我」的教育訓練所發出的質疑——中立嗎？客觀嗎？——因此，在「安插言說」後，我的主體聲音顯得小心翼翼，甚至為自己消音；又或以實證的筆調完成高度結構化的第五、六章文本，一種冀求「正確」與「真理」的論述。

在研究道路上兩次迷路的事實認清，各發生在「論文計畫書考試」，以及「論

文學位考試」的現場。縱然前行的道路上出現「關卡」，但以結果來講，卻因而得以更接近我的論文目標；從過程來看，則切身經驗到在評分機制底下的充權實質——顯現在老師們與我在平等、自主前提下的對話。

此外，顛覆原本的第五、六章內容，再次地重新撰寫分析文本，對我而言已轉化為一場「邁向平等」的產出歷程。為了確保資料分析的適切性，而提供給敘說者的「分析資料回饋檢核總表」（見文末的表 6.1）的結果與回饋，曾經讓檢核結果掌握著我情緒的高低，如今從「上對下」、「對與錯」的評定意義中解構，轉而建立起的是提供主體與主體間對話與溝通的機制。因此，研究者在收到檢核表後的逐篇閱讀、修正、刪減或補充，便是一個當下與敘說者互為主體的文本行成過程。

再思論文起點的自我懷疑——以「平等對話」作為解放的開始

行筆至此，我腦海中看見「社工我」越過那躊躇不前的「馴化我」，起而奔跑向眼前 4 位敘說者，靠向他們的身旁、在平等的視線中，與他們的故事交談，我、他、她可以自由地說／聽，我的聲音得以不再被主流建構的自己壓抑、隱藏...原來我走的這條環境「道」路正是一段「主體解放的道路」，不也就是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所主張的，從宰制生態環境的主體行動中得到解放，同時也獲得去解放生態環境的內在動力。

無論是研究道路的迷路曾經和挫折過往，如今已成為生命的墊腳石，讓我對外看得更遠，對內看得更清晰；而那自由的奔跑姿態，是這段路程所意料之外的收穫...

再次回到「實務我」的自我懷疑，困難於對抗主流勢力／觀點的我，如何實踐環境公義？改變縱然無法一夕到位，有時還會將撕掉的標籤給再度黏上，但內在懷疑的黏性，隨著傾聽、互動，到實際以「互為主體」的分析書寫，窒礙主體自主行動的程度也逐漸消退，正如 Yip（2004）針對華人文化社群的充權模式使

用的建議，它既要漸進，也須基進。鄭麗珍（2002）的研究也提到，「充權的歷程其實是一個終身的歷程，並無真正的結束時期，只是這段陪伴的經驗，看重的是可否使案主成為一個比開始時更具有權能感覺的人。」在這知識的前提下，才不會在充權過程中，淪為「壓迫的共謀」——自己參與在對自己的壓迫。

無論是研究本身或是研究過程，對我而言，都是一場主體對規訓的意識反抗，也是一段充權的歷程。在我的思想、意志、情感和行動面，那個父權社會下的「馴化我」逐漸找著了主體解放的路徑。

停在論文的最後一哩路，我想再告訴未來的自己與讀者：看見或經歷「差異」後，進一步的平等對話和充權洗禮，那麼在既有的結構下走一條「非主流」的實踐道路，將不再只是充滿荊棘與斷裂，「多元的風景」、「主體的歸回」也將成為可能。

「在刺激與反應之間，仍有空間。

在此空間中，存在著我們選擇反應的自由以及權力。

而在我們的反應中，則存在著我們的成長與喜樂。」

（Frankl，引自陳筱宛譯，2009，p.10）

表 6.1

分析資料回饋檢核總表

敘說者	符合程度	回饋
阿海	90~100%	這是我第一次被訪談，我覺得看別人寫自己很有趣，而且可以看到別人理解的重點跟如何詮釋經驗，還滿特別的經驗，也可以讓我再去回顧自己的那些經驗和有不同的對話。

雲子	90~100%	這篇資料我來回讀了好幾次，很感謝念謹協助我整理了許多細微而不易覺察的情緒，有幾段文字，更是因為摸著了內心最深層的感覺，而讓我充滿了感動！很感謝有機會參與念謹的研究，讓被訪問者感到安心而放心，願意將內心最真實的情感交託給研究者，更有幸透過念謹細膩文字的整理，讓生命的故事，有機會被重新整理，謝謝念謹。
阿山	90~100%	其實我自己對於說過的話有時候也沒印象，常常在訪談之後不太敢面對當時自己的感覺，運動有時候是一直動態變化的，每一個當下所談出的內容也可能有出入，但幸運地，這次認真閱讀完這份整理，好像也把自己梳理了一回，謝謝研究者的用心，也確實把現在的感觸精準的抓到。 謝謝念謹用這樣的題目，去整理我自己想要整理的一些經驗，相信應該也可以喚起更多人對「社會工作」廣度的拓展與實踐。這樣的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至少對我來說，更可以驕傲的說我是一名社工，捍衛環境正義的社工。謝謝！

陽子	80~89%	好像有點寫太好了，比起真正從事環境運動的人，我實在很資淺。 社工的生態觀或是對體制工作的概念我也好像沒有講清楚，辛苦妳了。
----	--------	---



參考文獻

英文文獻

- Ackerson, B. & Harrison, W. D. (2000). Practitioners' perceptions of empowerment.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81 (3), 238-244
- Berger, R. M., & Kelly, J. J. (1993). Social work in the ecological crisis. *Social Work*, 38(5), 521-526.
- Besthorn, F. H. (2012). Deep Ecology's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work: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3), 248-259.
- Bundy-Fazioli, K., Quijano, L. M. & Bubar, R. (2013). Graduat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power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49(1), 108-121
- Barker, R. L. (1995). *The social work dictionary*. Natl Assn of Social Workers Pr.
- Boudioni, M., Hallett, N., Lora, C. & Couchman, W. (2015). More than what the eye can see: the emotional journey and experience of powerlessness of integrated care service users and their carers. *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 9, 529-540.
- Chase, S. E. (1995). Taking narrative seriously: Consequences for method and theory in interview studies. In R. Josselson & A. Lieblich (Eds.),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Vol. 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oates, J., & Gray, M. (2012).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work: An overview and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3), 230-238.
- Gray, M., & Coates, J. (2012). Environmental ethics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s responsibility to the non-human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3), 239-247.
- Dominelli, L. (2012). *Green social work: From environmental crises to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ty.
- Ferreira, S. B. (2010). Eco-spiritual Social Work as a Precondi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Ethics and Social Welfare*, 4 (1): 3-23.
- Fox, M. (1994). *The reinvention of work: A new vision of livelihood for our time*.

HarperCollin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Anchor.
- Hoff, M. & Polack R. (1993).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Challenges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38 (2), 204-211.
- Hasenfeld, Y. (1987). Power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Service Review*, 61 (3), 469-483.
- Kondrat, M. E. (1995). Concept, act, and interest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Implications of 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405-428.
- Lee, J., Weaver C.& Hrostowski S. (2011).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child welfare worker outcomes: A path analysis, *Child and Youth Care Forum*, 40 (6), 479-497.
- Lofland, J. & Lofland, L.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Naess, A. (1973).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Inquiry*, 16, 95-100.
- Naess, A. (1986).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Philosophical inquiry*, 8(1/2), 10-31.
- Payne, M. (2005).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Palgrave Macmillan.
- Pease, B. (2002). Rethinking empowerment: A postmodern reappraisal for emancipatory practi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2(2), 135-147.
- Pellow, D. N. & H. N. Brehm (2013). A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9 (1), 229-250.
- Richan, W. C. (1989). Empowering students to empower others: A community-based field practicum. *Empowerment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Sourcebook* (pp.204-219). New York: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 Ruth, J. P. (1998). Evaluation of empowerment practice. In Gutierrez, Parsons and Cox (Ed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25(3), 276-283
- Saleebey, D. (1996) The strength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Extensions and cautions. *Social Work*, 41(3), 296-305.
- Schön, D.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London: Temple Smith

- Schmitz, C. L., Matyok, T., Sloan, L. M. & James, C.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ork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interdisciplinary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1 (3), 278-286.
- Shaw, I. (Ed.). (1999). *Qualitative evaluation (vol. 137)*. Sage.
- Shaw, T. V. (2011). Is social work a green profession? An exa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belief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3 (1), 3-29
- Spencer, M. S. (2008). A social worker's reflections on power, privilege, and oppression. *Social work-Albany New York*, 53 (2), 99
- Spreitzer, G. (1995).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5), pp. 1442-1465.
- Ubbink, M., Roux, A., & Strydom, H. (2013). A postmodern empowerment approach in social group work with previously disadvantaged individuals from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Tydskrif vir Geesteswetenskappe*, 53(4), 618-634.
- Thompson, N. (2002).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2(6), 711-722.
- Yip, K.S. (2004). The empowerment model: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empowerment in Chinese culture. *Social Work*, 49(3), 479-487.
- Morales, A. T., Sheafor, B. W., & Scott, M. (2011).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of Many Faces* (Updated Edition), 12th Edition. Pearson Custom
-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well E. & Alexander L.(1995). *In-depth Interviewing*, Second Edition. South
- Minow, M. (1985).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dilemma of difference: Bilingu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57-211.
- Richan, W. C. (1989). Empowering students to empower others: A community-based field practicum.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25(3), 276-283

中文文獻

方永泉（譯）（2013）。*受壓迫者教育學*（原作者：P. Freire）。台北市：巨流。

- 王永慈、游進裕、林碧亮（2013）。淹水對沿海地層下陷區之貧窮家庭的社會影響——以台灣西海岸漁村為例。**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1，81-83。
- 王志弘、王淑燕、郭菀玲、莊雅仲、游美惠、游常山（譯）（2003）。**東方主義**（原作者：E. W. Said）。新北市：立緒文化。
- 王甫昌（2003）。社會運動。載於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第二版）。台北市：巨流。
- 王從恕（2001）。西方環境倫理概要。**科學教育月刊**，241，26-34。
-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原作者：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台北市：五南。
- 王瑞香（譯）（1996）。**環境倫理學：對自然界的義務與自然界的價值**（原作者：Holmes Rolston, III）。台北市：國立編譯館。
- 王增勇（2012）。從台灣社工基進化談理論與實踐的辯證。**台灣社會研究**，87，317-334。
- 王增勇、陳淑芳（2006）。充權的理念與應用——以醫院就業輔導員為例。**護理雜誌**，53（2），18-22。
- 甘炳光（2007）。助人適應還是改變環境？。載於甘炳光、陳偉道、文錦燕（主編），**堅守信念——給社工學生的30封信**（227-236）。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甘炳光（2010）。社會工作的「社會」涵義：重拾社會工作中的社會本質。**Th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44（1），17-28。
- 古允文、洪文潔（1998）。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倡導取向之分析：以三本常用的社會工作概念教科書為例。**思與言**，36（2），85-158。
- 江亮演、應福國（2005）。社會福利與公設民營化制度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108，54-71。
- 任凱、王佳煌（譯）（2005）。**質性研究法——社會情境的觀察與分析**（原作者：J. Lofland and H. L. Miley）。台北市：學富。
- 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臺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市：群學。
- 何明修（2005）。**社會運動概論**。台北市：三民。
- 何榮幸（2014）。**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台北市：時報文化。
- 李明政（2011）。多元文化社會工作概述。載於李明政（主編）。**多元文化社會工作**（140-148）。台北市：松慧。

- 林彥宏 (2009)。民間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 林美珠 (2000)。敘事研究：從生命故事出發。輔導季刊，36 (4)，27-34。
-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 (2005)。質性研究方法：訪談模式與實施步驟分析。身心障礙研究季刊，3 (2)，122-136。
- 林淑馨 (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台北市：巨流。
- 林萬億 (2015)。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北市：五南。
- 林萬億 (2012)。臺灣的社會福利：歷史經驗與制度分析。台北市：五南。
- 宋麗玉 (1987)。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急進傾向與急進事實之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 吳芝儀 (譯) (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 (原作者：Amia Lieblich, Rivka Tuval-Mashiach & Tamar Zilber)。嘉義：濤石。
- 紀駿傑 (2003)。生態女性主義：連結性別壓迫與物種壓迫女性主義觀點。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6，295-321。
- 洪文潔 (1996)。台灣社會工作教育倡導取向之分析——以社工相關科系社會工作概論主要教科書為例 (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南投縣。
- 洪如玉 (2014)。深層生態學內涵探究及其教育蘊義。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學報，31(2)，103-133。
- 洪雪蓮 (2006)。願做「忠心天使」。載於曾家達、梁玉麒 (主編)，微光處處 (54-68)。香港：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 胡紹嘉 (2008)。敘事，自我與認同：從文本考察到課程探究。台灣：秀威。
- 胡哲瑋 (2015)。花開向陽——我與四位社會工作夥伴參與太陽花的故事 (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 翁開誠 (2005)。生命，書寫與心理健康。應用心理研究，25，27。
- 徐震、李明政 (2004)。社會工作思想與倫理。台北市：松慧。
- 夏林清 (2011)。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台北市：導航基金會。
- 莊文芳 (2009)。賦權 vs 父權：論培力觀點在少年安置機構之應用。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6，89-106。
- 莊慶信 (2002)。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台北市：五南圖書。

- 陳向明 (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市：五南圖書。
- 陳杏容 (譯) (2000)。研究倫理 (原作者：D. K. Padgett)。質性研究與社會工作。台北市：洪葉。
- 陳筱宛 (譯) (2009)。活出工作的意義——利用七大原則，找出生命與工作的價值 (原作者：Alex Pattakos)。臺北市：啟示。
- 陳香君等 (譯) (2011)。社會工作理論導論 (原作者：D. Howe)。台北市：五南。
- 陳伯璋 (2000)。質性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 (主編)，質的研究方法。高雄市：麗文文化。
- 陳秋山 (譯) (2011)。培力、參與、社會工作 (原作者：R. Adams)。台北市：心理。
- 陳康怡、盧鐵榮 (2010)。青年，隱蔽與網絡世界：去權與充權。香港：City University of HK Press。
- 陳學金 (2013)。「結構」與「能動性」：人類學與社會學中的百年爭論。貴州社會科學，11，96-101。
- 畢恆達 (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市：學富。
- 彭滄雯 (2011)。反核與女性主義的反支配。看守臺灣季刊，13 (4)，59-62。
- 黃彥宜 (2014)。環境議題在社會工作觀點的移轉：對社會工作教育的意含。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8 (2)，1-35。
- 黃彥宜、陳美智、劉鶴群 (2008 年 5 月)。不同的聲音：台灣社會工作教育發展方向的初探。陳武宗 (主持人)，跨文化社會工作教育。跨文化學習與社會工作教育國際學術研討，台南私立長榮大學。
- 黃淑玲 (2011)。量身訂做大學生核心能力之具體建議。評鑑雙月刊，32，30-35。
- 黃培潔 (2014)。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建制化過程研究：權力結構的歷史分析 (博士論文)。國立暨南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南投縣。
- 梁慧雯 (譯) (2000)。進入研究場域及選擇抽樣策略 (原作者：D. K. Padgett)。質性研究與社會工作。台北市：洪葉。
- 曾華源、黃俐婷 (2006)。心理暨社會派、生態系統觀及增強權能觀對「人在情境中」詮釋之比較。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4，63-89。
- 張英陣、許雅惠、陳玲萍、潘中道 (譯) (2012)。社會工作概論 (原作者：B. DuBois and K. K. Miley)。台北市：雙葉。

- 張煜輝(1991)。我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的回顧與展望。**社會工作學刊**，1，1-14。
- 張宏哲、林昱宏、劉懿慧、徐國強、鄭淑芬(譯)(2014)。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原作者：J. B. Ashford & C. W. LeCroy)。台北市：雙葉。
- 楊冠政(1996)。人類中心主義。**環境教育季刊**，28，33-49。
- 楊冠政(1996)。人類環境倫理信念的演進。**環境教育季刊**，28，7-20。
- 楊冠政(2002)。環境倫理——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環境教育學刊**，1，1-1。
- 趙小瑜(譯)(2004)。理論話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實務(原作者：L. Dominelli)。**女性主義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台北市：五南。
- 趙汝圖(譯)(2015)。耶穌的環保學——活出聖經中神、人、土地的美好關係(原作者：D. Bookless)。台北市：校園。
- 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2004)。充權：新社會工作視界。台北市：五南。
- 鄭先祐(2010年12月)。台灣環境運動的動力、困境與願景。林玉体教授。回顧台灣社運二十年(1990-2010)研討會，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 鄭怡世(2014)。隱沒的追求正義論述：1987-2007年報紙再現社工員實務行動的框架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8(2)，73-120。
- 鄭國生(2009)。漂流，是行動的力量：漂流社工的運動實踐(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台東縣。
- 鄭麗珍(2002)。增強權能理論與倡導。**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臺北市：洪葉。
- 鄭麗蓉(2012)。論 Holmes Rolston III 的環境倫理學之構成與反思(碩士論文)。靜宜大學，台中市。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論與應用**。台北市：心理。
- 潘淑滿(2002)全球化的省思：建構「人文」與「社會」並重的社會工作新思維。**社會教育學刊**，31，79-106。
- 劉珠利(2005)。對天然災害受災女性之社會工作一個增強權能的角度。**社區發展季刊**，109，444-458。
- 劉庭歡(2013)。社工系學生對社會工作者形象之初探研究——以新北市為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新北市。
-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原作者：D. Jean Clandinin & F. Michael Connelly)。臺北市：心理。

賴兩陽（2007）。社工師法對專業制度的影響與爭議：1997~2007。社區發展季刊，120，67-84。

賴兩陽（2004）。社會行政體系的「一國兩制」——探討社會行政人員的專業化。臺灣社會工作學刊，1，218-236。

盧怡秀（2011）。社工系畢業生投入社運組織之經歷（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大學，南投縣。

謝秀芬（2010）。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技巧（第三版）。台北市：雙葉。

蕭新煌（1987）。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反污染、生態保育與環境運動。台北市：圓神。

簡春安、鄒平儀（1997）。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市：巨流。

簡憶鈴（譯）（2000）。質化研究的嚴謹性與關連性（原作者：D. K. Padgett）。質性研究與社會工作。台北市：洪葉。

顏寧（譯）（2011）。質性研究：設計與施作指南（原作者：S. B. Merriam）。台北市：五南。

鐘丁茂、徐雪麗（2005）。李奧波《砂郡年紀》土地倫理思想之研究。生態臺灣，6，77-85。

網路資料

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CSWE] (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 Retrieved from <http://www.cswe.org/File.aspx?id=41861>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IFSW] (2014). 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Retrieved from <http://ifsw.org/policies/definition-of-social-w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 (1996). Code of ethic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ocialworkers.org/pubs/code/code.asp>

MBAlib（2014）。工具理性。取自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5%E5%85%B7%E7%90%86%E6%80%A7>

小野（2014年4月23日）。請你默默唸著這些名字，請你也來成為林義雄的家人——寫於林義雄無限期禁食之日【線上論壇】。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blogs/society-watch/%E8%AB%8B%E4%BD%A0%E9%B%98%E9%BB%98%E5%94%B8%E8%91%97%E9%80%99%E4%BA%9B%E5%90%8D%E5%AD%97%EF%BC%8C%E8%AB%8B%E4%BD%A0%E4%B9%9F%E4%BE%86%E6%88%90%E7%82%BA%E6%9E%97%E7%BE%A9%E9%9B%84%E7%>

9A%84%E5%AE%B6%E4%BA%BA%E2%80%94%E5%AF%AB%E6%96%BC%E6%9E%97%E7%BE%A9%E9%9B%84%E7%84%A1%E9%99%90%E6%9C%9F%E7%A6%81%E9%A3%9F%E4%B9%8B%E6%97%A5-094214531.html

中央通訊社（2016 年 10 月 11 日）。陸環保人劉曙被失蹤 疑因洩密遭拘留。**中央社即時新聞**。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610110469-1.aspx>

公益交流站（2014）。不只是社工——土地・環境・綠 都是我們關心的範疇。取自 <http://npost.tw/archives/12915>

自由時報（2016 年 1 月 25 日）。台灣史上最強降雪 1892 年連嘉義平地都下雪。**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583970>

自由時報國際新聞中心（2015 年 12 月 3 日）。全球半數碳排放量來自前 10%。**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37380>

李明真（2011 年 8 月 12 日）。李明真：「維穩」的非法與中共高層的腦殘。**大紀元**。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10/n3339941.htm%E6%9D%8E%E6%98%8E%E7%9C%9F%E3%80%8C%E7%B6%AD%E7%A9%A9%E3%80%8D%E7%9A%84%E9%9D%9E%E6%B3%95%E8%88%87%E4%B8%AD%E5%85%B1%E9%AB%98%E5%B1%A4%E7%9A%84%E8%85%A6%E6%AE%98.html>

狄雨霏（2016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將霾污染列為自然災害引發爭議。**紐約時報中文網**。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937380>

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6）。社會工作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nusw.org.tw/modules/tadnews/page.php?nsn=287>

柯佳伶、李杏津、陳永男（2012）。異化意涵之探究。取自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82/82-11.htm>

國家教育研究院（2002）。環境科學大辭典：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8853/>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介質。取自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web.cgi>

陳婉琪（2014）。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靜坐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象。取自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6/30/chenwanchi-2/>

陳郁屏（2016）。環境思潮。取自 <http://tesa.org.tw/category/%E7%92%B0%E5%A2%83%E6%80%9D%E6%BD%AE/>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2013 年 11 月 20 日）

張傳佳 (2014)。台大社工所林玲安：社工也要勇敢站出來對抗體制與捍衛專業。
取自 <http://npost.tw/archives/5923>

楊冠政 (2014)。生態倫理學的內涵及其實踐。取自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26/10.html>

鄭凱榕 (2016 年 9 月 28 日)。WHO：空污年死亡 650 萬人 9 成來自發展中國家。**新頭殼 newtalk 電子報**。取自 <http://newtalk.tw/news/view/2016-09-28/77658>

趙善如 (2011)。社會工作者應具備的核心能力。取自
<http://www.hwwtc.mohw.gov.tw/m.php?a=706&b=721>

維基百科 (2015a)。臺灣反核遊行。取自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8F%8D%E6%A0%B8%E9%81%8A%E8%A1%8C#.E7.A6.8F.E5.B3.B6.E6.A0.B8.E4.BA.8B.E6.95.85.E4.BB.A5.E5.BE.8C>

維基百科 (2015b)。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5%AA%BD%E7%9B%A3%E7%9D%A3%E6%A0%B8%E9%9B%BB%E5%BB%A0%E8%81%AF%E7%9B%9F>

維基百科 (2015c)。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取自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2015%E5%B9%B4%E8%81%AF%E5%90%88%E5%9C%8B%E6%B0%A3%E5%80%99%E5%B3%B0%E6%9C%83>

維基百科 (2016a)。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事件。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6%B8%AF%E5%B1%85%E6%B0%91%E5%8F%8D%E6%9D%9C%E9%82%A6%E8%A8%AD%E5%BB%A0%E4%BA%8B%E4%BB%B6>

維基百科 (2016b)。小王子。取自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0%8F%E7%8E%8B%E5%AD%90#.E6.94.B9.E7.BC.96>

維基百科 (2016c)。台灣環境運動。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7%92%B0%E5%A2%83%E9%81%8B%E5%8B%95>

環境資訊中心 (1997 年 7 月 28 日)。立霧溪水力發電廠復活？經部重估復工可行性。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74293>

翻轉社工學生聯盟 (2015 年 3 月 14 日)。反核大遊行【討論群組】。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wantitrade/photos/a.863968730336116.1073741836.668271116572546/863969730336016/>

附錄一 訪談大綱

【研究主題】

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

1. 您如何走上社工道路？社工養成與實務經驗為何？
2. 曾參與那些環境運動？參與方式、投入程度與參與期程為何？
3. 承上，為何會參與該環境運動？在什麼背景脈絡下參與？經歷何種的轉折與契機？
4. 身為社工的您如何解釋自身在過去對環境運動的「未參與」，與現今的「參與」？
5. 針對您所參與的環境運動，曾經歷何種具體挑戰？當時如何因應？
6. 承上，您曾採取何種行動來面對主流價值意識、權威勢力、體制政策和／或既得利益者？
7. 參與環境運動與您的社工角色認同有何關聯？
8. 從個人生活層面、社工實務和社工教育層面來看，參與環境運動的意義為何？有何實質影響？
9. 若以生態界中的一種物質或物種做比喻，您覺得自己的社工角色像什麼？為什麼？

謝謝您接受訪談！

附錄二 研究邀請函

【研究邀請函】

敬啟者，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社工所的研究生，曾是環境運動的隱身者，從非本科系轉換到社工所的歷程中，不斷地裝備著社工教育中的主流論述與實務走向，直到讓「公民」很忙的2014年，身為社工所學生的我卻在社會共同經驗的體制壓迫中召喚出「改革」的意識，也開始現身在「反核」運動的現場.....而目前正著手進行「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研究。

生態與物理環境議題從未脫離社工專業的關懷，然而卻在工業化、現代化，以至全球化背後的主流價值意識影響下落入邊陲。然而，「環境生態」也並非默然無語，她以「環境變遷」、「環境破壞」作反擊與回應；但如此的反撲，逃脫的是擁有龐大資源的既得利益者，並伴隨著一群經濟遭剝削、文化受歧視和政治被排除的遭難群體——也往往是社會工作者所服務的弱勢／邊緣／少數族群，他們是最欠缺資源因應，也不易從傷害中復原；他們被迫承擔著環境的風險與災害。

環境議題要能在社會各階層揭露、蔓延，達到啟蒙與重視，現今仍仰賴社會運動的形式。環境運動專注環境的保護、資源的公平分配、環境決策的共同參與，同時也能夠使弱勢群體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得以維持；它作為社會工作鉅視面專業實踐的積極進路之一，更是環境正義的倫理價值實踐，卻仍處在學術、教育及實務結構的邊緣位置，縱然社工專業強調「人在環境中」，然而焦點也多偏向「人文社會環境」。因此，社會工作者無意外地是環境運動場域的少數者／隱藏者。回顧本土社工專業的發展歷史脈絡，社工的三個核心使命（3C's），也相映出「改變社會」（changing the society）不若「照顧」（caring）、「治療」（curing）來得主流的現實。

因此，本研究意在探究社會工作者如何以「邊緣」的核心使命，在「非主流」的環境運動議題上實踐。他們如何衝撞主流價值意識、權威勢力、體制政策和／或既得利益者的高牆？在本土專業中解構了甚麼樣的知識體系和社會政治結構的巨石？又建構出什麼樣貌的主體實踐故事？身為社工角色的他們生發出何種的認同與意義？

如果您對該主題有切身經驗與分享意願，並具備以下條件，誠摯邀請您參與該研究，藉由經驗的敘說，盼能在學術與實務上，發展環境社會工作的鉅視角色與實踐知識。

(一) 研究參與者必須是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所畢業

為了檢視社會工作者的教育養成體制對社會工作者在環境運動之參與的影響，社會工作相關學系設定為：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科、系、組、所畢業。

(二) 研究參與者目前仍就職於社會工作相關本業

由於工作環境及屬性涉及權力動力的差異，因此涵蓋公、私部門，及社區或社會團體工作者。此外，間接服務與直接服務的職責要求與工作條件也不盡相同，受訪者也希望分屬這些類別。

(三) 現今仍主動持續參與運動，或雖然結束但有參與至運動落幕

為了探知研究對象在參與前至參與的轉折（或參與至運動結束）歷程，以取得豐富且深入的訪談資料，故設定的研究參與者乃是立志持續參與，或雖然結束但有參與至運動落幕者。

本研究採敘事取向，並以深度訪談做為資料蒐集方法，若您願意參與本研究，將會約定您方便的時間進行約90-120分鐘的訪談，訪談次數依資料蒐集情形約1-3次。同時，為了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希望您能夠同意在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本研究恪守研究倫理與保密原則，對於有洩漏基本資料、隱私之虞的資訊將一律匿名處理；錄音內容也僅作為研究者編碼及分析資料之用，待研究結束後，會予以全數銷毀。此外，資料分析撰寫完成，也將會請您先行檢視，以確認未扭曲本意。

誠摯邀請參與本研究！若您或您的朋友、夥伴符合上述條件，並有意願參與，懇請與我聯繫，我會盡速回覆。若您有任何與本研究相關的疑問與意見，也請隨時與我聯絡。在此真摯感謝您的撥冗閱讀與協助！

謹此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所

指導教授：潘淑滿 博士

研究生：黃念謹 敬邀

Mobile：0910-667-837

E-mail：nianchin@gmail.com

2016 年 7 月

附錄三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姓名		生理性別	☐ 男 ☐ 女
就讀系所	☐ 大學：_____ ☐ 研究所：_____	連絡電話	
就職單位		工作年資	
電子信箱			
居住縣市			
方便連絡時段			

二、環境運動的參與資訊

環境運動名稱	
參與方式	
參與期程	
備註	

附錄四 研究參與同意書

【研究參與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_____（以下簡稱「我」）同意參加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所研究生黃念謹（以下簡稱「研究生」）「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自我實踐」的碩士論文研究，我清楚了解以下事項：

- （一）我願意參與本研究，並了解該研究目的及研究內容。
- （二）我願意分享個人經驗，但可自主決定分享內容的深淺；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可以拒答，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疑惑或感到不適，我有權提出，並請研究者說明，亦有權隨時終止錄音及訪談。
- （三）我知道我將接受1-3次的研究訪談，每次約60~120分鐘。
- （四）我同意訪談過程全程錄音，作為研究者轉錄謄寫成逐字稿，以分析資料之用。逐字稿文本、分析結果會先行提供我校閱；研究結束後，則委由研究者將錄音資料全數銷毀。
- （五）我瞭解整個研究過程，研究者會恪守研究倫理與保密原則，對於可能辨識受訪者身分之基本資料將一律匿名處理。
- （六）我知道訪談期間我有權選擇退出研究，且沒有義務告知原因；研究者在接受到我的告知後，也會將資料一併歸還給我（包括錄音檔及書面資料）。
- （七）我同意以上事項，並與研究者共同簽訂此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 _____

研究者 _____

受訪日期 _____

附錄五 訪談札記

研究參與者：_____ 訪談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訪談地點：_____訪
談次數：第____次 訪談時間：____：____~____：____（共____分鐘）

一、訪談內容紀實（包含受訪者觀察與描述、訪談地點與觀察記錄）
二、關鍵／重要事件
三、研究者反思（包含訪談技巧、互動、訪談提問的掌握）
四、下次提醒
五、備註

附錄六 文本回饋檢核函

您好：

感謝您參與本研究之訪談，業已將錄音資料轉譯成文字形式的故事文本，為確保文本敘事符合您的表達原意，還請您撥冗檢閱。

若您覺得文本內容有表達不完整、被曲解或其他不合宜，需修改或增減之處，還請您以其他顏色筆在文本上直接註記，或在檢核函中註明，本人將會再次閱讀文本及修改。此外，懇請您能完成下方的勾選項目，也歡迎您留下寶貴的意見與想法，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參考依據。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建議、想法或疑問，還請隨時與我聯繫！

E-mail：○○○○○

Mobile：○○○○○

敬祝

平安喜樂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所研究生 黃念謹 敬上

我覺得此文本符合我的陳述經驗程度為（請勾選）：

- | | | | | |
|----------------------------------|---------------------------------|---------------------------------|---------------------------------|---------------------------------|
| ☐ 90~100% | ☐ 80~89% | ☐ 70~79% | ☐ 60~69% | ☐ 50~59% |
| ☐ 40~49% | ☐ 30~39% | ☐ 20~29% | ☐ 10~19% | ☐ 10%以下 |

閱讀後，我想表達（或補充）的是……

我想跟研究者說……

附錄七 分析資料回饋檢核函

您好：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本研究的參與與協助，研究已進入到資料分析階段；業已將研究資料分析完畢，為確保分析的適切性，懇請撥冗再次檢閱。

若您認為分析不合宜、不夠整全或有被曲解之虞，需修改或增減之處，還請您以其他顏色筆在文本上直接註記，或在檢核函中載明，本人將會再次檢閱及修改，以更貼近您的生命故事。此外，懇請您能完成下方的勾選項目，也歡迎您留下寶貴的意見與想法，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參考依據。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若您對本研究有任何建議、想法或疑問，還請隨時與我聯繫！

E-mail：○○○○○

Mobile：○○○○○

敬祝

平安喜樂

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所研究生 黃念謹 敬上

我覺得此文本符合我的陳述經驗程度為（請勾選）：

- | | | | | |
|----------------------------------|---------------------------------|---------------------------------|---------------------------------|---------------------------------|
| ☐ 90~100% | ☐ 80~89% | ☐ 70~79% | ☐ 60~69% | ☐ 50~59% |
| ☐ 40~49% | ☐ 30~39% | ☐ 20~29% | ☐ 10~19% | ☐ 10%以下 |

閱讀後，我想表達（或補充）的是……

我想對研究者說……

附錄八 逐字稿謄寫保密同意書

我_____協助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所研究生黃念謹，將研究訪談之錄音檔謄寫成逐字稿，為維護研究參與者的權益，我願意遵守以下規定，以符合研究倫理的規範：

- 一、確保在無他人聆聽的空間中進行逐字稿的謄寫。
- 二、妥善保管研究者所提供之訪談錄音檔，及進行或完成後的逐字稿文件，以避免他人觀看、聽聞或取得相關內容。
- 三、謄寫期間，若有任何相關之疑問或未竟事宜，會獨獨與研究者聯繫與討論。
- 四、確實遵守研究倫理的保密原則，直到工作結束後，也不向他人揭露錄音檔的內容。
- 五、完成逐字稿謄寫後，確實將所有相關檔案交予研究者，不私自留取備份。

謄寫人：_____簽署日期：_____

研究者：_____簽署日期：_____

（備註：本同意書一式兩份，謄寫人和研究者簽署後各執一份）

附錄九 社會工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

一、阿海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



二、雲子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



三、阿山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



四、陽子參與環境運動的故事脈絡圖

